

左派幼稚病

兩個策略

列寧著

中華書局印行

1938



藝術家阿里托曼所描的列寧素描

一九一七年列寧到達彼得格勒 Suvorov 刻





列寧向下工時的工人演說

目錄

兩個策略

序

第一章 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

第二章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決議給了

我們什麼

第三章 何謂革命對沙皇制度之徹底勝利

第四章 肅清君主制度與共和政體

第五章 應怎樣把革命推往前進

第六章 無產階級與不徹底的資產階級奮鬥時將自己掣肘的危險從何

而來

三

第七章 排斥政府保守黨的策略

四

第八章 解放派與新火星派

五

第九章 何謂在革命的時候持極端反對政府黨的態度

六

第十章 革命的公社與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

七

第十一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大會與臨時大會幾個決議案的概略

八

比較

八

第十二章 若資產階級離開民主革命則這個革命力量量的擺動是否因之減

九

少

九

第十三章 結給我們敢不敢勝利

一〇

書後

一一

左派幼稚病

第一章 我們可以在那一點上來講俄國革命有國際意義呢

一二

增補

- 第二章 布爾塞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一四七
- 第三章 布爾塞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一五二
- 第四章 布爾塞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那些敵人作鬥爭而發育、鞏固和鍛鍊出來的……………一五七
- 第五章 德國共產黨「左派」領袖、政黨、階級、羣衆之間的關係……………一六六
- 第六章 革命家應否在反動工會內進行工作呢……………一七七
- 第七章 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呢……………一八九
- 第八章 不作任何妥協麼……………二〇一
- 第九章 英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二〇五
- 第十章 結論……………二一三
- 第一章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二四九
- 第二章 德國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二五三

第三章	意大利的徒拉梯及其同道	二五七
第四章	由正確的前提做出錯誤的結論	二五九
第五章	瓦英庫普的信	二六五
附註		二六九

第一章 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

我們目前所處的革命時期有一個問題，就是召集國民大會的問題。這問題應怎樣解決，意見極不一致，現在正形成三種政治傾向，即：

(一)「沙皇」政府承認有召集國民大會之必要，但極不願意這個大會成爲一個全民的立憲大會。若按報紙所載關於「蒲力根委員會」*的消息，似乎「沙皇」政府所同意的會議，是在選舉的時候不準宣傳自由，選舉的資格必須以財產之多寡，教育程度之高低，或以狹隘的階級制爲標準。*

(二)革命的無產階級既受社會民主派的指揮，則要求全部政權交國民立憲大會，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僅要達到普通選舉權，亦不僅要達到宣傳之完全自由，而且要從速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

*「蒲力根委員會」成立於一九〇五年夏天，其責任在起草關於國會的律。至革命潮流高漲時，這些法律的草案已被破滅無餘。——譯者

* * 狹隘的階級選舉制是指選舉的時候，除上層階級外（貴族、商人、神父等）其餘無被選舉權。——譯者。

臨時革命政府

(三) 自由資產階級，拿所謂「立憲民主黨」的首領做工具以表示自己的願望，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不主張臨時政府的口號，至於怎樣保證選舉完全自由正確，怎樣保證代表大會使之成為真正全民的代表大會，使之成為真正立憲的代表大會，這些問題的實際辦法是自由資產階級所不主張的，實際上，自由資產階級是現在「解放派」唯一的社會力量，它只想使「沙皇」與革命民衆間之政權問題，盡可能的和平解決，同時，這種和平解決的結果，要使資產階級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多，而革命的民衆（無產階級與農民）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少。

這就是目前的政治狀況，也就是根源俄國現社會的三種主要力量而產生的三種政治傾向。「解放派」怎樣用德謨克拉西的辭句以掩蔽自己叛變和出賣革命的政策，這問題已在無產者報*上（第三、四、五期）屢次論及。我們現且來分析一分析社會民主主義者是怎樣的估計目前的責任。在這一點上，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和由本黨分裂出去的一部份分子臨時大會所通過的兩

*無產者是俄國「布爾塞維克派」的報紙，於一九〇五年五月十四日在瑞士的京城日內瓦出版，至

同年九月十二日停刊——譯者。

**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第三次大會是於一九〇五年五月在倫敦舉行的，僅「布爾塞維克派」

到會，「孟雪維克派」拒絕參加，却於同一時間自己在日內瓦獨立舉行臨時大會。——譯者。

個決議案爲最好的材料。這兩個決議案中，那一個觀察目前的情形較正確，那一個規定無產階級的策
略較正確，這問題實有重大的意義。且每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若要有覺悟的執行宣傳鼓動和組織的
工作，都應徹底了解這問題，至於不涉及問題本身的事情應完全不理。

黨的策略是政黨政治行爲的方向和方法。黨的大會採取策略上的決議，爲的是要適應某種新的
責任或某種新的政治情況，俾全黨的政治行爲有所準繩。已經開始的俄國革命，已造成一新局面，這新
局面就是絕大多數的民衆表示絕對不能與「沙皇」政府相容。目前的新問題是拿什麼實際方法來
召集真正的全民代表大會，真正的立憲代表大會（召集這種大會，理論上，社會民主派已先於其他各
政黨，早在自己的政綱中正式規定了。）民衆若已經表示與現政府不能相容，且覺悟到有建設新政治
制度之必要，則以推翻現政府爲目的的黨就應當想想，拿什麼政府來代替舊政府。因此，現在的新問題
是臨時革命政府的問題。爲對於這問題有完滿的回答，覺悟的工人階級的政黨應當明瞭。（一）臨時
革命政府在現時革命中以及無產階級的全般奮鬥中有何意義；（二）工人階級自身與臨時革命政
府的關係；（三）社會民主派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之確當的條件；（四）如社會民主黨不參加臨時革
命政府，則自下而上的威迫條件如何。祇有明瞭這些問題後，本黨目前應持的態度才得正確明顯而不
動搖。

我們現在且將「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決議」錄下，俾知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大會對於上述各

問題是怎樣解決的。

「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決議案」

(一) 爲獲得最近將來的利益與達到社會主義的終極目的，無產階級要求在政治上盡可能的完全自由，因此要求推翻專制政府，代以民主主義的共和政體。

(二) 要使民主共和政體實現於俄國，只有民衆暴動勝利的結果才有可能，民衆暴動之機關爲臨時革命政府，只有這種政府才能保證選舉國民代表之宣傳自由，並以普通直接選舉制爲標準，規定不記名投票法，召集眞能代表民意之國民大會。

(三) 此種民主革命行於俄國社會經濟制度之下，非但不至使資產階級之統治頻於衰弱，而反使其強大。資產階級於相當時期，必不顧一切以圖盡可能的奪取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中已得之勝利。因上數種，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特決議如下：

(一) 必須在工人階級中對於革命必經之行程爲具體之宣傳，且指明於相當的時候有產生臨時革命政府之必要，無產階級向這個政府的要求，便是實現本黨黨綱中最近將來的政治與經濟的要求（最低限度的黨綱）*。

(二) 以實力之分化和情勢之變遷（現在還不能確實說定怎樣變遷）為轉移，本黨得派全權代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其目的在猛烈反抗各種反革命的陰謀，並主張工人階級的特殊利益。

(三) 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必須條件，是黨對自己全權代表之嚴厲監督。和社會民主派獨立地位之完全保持，因社會民主派是要完成社會革命的黨，它是與其他資產階級政黨絕不相容而且仇視的黨。

(四) 不管可能參加臨時政府與否，本黨應號召受本黨指揮之武裝的無產階級隨時威迫臨時政府，並將這種必要向工人羣衆為普遍的宣傳，以達保持革命已得之勝利，且從而擴大之目的。

* 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三年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黨綱曾分為兩部份，即「最低限度的黨綱」與「最高限度的黨綱」是。最低限度黨綱的要求是當時最近將來的要求，即推翻專制，建立民主共和政體，普及教育，教堂，離政府獨立，八小時工作制，勞動保護法之頒佈，罷工，集會，結社等自由之確定……最高限度的黨綱是以剷除資本制度達到社會主義為終結目的，實現這個目的的主要條件，即無產階級專政，俄國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即將這個主要條件實現了。——譯者。

第二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大會關於臨

時革命政府的決議給了我們什麼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按其標題，即可知道全部都是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問題，這就是說，社會民主派之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是大會問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這裏的問題僅祇是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問題，而不是關於別種政府的問題；故關於『奪取政權』等一般的問題這裏毫未涉及。第三次大會把『奪取政權』等一般的問題放在一邊不提，是否正當呢？當然是正當的，因為俄國目前的政局對於這一類的問題絕不要求馬上解決。反之，現在被全民衆提出且要馬上解決的問題，是推翻專制和召集立憲大會。黨大會提出來要解決的問題，不是一般著作家偶然說及或不偶然說及的問題，而是因目前的條件和社會發展之客觀行程至有重要的政治意義的問題。

臨時革命政府在現時革命中和無產階級的一般奮鬥中有什麼意義呢？上述第三次大會的決議案首先就解答這問題，指明以『最近將來的利益』為觀點，以『社會主義的終結目的』為觀點，都必須『政治上盡可能的完全自由。』而達到政治上之完全自由，與本黨黨綱所承認者完全一樣，必須以

民主的共和政體代替「沙皇」專制政體。大會決議案中特別注重民主共和政體的口號，這在邏輯上與原則上都是必要的，因為無產階級（爲德謨克拉西而奮鬥的先鋒隊）在這次革命中所要達到的，就是政治上的完全自由。此外，特別注重這個口號在現時尤爲必要。因為現在頂着民主主義旗幟在社會舞台上高唱的正有不少的保皇派，如所謂「立憲民主黨」或「解放黨」。

爲要建立共和政體，自然需要有民衆的代表大會（以普通直接選舉制爲標準，並規定不記名投票法）。立憲的代表大會。這在上述決議案中已是承認。不但如此，要建立「眞能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僅只叫這代表大會爲立憲大會還不够；必須使這大會有權與力來「立憲」。決議案因覺悟到這點，故不僅限於「立憲大會」之形式上的口號，而且加以實際的條件，使這個大會眞能執行自己的責任。這種條件的指示，使口頭上的立憲大會，能成爲事實上的立憲大會是必要的，因爲自由資產階級（如君主立憲黨）總是有意的曲解「全民立憲大會」這口號，使這口號成爲口頭的空話。

上面這個決議說，要保證選舉國民代表之宣傳完全自由，並召集眞能代表民意之大會，只有組織臨時革命政府才有可能，且這個政府要同時成爲民衆暴動機關的政府。這話對不對呢？誰認這是不對的，它便應當認定「沙皇」政府是不會跑到反動方面去的。它能在選舉的時候保守中立，且能注意求得真是表示民意的大會。這種論斷謬誤至極，無論誰都不敢公開起來擁護，可是我們的「解放黨」却拿着自由的旗幟，正在暗地裏照這種論斷行事。立憲大會應由誰來召集，選舉的自由與正確應由誰來

保證，對於這個大會的力與權應由誰來委托，——這些都非革命政府不可，它是暴動的機關，它很誠懇的求其實現，並有力量以求其實現。「沙皇」政府將必然的反對這種辦法，自由資產階級的政府正與「沙皇」分肥去了，它不依靠民衆的暴動，不誠心要開國民會議，縱或誠心想要這種會議，然也不能具體的促其實現，所以本黨所提出來的民主主義的口號，是唯一正確的口號，是完全徹底的口號。

但是估計臨時革命政府的意義的時候，若不注意民主革命的階級性，便要錯誤。因此，決議第三條說，民主革命將使資產階級的統治強大起來。這時現時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必然的現象。但是資產階級對政治上稍為自由的無產階級之統治愈增強大，則前者後者之間爭奪政權的鬥爭必然日加激烈，而資產階級『奪取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已得勝利』之企圖亦必日無忌憚。所以無產階級站在各階級之前，且領導各階級為民主主義而爭鬥，同時對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中所包含的新矛盾和新鬥爭，不可一刻置諸度外。

這樣，決議案中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意義一部分，我們已充分分析，臨時革命政府與爭取自由和共和政體的關係，臨時革命政府與立憲大會的關係，臨時革命政府與發展新的階級鬥爭之民主革命的關係，——這些都已說過。

其次的問題，就是無產階級對於臨時革命政府一般的態度應該怎樣？大會決議案回答這問題，首先即謂要在工人階級中宣傳臨時革命政府之必要，工人階級應該覺悟到這種必要。『民主主義的』

資產階級對於推翻「沙皇」政府的問題總是不顯明的提出來，在這時候我們應當把這問題看作是目前第一個重要的問題，並主張臨時革命政府之必要，不但如此，我們還應當為臨時革命政府指出一個合於目前歷史客觀條件，且合於社會民主派目前責任之行動的政綱。這個政綱，即本黨的全部最低限度黨綱，亦即本黨最近將來全能見諸實現的政治要求與經濟要求，這是一方面根據目前社會經濟關係的必要，另一方面為今後的鬥爭起見，為實現社會主義起見，這都是不可少的要求。

這樣，大會決議案對於臨時革命政府性質和目的都已完全解釋。按其產生及其根本性質，這種政府當為民衆暴動的機關。按其形式上的意義，這種政府當為召集全民立憲大會的工具。按其行動上的內容，這種政府應當實現社會民主黨最低限度的黨綱，因為只有這個黨綱能夠保證革命民衆反對專制的利益。

有人可以反駁說，臨時政府既為臨時的，便不能實行積極的黨綱，還未為全民確認的黨綱。這種反駁僅只是反動派的一種詭辯法。所謂不實行什麼積極的黨綱，就是說要忍耐這種專制下的農奴制度。能夠忍耐這種制度的只有對革命事業變節的政府，而不是為民衆暴動機關的政府。若是現在有人藉口謂立憲大會也許不承認集會自由，故提議在立憲大會尚未承認集會自由以前不要在事實上實現集會自由！這是一種滑稽，只可當笑話說，又有些人反對以臨時革命政府來從速實現最小限度黨綱，這也是同樣的滑稽。

還有一點，就是這個決議案只說臨時革命政府的責任是在實行最小限度的黨綱，這樣一來，就把那些要急於實現最高限度黨綱和急於要奪取政權以行社會革命之半無政府的思想，一概撇開了。俄國目前經濟發展的程度（客觀條件）和無產階級之覺悟與組織程度（與客觀條件緊相關連的主觀條件）使工人階級一時徹底解放成爲不可能的事。祇有那班最唱高調的人，能把現時民主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置諸度外；只有那班最無聊，最作樂觀夢的人，能不顧到目前的工人羣衆是如何還不瞭解社會主義的目的，及其實現的方法。但是我們相信，工人解放只有是工人自身的事情才有可能；若羣衆無覺悟與組織，無準備與訓練，無反對資產階級之公開的階級鬥爭以煅煉自身，則社會革命簡直無從說起。對於那些帶着無政府性質的反對，以爲我們似乎停滯了社會革命，我們要回答說：我們並不是停滯了社會革命，而是採用唯一正確的道路，即民主共和政體的道路以實行達到社會革命第一步。凡要達到社會主義而不想經過民主政治的人，他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會必然的走到反動的結論上去。若是有工人分子在相當時候問我們：爲什麼我們不實行最高限度的黨綱呢？我們便要回答他們，指明現在帶着民主主義色彩的民衆是如何的見外於社會主義，階級矛盾是如何的不顯明，工人羣衆是如何的尙欠組織。你們去把全俄數千百萬的工人組織起來吧！把自己的黨綱去向他们宣傳，引起他們對於這黨綱的同情吧！你們只試試去幹這事，不要徒在口頭上說些無政府黨的話語，那便即刻覺得要實現工人羣衆這種組織，傳佈社會主義的理論，在在都需要盡可能的完滿實現民主主義的改革。

臨時革命政府的意義，以及無產階級對它的關係既已解釋明白，便發生這樣一個問題，即可否參加臨時革命政府和參加的條件如何（自上而下的動作？）自下而上的動作又當如何？上項決議案對於這兩個問題都有正確的回答。對於前一問題，議案中肯定的說，社會民主派參加臨時革命政府（在民主革命和爭得共和政體的時期）在原則上是許可的，這種態度，使我們與原則上反對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無政府主義者截然不同，且與社會民主派中之尾巴主義者（如馬丁諾夫及「新火星派」之流）恐嚇我們，謂將來或者可有參加臨時政府之必要的論調，亦顯然有別。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的這種態度，同時把新火星報以爲社會民主派之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是一種米勒蘭主義的變形，如資本制度之神聖不可侵犯一樣，爲原則上所不許可等一類的意見也完全推翻了。

但是，僅說原則上是許可的問題，自然還沒有回答這種參加在實際上有何益處的問題。在什麼條件之下才能使本黨大會所承認的新的鬥爭形式（即自上而下的鬥爭形式）成爲有益的問題。在什麼條件之下才能使本黨大會所承認的新的鬥爭形式（即自上而下的鬥爭形式）成爲有益的鬥爭形式呢？具體的條件，如各階級力量相互關係等問題，自然現在不能說定，決議案也自然不能將這些條件預先一定妥。具體的問題必須按具體的情勢來決定，任何聰明脚色也不敢預下斷語。但我們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性質與目的可以預先規定，並且應當規定，所以議案中指明下列兩個目的：（一）猛烈反抗各種反革命的陰謀，（二）主張工人階級的特殊利益。自由資產階級喜談反動的心理（見解放第七十一期，斯脫羅威之一封公開的信）想藉此以恐嚇革命的民衆，并引誘他們對專制政府讓步——在

這種時候，無產階級的政黨方面應特別覺醒民衆，不要忘記與反革命正式宣戰的責任。要解決政治自由與階級鬥爭的偉大問題，結果非武力不可；我們應注意這種力量之準備與組織，以便不僅爲消極的防禦，且爲積極的進攻。從「巴黎公社」*起，歐洲即爲反動局面所籠罩。我們的思想力太注重於「自下而上」的動作，使我們所眼見的鬥爭亦太只限於防禦性質的鬥爭。現在不同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已是一新時期，即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開始發展的時期。我們處在這樣時期的俄國，自然不能「一仍舊貫，『食古不化』」了。我們必須宣傳自上而下的動作，必須準備激烈的攻擊動作，並且必須研究這種動作的條件和形式。那些條件自然很多，上項決議案把其中的重要者指出了兩點，其一是關於社會民主派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之形式方面的條件（黨對自己全權代表之嚴厲監督），其二是關於這種參加之性質方面的條件（時刻注意完成社會革命的目的）。

這樣在「自上而下」的動作之下（差不多是空前未有的新鬥爭方法），黨對於政策應該如何，上項決議案已從各方面解釋明白了。不但如此，大會決議案還觀察到自上而下之動作若不成功時的

*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正值普法戰爭，巴黎無產階級乘機奪取政權，建立工人政府（巴黎公社）

之產生即源於此。因自身無堅固之組織，也無政黨的指揮，「巴黎公社」存在僅七十二日即爲資產階級所征服。工人死於是役者達二萬五千，充軍者萬五千餘。「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蘭西及其

他國家的政府爲是役所驚慌，乃大舉反動，對自己國內之革命壓迫不遺餘力。——譯者。

辦法，即自下而上的威逼臨時革命政府，是我們隨便什麼時候都不應放棄的。爲要實行自下而上的威逼，無產階級必須武裝起來（因在革命時期中的民衆運動能特別的變到直接的國內戰爭並受社會民主派的指揮。無產階級武裝威逼之目的，在『保持鞏固且擴大革命之勝利』以無產階級的利益爲觀點，這些勝利應爲本黨全部最小限度黨綱之實現。

對於第三次大會關於臨時革命政府決議之簡略之分析，我們就此停筆。讀者看完這個分析之後，可知上項決議案對於新問題的意義，對於無產階級政黨與這問題之關係，對於本黨對臨時革命政府之自內而外和自外而內的政策，都有明白的觀察。

我們現在已來看看「臨時大會」對於這個問題的決議是怎樣？

第三章 何謂革命對沙皇制度之徹底勝利

「臨時大會」的議決案是關於「奪取政權與參加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決議案。這問題的立場就已經含有亂雜的觀念。一方面，把這個問題看得太狹窄，只說我們參加臨時政府，而不說黨對臨時革命政府的一般的責任。另一方面，把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即我們參加民主革命中一個階段的問題與社會革命的問題混成一塊。實際上講起來，所謂社會民主派「奪取政權」一語，若用在普通的直接意義上，那就是社會革命，而不是什麼別是革命。若把這個術語的意義看作不是為社會革命而奪取政權，而是為民主革命奪取政權，那麼，何以不僅只說我們參加臨時革命政府，而又一般的說要「奪取政權」？這話是何用意？大概是「臨時大會派」自己都未曾弄清楚，究竟他們應說什麼：說民主革命，還是說社會革命。誰會注意對這個問題所發表的著作，他該知道上面那種混亂的觀念是開始於馬丁諾夫同志所著的兩個專政：「新火星派」對於這個足為尾巴主義模範作品中所提問題的立場，固然不願意回憶，但這作品對臨時大會有思想上的影響，是用不着懷疑的。我們且把這個決議的標題放在一邊，

再來分析這個決議的內容，便可看出其中最大錯誤。這個決議的第一段說：

『革命對「沙皇」制度徹底勝利之可能，或由建立自民衆暴動勝利而產生的臨時革命政府來達到，或由某種代表機關的發起，在革命民衆直接威逼之下，決定組織全民立憲大會來達到。』

這樣，這段決議告訴我們說，革命對「沙皇」制度之徹底勝利可以由暴動勝利來達到，也可以由……代表機關的一紙決議組織立憲大會來達到！這是什麼？怎麼是這樣？徹底勝利可由一紙『決議』以組織立憲大會來達到嗎？而且把這樣的『勝利』與建立『自民衆暴動勝利而產生的』臨時政府相提並論嗎！臨時大會未注意到民衆暴動的勝利與臨時政府的建立是說革命在事實上勝利，而『決議』組織立憲大會是說革命只是在口頭上勝利。

「孟塞維克派」和「新火星派」的臨時大會，犯了與自由派和解放派常犯的錯誤。解放派常在口頭上說些關於『立憲』大會的話，同時，無廉恥的閉住眼睛，不看見力與權是把持在「沙皇」的手裏，忘却了要『立憲』便要有實力來立的問題。臨時大會也忘却了，不知從任何代表的一紙『決議』到實現這個決議還隔『十萬八千里』。臨時大會也忘却了，不知政權一日在「沙皇」之手，任何代表的任何決議都好，都會與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時歷史上有名的佛蘭克府國會*的『決議』一樣，只是成爲一紙可憐的具文。因爲當時有這種事情，所以革命的無產階級的代表馬克思在其新萊茵報

中曾用極激烈的諷辭怒罵佛蘭克府的自由主義的「解放派」說他們只在口頭上說了些好聽的話語，採取了民主主義的各種「決議」，規定了「各種自由，但在事實上却把政權放在國王的手裏，自己沒有組織武裝實力以與受國王統治的軍隊力量戰鬥。於佛蘭克府的解放派還在唱空調時，國王已得了空閒的時間，鞏固了自己的軍事力量，反革命乃得憑藉實際力量把民主派及其一切好看的「決議」打得粉碎。

臨時大會拿來與革命徹底勝利比較的那樣東西（譯者按：即指『代表機關』的那紙『決議』）恰恰是欠缺革命勝利基本條件的那樣東西，承認本黨共和政體黨綱之社會民主主義者怎樣能犯這種錯誤呢？爲要明瞭這個奇怪的現象，須得一提第三次大會關於自本黨內部分裂出去的一部分分子的決議。這個決議中，指出本黨內部現在還有受根源於「經濟派」而產生的各派別存在。我們的「臨時大會派」（可見他們不是虛受了馬丁諾夫思想上的指導）現在觀察革命問題與經濟派前此觀察政治鬥爭或八小時工作制一問題所持態度，毫無二致。當時經濟派即運用了自己的「法寶」——『階段論』曾經這樣主張：（一）爲權利而爭鬥；（二）政治的煽動；（三）政治的鬥爭——或是：（一）十小時的工作時間制；（二）九小時的工作時間制；（三）八小時的工作時間制；從這種「策

*佛蘭克府國會（Frankfurt Parliament）是一種國民會議，於一八四八年革命時召集以起

草德意志的憲法，會議於佛蘭克府故名。——譯者

略過程』Tactic Process 後來得着了什麼結果，這是大家所知道的，這裏用不着細說。現在的「臨時大會派」却也向我們提議，把今後的革命好好的分成階級：（一）「沙皇」召集代表機關；（二）這代表機關在民衆威逼之下，「決定」組織立憲大會；（三）……關於第三階段，「孟塞維克」派還未商量定妥，他們忘了，不知民衆之革命威逼正遇着「沙皇」之反革命的威逼，故結局，或者是「決議」不能實現，或者還是要民衆暴動的勝利，或失敗來決定問題。臨時大會的決議案與經濟派的論調完全相同，如經濟派說：工人徹底勝利之可能，或用革命手段實現八小時工作制來達到，或用特許方法行十小時工作制後再「決定」採取九小時工作制來達到。這與臨時大會的決議案簡直沒有絲毫差別。

說到這裏，也許有人反對我們說，起草決議的人并不是有心要將暴動的勝利拿來與「沙皇」所召集的代表機關的「決議」相比較，而只是預先觀測黨在這種或那種情況之下應持的策略。我們對於這種說法的回答是：（一）決議案的原文是直接了當且毫無二可的把代表機關的「決議」叫作「革命對「沙皇」制度之徹底勝利。」也許這是編輯不小心的結果，可以把這決議案拿來根據會議記錄更正，但在它未更正以前，其意見只有一個，且這個意見，全部都是解放派的意見。（二）解放派式的思想方法（臨時大會決議案的起草人就運用了這種方法）在「新火星派」的其他出版物和論文中間更表現的透徹。例如在梯虎里司委員會的機關報社會民主黨（用格魯精文出版的，曾爲火星報第一百期所稱贊）中所載「鄉紳會議與我們的策略」*一文，簡直說，「擇定鄉紳會議（關於這

種會議的召集，我們現在還全不知道！——著者）爲我們行動中心之……『策略』『比較』武裝暴動和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的『策略』『對我們有利益。』我們在下面還要回頭說到這篇文章的。（三）要預先討論黨在革命勝利時的策略，以及黨在革命失敗時的策略，在暴動成功時的策略和暴動不能擴大成爲一真正利害力量時的策略，自然不可反對也。許「沙皇」政府能够召集代表會議，藉以達到與自由資產階級分贓的目的，——第三次大會的決議案觀察到這點，直說這是『假面具的策略』，是『假的民主主義』，是『所謂鄉紳會議一類的一種人民代表會議的化裝笑劇』。唯其如此，所以在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決議案中說不到這點，因爲這與臨時革命政府沒有關係，這會把暴動和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的問題排在重要問題之外，且變更其色彩等。現在不是說有各種情況之可能的問題，不是說可能的勝利與失敗，直的大路與灣曲的小路的問題，而是說社會民主主義者關於真正革命的道路不應該淆亂工人們的觀聽，不應該像解放派一樣，把對於革命勝利欠缺根本條件的東西謂爲革命之徹底勝利。也許八小時的工作制，我們一下子得不着，而要經過長的道路才得着，但現在有一個人，他把無產階級之無力與懦弱，致將不能阻礙資產階級的遷延，遷緩，叛變與反動之無力與懦弱，謂爲工人們之勝利，你們對於這樣的人將怎樣說法？也許俄國的革命，如前進報曾經有次說過的一樣，以『立憲流

* 『鄉紳會議』是俄國解決國家重要問題的一種會議，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中曾經召集過，對

「沙皇」有發言權，其中所含分子爲貴族，神父，商人等。——譯者。

產』而中止，但是這難道就可爲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口實，在決戰要開始的時候即謂這個『流產』爲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嗎？也許形成一個最壞的結局，我們不但爭不到共和政體，且連憲法都是一個想像的憲法，「錫波夫式」的憲法，但在社會民主主義方面，難道就可以抹殺自己的共和政體的口號不提嗎？

當然「新火星派」還未達到抹殺這個口號的程度。但是革命精神已經離開他們到了什麼程度，他們那種無主義的清談，已使他們如何的離開了目前戰鬥的任務，這在他們的決議案中，恰恰忘了關於共和政體的問題一點看起來，特別現得明瞭！這個固屬奇怪，但是事實，他們曾經在臨時大會的各項決議案中，對於社會民主派的一切口號都加以審定，重述，解釋，仔細規劃，甚至連工人按機關選舉組長和代表的問題都未忘掉，但只有關於臨時革命政府和共和政體的問題，從未在決議案中，找得機會說一說。既談民衆暴動的『勝利』與臨時政府的建立，而不指明這些『步驟』和舉動對於爭得共和政體的關係，這無異於起草決議案不是爲指導無產階級的鬥爭，而只是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背後扮着腿追隨着罷了。

總括起來說，臨時大會決議案第一段是：（一）完全未按照爭得共和政體和保證真正全民大會與真正立憲大會的觀點來說明臨時革命政府的意義；（二）把恰恰不够根本條件以達到真正勝利的主張，拿來與革命對「沙皇」制度之徹底勝利相比較，是直接淆亂了無產階級對於民主主義的認識。

第四章 肅清君主制度與共和政體

現在再來看該項決議案的第六段：

『……這種勝利，在前一情形與後一情形之下，都可為革命時期中新的局面之開始。

『社會發展的客觀條件對於這新的局面自然而有的責任，便是在政治上已得解放的資產階級社會各分子間，為實現自身社會利益和直接握得政權的相互爭鬥過程中，對君主等級的全都統治為最後之肅清。

『所以臨時政府，負有實現這個按歷史性質是資產階級革命責任的臨時政府，應當在調節正得着解放民族中各階級相互鬥爭的時候，不僅要把革命的發軔推往前進，而且要與那些危及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之力量奮鬥。』

這是決議案中單獨的一段，我們且來分析。此段中的主要意思與第三次大會決議案第六條相符合。但試將這兩個決議案中這一段拿來仔細比較一下，其間根本不同的地方便馬上顯露出來了。第三次大會的決議很簡略的說明了現時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即把全部目光都注射於各階級為着一定

的利益而行一定的激烈鬥爭，且把無產階級的作戰任務視爲首要的問題。臨時大會的決議案，又拉雜又不清楚地敘述着現時革命之社會經濟基礎，關於爲着一定目標的爭鬥，却說的很不明顯，而且關於無產階級作戰的任務，絕未提及。臨時大會的決議案說，要在社會各分子間相互爭鬥的過程中肅清舊制度，只有建立民主共和政體，我們應該爭得這樣的共和政體和完滿的自由，不僅將與專制奮鬥，且當資產階級將要企圖（它必然要企圖）奪取我們的勝利品的時候，我們還將與資產階級奮鬥。第三次大會的決議案是號召一定的階級去爲着一定不移的最近目標而鬥爭。臨時大會的決議案，却在那裏說些各種力量相互間的鬥爭。一個決議案是表現着積極鬥爭的心理，另一個是表現着消極旁觀的心理；一個是充滿着號召活潑行動的精神，另一個是充滿着死板的推論。兩個決議案都說，現在的革命對於我們僅只是革命的第一步，繼續第一步，必有第二步，但從這一點出發，一個決議案所作的結論，是因此必要更快的經過這第一步，必要更快的結束它，爭得共和政體，猛烈的壓倒反革命，以造成第二步的基礎。而另一個決議案，却用很多辭句在那裏描寫第一步的情況，且如嬰兒食奶一樣（恕我用了這句粗鄙的話）津津有味的在那裏吮嘗這種情況的滋味。

第三次大會的決議案，採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舊見解，却是永遠新鮮的見解（關於民主革命之資產階級性的見解）作爲說到民主革命奮鬥，且爲社會革命奮鬥的先進階級之首要任務的緒言或其第一個出發點。臨時大會的決議案，却簡直就流連在這個緒言當中，過着文章的快樂生活，用着才子的

本領在那裏辯解這個緒言。

上述這個不同點，恰是好久以前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分成兩派的那個不同點：在從前合法的馬克思主義那時代，是辯論派和戰鬥派，在羣衆運動開始的時代，是經濟派和政治派。一般的階級鬥爭，尤其是政治鬥爭，都有經濟上深遠的原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觀點；經濟派從這個正確的觀點出發，便做出一個巧妙的結論，就是說要把背脊來對着政治鬥爭，阻止牠的發展不讓牠擴大，蔑視牠的責任。政治派却相反，從同樣觀點出發，却做了另一種的結論，就是：我們現在爭鬥的根源若愈深，我們更要愈廣泛，愈勇敢，愈堅決，愈積極的來實行這個爭鬥。現在我們的爭論是同樣的爭論，不過環境變遷，形式不同罷了。民主革命絕對還不是社會革命，這個革命不僅只對於無產者有關，它的深遠的根源是醜藏於全部資產階級社會之不可免除的需要與要求——這是我們共有的出發點；我們從這個出發點所做的結論，是先進階級因此要應更勇敢地提出自己民主主義的責任，應更堅決地徹底主張這些責任，直接提出共和政體的口號，宣傳必要臨時革命政府和必要猛烈壓倒反革命之主張。而我們的反對派——「新火星派」從同一點出發，却做出另一種的結論，以爲不要把民主主義的結論談得徹底，以爲在實際的當中可以不提出共和政體，以爲可以不宜傳必要臨時革命政府的主張，以爲關於召集立憲大會的一紙決議也可謂爲徹底的勝利，以爲與反革命奮鬥的責任，可以不作爲我們積極的責任，而把它拋入不可捉摸的『相互鬥爭過程』（我們在下面可看見這個術語是不對的。）這簡直不是

政治家的口吻，而是一種保管文書官吏的濫言！

若讀者對於「新火星派」決議案中的一些詞句愈用心觀察，則上述那些根本特點便能更看得顯明，如那個決議案說『政治上已得解放的資產階級社會中各分子間相互爭鬥過程』的話。回想起該決議案的標題（臨時革命政府）使我們發生疑問，就是既說相互爭鬥的過程，那末，關於政治上奴隸資產階級社會的分子，何可默置不理？「臨時大會派」是不是想要說，他們既假定革命勝利，則這様分子便已消滅了嗎？這類的觀念是荒謬絕倫的，且是政治上的浪漫和近視。革命對反革命勝利之後，反革命不會消滅的，它必然要開始新的更激烈的鬥爭。我們在自己的決議案中分析革命勝利時候的任務，應當對於鎮壓反革命強項抵抗的責任與以十二分的注意（如第三次大會的決議案就是這樣），而不能把社會民主黨最近將來的日常緊急政治任務，拿些在現在革命時期之後將會怎樣的說話來敷衍，拿些『在政治上得了解放的社會』已經實現時會將怎樣的話來敷衍，經濟派曾經以政治受經濟左右的一般原則爲口實，敷衍了他們自己對於日常政治責任的不瞭解；現在的「新火星派」也是一樣，以在政治上已得解放的社會內部鬥爭之一般原則爲口實，來敷衍自己對於這個社會求政治解放之日常革命責任的不瞭解。

試拿『對君主等級的全部統治，爲最後之肅清一語』來看。俄文上所謂對君主制度作最後的肅清，便是建立民主共和政體。但是我們那位賢良的馬丁諾夫及崇拜他的人都覺得後面一句話太通俗

而明顯；他們一定要把這句話想得『深奧』一點，把它說得『俏皮』些。其結果那種深思遠慮，只是費了像女人分娩那樣可笑的『產兒勞』——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却把一個口號弄成了記事，把號召前進的壯烈口號弄成了一種機械式的回顧。這好像我們看見我們的面前不是一些現在即時要為共和政體而奮鬥的活人，而是一些以萬古不易之理的觀點來觀察現在問題的木乃伊。

再看：『……臨時政府，負有實現這個……資產階級革命責任的。』……從決議案的這兩句話看起來，很痛快了當的表現出了「臨時大會派」對於橫在無產階級政治首領面前的具體問題的觀察，但是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這樣具體問題，在「臨時大會派」的眼目中，却又為今後許多將要實現資產階級革命責任之一的政府問題所埋沒了。若是你們願拿『歷史的眼光』來觀察這問題，那末，歐洲諸國無一不是你們的好例，就是許多政府（決非『臨時的』政府）都曾經實現資產階級革命之歷史上的責任，甚至於那些征服了革命的政府都曾經不得不還要實現這個被征服的革命的歷史上的責任。可是『臨時革命政府』是個革命時期的政府，直接起來代替已被推翻的政權且直接憑托民衆暴動之政府，而不憑托一些什麼自民衆產生出來的代表機關的政府。臨時革命政府是一種求革命即時勝利，且即時壓倒反革命的機關，而決不是一種求實現資產階級革命一般歷史責任的機關。先生們，我們可讓處在將來「俄國」的歷史家去界說我們同你們，或這種政府和那種政府實現了資產階級革命的何種任務吧——這種事情，再過三十年都還可來得及作的，而現在呢，我們對於為共和政體

而爭鬥，對於無產階級努力參加這個爭鬥的問題，要馬上提出口號且與以實際的指導

因上述各種原則，我們對該決議案第二段中的最後的幾個意思必不能滿意。如說臨時政府應當『調節』各階級間的相互鬥爭，這話是極不妥當的，或至少是很難同情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應當運用自由派和解放派的術語，因為這種術語可使人家想到政府可不為階級鬥爭的機關，而為階級鬥爭的『調節者』……政府應當『不僅要把革命的發展推往前進，而且要與危及資本主義制度根本之力量奮鬥』。這個力量恰恰就是無產階級，該決議案的說話，就是代表這個階級的說話。他們不說無產階級在現在這時候應當怎樣『把革命的發展推往前進』（把它推得比立憲民主資產階級所想的更往前進）不說這樣用一定的方法去準備，俾當資產階級反轉來反對革命勝利時，以與資產階級奮鬥，——這些都不說到，而僅做些革命過程的一般敘述，關於我們行動上具體任務一點也不提到的敘述。

『新火星派』分析自己思想的方法，很與馬克思所批評的（見馬氏關於費爾巴黑的『批評』）這種和辯論沒有關係的舊唯物論相同。馬克思說，哲學家僅曾以各種方法來解釋宇宙，而問題却是在怎樣去改變這個宇宙。「新火星派」也是一樣，他們儘可敘述和解釋正在他們眼前所經過的鬥爭的過程，但不能够在這個鬥爭中提出半個正確的口號。他們努力得很辛苦，但是很不會指導，對於已覺悟到革命的物質條件且已站在先進階級前頭之政黨，在歷史上能够而且應當擔負的指導作用，他們置之不理，因之就輕視了對於歷史的唯物之認識。

第五章 應怎樣把革命推往前進

我們現在且將臨時大會決議中的最後一段舉出來分析一下

「在這些條件之下，社會民主派於革命全部過程中應保持之地位，是要最能保證自己可能把革命推往前進，且在要與資產階級政黨自私自利的政策，不徹底的政策奮鬥時，不致使自己掣肘，不致使自身為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所瓦解。

因此，社會民主派自己不應當以奪取政權或在臨時政府中分得政權為目的，而應持極端革命之反對政府黨的態度。」

主張採取最能保持社會民主派可能把革命推往前進的地位，——這一主張，倒是我們很歡喜很歡喜的。不過除了這個可愛的主張而外，我們還願有直接具體的指示，就是在現時政治局面之下，在關於召集國民代表大會的議論紛紛，計劃百出的時候，究竟社會民主派應當怎樣把革命推往前進。不懂得解放派要民衆與「沙皇」「妥協」那種危險理論的人，把一紙『決議』召集立憲大會謂為勝利

的人，不把宣傳必要臨時革命政府視為目前積極任務的人——這些人能否把革命推往前進？把共和政體的口號抹殺不提的人；能否把革命推往前進？這樣的人，事實上不是把革命推往前進，而是把它推往後退，因為在政治實踐上，他們已與解放派的態度立於同一水平綫上。我們的黨綱是要求以共和來代替專制的，倘在採取策略上的決議案以規定革命時期中黨在現在和最近將來的責任的時候，對於爲爭得共和政體而奮鬥的實際口號抹殺不提，那他們承認這個黨綱有何意義？原來解放派的態度——立憲民主資產階級的態度，在現在這時候實際上特別與我們之不同，恰恰是因為他們在決議召集全民立憲大會的時候，把這決議看作是徹底的勝利，而對於臨時革命政府與共和之問題却很靈敏的一聲不響！要把革命推往前進，要把它推出資產階級之君主派所推到的範圍以外，再往前進，那末，必須把與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之『不澈底性』不相兼容的口號，積極地提出來，且把它看作首要的問題。這樣的口號現在僅有二，即（一）臨時革命政府，和（二）共和政體，因爲「全民立憲大會」的口號是資產階級之君主派所假意接受的（參閱「解放社」的政綱），其假意接受的用意，就是要無形的避免革命，不讓革命黨全勝利，使大資產階級得與專制分肥。臨時大會對於上面這兩個唯一能够把革命推往前進的口號有何關係呢，我們看見他們對於共和政體的口號完全忘却了，而對於臨時革命政府的口號却拿來與解放派的口號「全民立憲大會」相對比，把兩者（即「臨時革命政府」與「立憲大會」——譯者）都謂爲「革命之澈底勝利」。

是的，這樣一個無容疑義的事實，我們相信定能爲俄國社會民主派中將來歷史家敘述歷史的路標。俄國社會民主黨曾於一九〇五年舉行臨時大會，通過一個決議案，其中說些關於必要把民主革命推往前進的好話，而事實上却反把這個革命推往後退，事實上沒有越過資產階級君主派的民主主義的口號，再往前進。

「新火星派」喜歡非難我們，說我們不看見無產階級將爲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解體的危險。我們很想有這樣一個人，他能把這個非難根據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所通過的決議原文證實一下。我們關於這問題現在回答我們的反對派說：在資產階級社會基礎上行動的社會民主派，在這種或那種的單獨情形之下，若不與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併列前進，則它將不能參加政治。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與你們的分別是，我們與革命的和要求共和政體的資產階級併列前進，同時不與它打成一片。而你們，却與自由主義的和要求君主政體的資產階級併列前進，也同時不與它打成一片。說來就是這樣一回事。

你們代表臨時大會在策略上所提的口號，與「立憲民主黨」即要求君主政體的資產階級政黨所提的口號相符合，同時，你們自己未注意到且未覺悟這種正相符合的情形，因之，你們實際上就變爲解放派的尾巴了。

我們代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在策略上所提出的口號，與民主革命的和要求共和政

體的資產階級所提出的口號相符合，這個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現在俄國還未形成一個大的民衆政黨。^{*}

這樣一個大政黨雖然還未形成，但若有人懷疑這種政黨的份子存在，那就證明他對於俄國現在所經過之事情，一點也不明白。我們準備（在俄國革命進行順利的時候）不僅指導已爲社會民主黨所組織的無產階級，而且指導能同我們併列前進的這個小資產階級。臨時大會因自己的決議案，致無意識的低降到自由主義的和要求君主政體的資產階級之水平線，第三次大會因自己的決議案，却是有覺悟的把那些有能力的民主主義的革命份子提高到自己的水平線去戰鬥，而不是去妥協。

這樣的份子，在農民中是最多的。在觀察社會各份子，按其政治上的傾向分成大部份的時候，我們可把革命的和要求共和政體的德謨克拉西看作與農民羣衆一樣，這自然沒有大錯誤的——不過要知道，當我們把這兩種東西看作是一樣的時候，是等於我們把工人階級與社會民主派看作是一樣的觀點的。我們可用另種說法把我們的結論表現出來：臨時大會在革命時期是用自己全民的和一般的**政治口號，無意識的把自身低降到地主們的水平線。

*「社會革命黨」是一個主張恐怖行動的智識份子集團，雖然這個集團行動在客觀上的意義，結局

是實現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任務，但還說不上是一個階級政黨的萌芽。

**我們在此處不提及農民運動的專門口號，因對於這些口號已有決議案說到。

第三次大會是用自己全民的和一般的政治口號把農民羣衆提高到革命的水平線。要是有人看了這個結論，便責備我們好說矛盾話，那我們就要請他試試推翻下面一個正確的觀點：若是我們將不能把革命實行到底，若是這個革命居然以「沙皇」所召集的那種代表會議（謂這種會議爲立憲會議，只是滑稽）即解放派式的『澈底勝利』告終，則這個革命將以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成份佔優勢。反之，若是我們能經過一個真正的大革命，歷史不讓這次革命流產，我們有力量以實行這次革命到底，使它達到澈底的勝利（不是解放派和「新火星派」所聲稱的那種『澈底勝利』），則這個革命將以農民和無產階級的成份佔優勢。

或許有人以爲這種『佔優勢』的論點，拋棄了我們相信現時革命之資產階級革命性的態度？若從火星報中那樣濫用名詞看起來，這種懷疑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就這個問題來觀察一下，也不是多餘的事。

第六章 無產階級與不徹底的資產階級奮鬥

時將自己掣肘的危險從何而來

馬克思主義者自然相信現時俄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性質。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在現時俄國成了必要的那些政治制度上的民主主義的改革，和社會經濟上的改革，其本身不但不會破壞資本主義的基礎，破壞資產階級的統治，而且相反，這些改革恰恰能够真正肅清大道，使資本主義得普遍迅速地發展，使資產階級統治成爲可能。社會革命黨不明瞭這個理論，因爲他們不知道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生產發達之粗淺規律，不知道縱使農民暴動完全成功，縱使能滿足農民的願望把全部土地都均分給他們（如「黑分派」及其同類社團的主張），那時還是不會消滅資本主義的，反之，均分土地，恰是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農民本身中階級的分化，小資產階級中無覺悟的思想家，社會革命黨對於這個原則是不瞭解的。主持這個原則，於社會民主派不但在理論上有大的意義，而且在實際上政治上也有大的意義，因爲從這一點的結論，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應在現時「全民德謨克拉西」運動中保持階級完全獨立的地位。

但從這一點，絕對不能說民主革命（按其社會經濟意義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對於無產階級就沒有大的利益。絕對不能說，民主革命只可以在有利於大資本家，財東，「受過洗禮」的地主之形式中實現，不可以有利於農民和工人的形式中實現。

「新火星派」對於「資產階級革命」一觀念的內容與意義，根本上瞭解不正確，他們的論述中，常見有這樣一種見解，就是把資產階級革命，看得似乎只是一種於資產階級有利的革命。這種見解是最錯誤沒有的見解。資產階級革命是這樣一種革命，這種革命是不超過資產階級，即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範圍的。資產階級革命是表現資本主義要求發展的革命，它不但不消滅資本主義的基礎，反而擴大這個基礎。因此，這個革命不但表現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表現全部資產階級的利益。但因在資本主義下面，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統治是必然的，故可大膽的說，資產階級革命所表現的無產階級利益，終不如資產階級之多。不過「新火星派」的見解，說資產階級革命完全不表現無產階級的利益，這是大錯而特錯的。這個錯誤見解的結果，或者是走到老民粹派的理論，說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的利益相衝突，故我們不要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或者是走到無政府主義，否認無產階級參加一切資產階級的政治，參加一切資產階級的革命，參加一切資產階級的國會議員主義。這種見解，在理論上是忘却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根據商品生產必然發展的粗淺原則。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說，以商品生產為基礎，且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交換關係的社會，到了發展的相當程度時，它自己必然走上資本主

義的道路。民粹派和無政府主義者以為像在俄國一樣，可在資本主義範圍之內，不用階級鬥爭，而採取別種道路以不經過這種資本主義的發展，避免這個資本主義或躍過這個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對於這類的夢想是毫無關係！

上述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已為一般的情形所詳細證實，也是為俄國的情形所證實，而從這些原則所得的結論，就是要救工人階級，除了在資本主義今後發展中去找尋出路外，想在任何地方去尋找出路的見解都是反動的見解。在俄國這樣的國家裏，工人階級所獲得資本主義的痛苦，倒還比不上它所得得資本發展不夠的痛苦。因此，工人階級無條件的需要資本主義最普遍，最自由，最迅速的發展，消滅國內一切所有障礙資本主義普遍，自由，且迅速發展的殘餘舊制，對於工人階級自然有利。資產階級的革命，正是最能決心消滅國內農奴制度殘餘（屬於這種殘餘制度的不僅止專制，君主政體也在內）的革命，也是最能保證資本主義最普遍，最自由，最迅速發展的革命。

因此資產階級的革命對於無產階級十分有利，以無產階級的利益着想，資產階級的革命是無條件的必要。若資產階級的革命來得愈決心，愈徹底，則無產階級為着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之鬥爭也愈有保證。祇有不懂得科學社會主義粗淺原則的人們，少見多怪，以為這結論是一種新的邪說。而這個結論中間，同時還有一個見解，就是在相當的意思上，可以說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的利益較大於資產階級。在什麼意思上可以說這個見解是無疑義的呢？原來資產階級願依托國內少數殘餘制度，如

君主制和常備軍等等以反對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以為資產階級革命，「下要把國內的一切殘餘舊制度掃除得太干淨，而要稍許保留幾種，就是說不要使這個革命太徹底，太堅決，太無情，方有利於自己。這種意思，社會民主派常常另一種話來表現，即謂資產階級對自身變節，資產階級出賣自由，資產階級不能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而奮鬥。資產階級為了有利於自己，寧可使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方面的各種必要的改革，不用革命的方法來進行；而用改良主義的方法，漸漸地，戰戰兢兢地來進行；使這些必要的改革，對農奴制度的（如君主制之類）『尊嚴』的機關要盡可能的謹慎，使這些必要的改革，對平民（即農民，尤其是工人）自動的革命性和自動的精神能力，要儘可能的少發展，因為若不如此，工人們便較容易『把所荷的槍枝由右肩轉到左肩』（如法國人所言）就是說較易利用資產階級革命所給予的武器，利用資產階級革命所給予的自由和農奴制度被推翻後所建設的一切新機關，倒轉來反對資產階級自己。

工人階級則反之，它為有利於己，以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方面必要的種種改革，不要用改良主義的方法來進行，而要用革命的方法來進行，因為改良主義的方法，是使腐朽的舊制度漸漸歸於『死亡』的方法。在這種舊制度腐朽而致於『死亡』的過程中，最受痛苦的首先就是工農羣衆。革命的方法是一種直接痛快的方法，這種方法，對於君主制及其他染有腐朽氣味的一切機關，如像『利刃斬麻』是最少讓步，最少謹慎和客氣，簡直把它消滅的方法，而對於無產階級，却是最少吃虧的方法。

唯其如此，所以自由資產階級出版物之害怕革命，拿革命二字以恐嚇「沙皇」設法避免革命，卑躬屈節的去求『維新』，找得改良主義道路的基礎，不僅是爲着出版物受檢查的原因，也不僅是因爲他們因恐怖而號泣革命道路之可能，而實有很深的社會階級利益爲背景。站在改良主義的觀點來說話的，不僅正俄國新聞、祖國之子、我們的生活、今日等報紙，且連非法的自由的解放報都是。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因自身階級的地位，必然產生它在民主革命中的不徹底性。無產階級因自身階級的地位，逼使它不得不爲徹底的民主主義者。資產階級的頭是往背後看去的，因爲它害怕民主主義的進化，因爲這個進化有使無產階級厲害起來的危險。無產階級却除了失落套在自己頭上的鎖鏈而外，什麼東西都不會失落的，而得民主主義之助，它可得着全世界。所以資產階級革命在其民主主義的改革方面若愈徹底，則這個革命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的範圍將愈縮小。若資產階級的革命愈徹底，則它愈能保證無產階級與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

馬克思主義給與無產者的教訓是，對於資產階級的革命不要取『隔岸觀火』的態度，不要不參加這個革命，不要把這個革命的指導權交給資產階級，而要很熱烈的參加這個革命，很堅決的爲無產階級的徹底的民主主義而奮鬥，爲革命到底而奮鬥。我們固然不能跳出現在俄國革命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圍，但我們能擴大這個範圍，我們能够而且應當在這個範圍之內，爲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奮鬥。爲無產階級目的直接需要及其達到最後勝利之實力準備條件而奮鬥。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德謨克

拉西，還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有鄉紳君主派，他們是主張上議院，『要求』普通選舉權的，而暗地裏，關於口鼻不全的短章憲法問題却秘密與專制政府分肥，——這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還有用武力反對地主和官僚，以『天真的共和主義者的性情』要求『驅逐沙皇』的農民，——這也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有德意志資產階級的民主制，還有英吉利資產階級的民主制，有奧大利資產階級的民主制，還有美利堅和瑞典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若在民主革命的時候把民主主義的程度及其各種形式間各種性質的分別輕視了，而只憑着『聰明才學』說，橫直這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橫直這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明瞭實際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的『新火星派』，就是這樣一批以近視自尊的『聰明才子』，且不說『新火星派』對於不徹底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與徹底的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中間有何分別的問題未曾觀察到，甚至當我們要將共和革命派的德謨克拉西與自由資產階級君主派的德謨克拉西中間有何分別一問題分析明瞭的時候，他們還是一味的空談着革命的資產階級性。當我們說現時革命中要予以民主主義的指導，要注重民主主義的激進口號，以別於斯脫羅威等一流人物的變節口號，要把無產階級與農民之真正革命鬥爭的最近的任務很簡單一切了當地指示出來，以別於地主和工廠主那種自由主義的妥協態度，——在這種時候，『新火星派』却拿些『各階級相互鬥爭的過程』等消極的說話以自滿，

他們的確在事實上成了『癡人木偶』呵。先生們，你們簡直未見到現在問題的要點就在這裏，即我們革命的結果，還是達到真正的大勝利，還是以一可憐的分贓了事；我們的革命還是能達到民主革命的農工專政，還是『徒費劬勞』，僅只得到一紙自由派的謝波夫式的憲法！

表面上看來，當我們提到這問題，似乎離開了本篇題目的範圍。但這只表面上感覺是這樣。實際上，現在已經使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所採取的策略與「新火星派」臨時大會所採取的策略，二者間原則上形成分裂之點，就在於這一問題。「新火星派」在解決本黨於革命時期中最複雜，最重要且最實際的策略問題的時候，重犯經濟派的錯誤，這已經不是倒退兩步，而是倒退三步了。所以我們必要很注意地來分析上面所提出的問題。

臨時大會的決議案，就上面摘錄下來的一段看來，曾指出這樣一個危險，就是恐怕社會民主派在與資產階級不徹底的政策奮鬥時，致自己掣肘，致自己身為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所瓦解。關於這個危險的見解佈滿了「新火星派」的全部專門著作，這個見解才真正是本黨分裂的全部原則問題的中心（自從這時候起，本黨的爭論的一些小問題已完全值不得注意了）我們也毫不支離彷彿的承認說，這個危險的確存在，尤其是現在，當俄國革命已經爆發的時候，這個危險已特別值得注意。我們社會民主派所有的理論家或（我對於自己就想這裏稱呼）政論記者應把這問題仔細分析，究竟在事實上這個危險是從那一方面發生的，——這是一樁急不容緩的事，是異常重要的任務。因為我們分裂

的起點，不是在於爭論有沒有這種危險存在，而是在於爭論這種危險的產生，是由於所謂「少數派」的尾巴主義，還是由於所謂「多數派」的革命主義。

爲避免誤解和誤會起見，應首先申明，我們所說的這個危險，不在於主觀方面，而在於客觀方面；不在於社會民主派要採取的形式上的態度，而在於現在全部革命鬥爭的物質行程。問題不在於這部份社會民主派或那部份社會民主派願不願在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中間瓦解，他們覺悟到還是覺悟不到自己那裏被瓦解，——關於這點沒有問題。我們不懷疑社會民主派中誰有這類的願望，況且這問題與願望沒有關係。問題也不在於這部份社會民主派或那部份社會民主派，能否在革命的全部過程中對於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保存自己形式上的獨立，形式上的特別。他們儘可不僅止宣佈這種「獨立」，且儘可在形式上保存這種「獨立」，但事情的結果，也許他們與資產階級的不徹底性奮鬥時，還是使自己掣肘，雖然能够保有形式上的「獨立」，雖然社會民主派能保全自己組織上的自立和黨的自立，但革命最後的政治總結，也許表現它在事實上不能獨立，表現它不能對於事變的行程顯示出無產階級的自立，也許政治鬥爭最後的結果，表現它完全沒有力量，而自身的被「瓦解」於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還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這才是真正危險的所在。我們現在且來觀察一觀察，究竟這危險是那一方面來的？還是如我們所想的樣子，這危險是從社會民主派新火星報之右傾而來呢，還是如「新火星派」所想的樣子，這危險

是從社會民主派多數與前進報等之左傾而來呢？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問題要看各種社會力量動作之客觀結構如何才能決定。這些社會力量的性質，已根據俄國的實際情況，按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在理論上分析得很清楚了，而現在實踐上，這些力量的性質，要看革命行程中各階級的公開行動如何才能決定。馬克思主義者在現在革命時期好久以前對於俄國實際情況的全部理論上的分析，以及對於革命事件發展之一切實際上的觀察，都證明給我們看，俄國革命有兩重行程和結局的可能，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方向來改革俄國現時的經濟政治制度是必然而且不可避免的。地球上沒有這樣一種力量能够阻礙這種改革。但按現在各社會力量動作的結構可有兩重結果，或這個改革的兩重形式。兩者中間只能有一種，即：（一）還是『革命能對專制徹底勝利』還是（二）達到徹底勝利的力量不够，結果，專制政府與資產階級中最『不徹底的』和最『自私自利』的份子分贓妥協。至其他一切詳細的推論和定奪誰也不能預先鑑定，而全盤計算起來，也不外乎上述兩種歸納，或是前一結局或是後一結局。

我們現在且來觀察一觀察這兩種結局；第一，按這兩種結局的社會意義來觀察；第二，按社會民主派在前一結局以後一結局時的地位（社會民主派之『瓦解』及其自己『掣肘』）來觀察。

何謂『革命對專制的徹底勝利呢？』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當「新火星派」運用這個語句的時候，連這語句最近的政治意義都不懂。他們對於這個觀念階級意義的認識尤淺薄。馬克思主義者無

論如何不應該像現在的多數革命民主主義者一樣（如加般一類的人）拿『革命』或『俄國大革命』等口頭上的話語以自欺。我們應該自己的確明瞭，究竟與『專制』（這個完全實際且是大家所知道的力量）對立且能對專制『徹底勝利』的是些什麼社會實際力量。大資產階級，地主，工廠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會』是不能成爲這種力量的。我們知道這些社會份子，甚至不想要徹底的勝利。我們知道他們按自己的階級地位是不能與專制堅決鬥爭的，因爲私有財產，資本，土地等太把他們的腳纏住了，幹不了堅決的鬥爭。因爲他們爲反對無產階級與農民，太需要專制政府及其警察官僚和軍事力量了，不能爲推翻專制而奮鬥。能够『對專制徹底勝利』的力量，只有民衆，如果拿根本的最大力量來看，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而城市與鄉村的小資產階級（也是『民衆』）可就這兩個根本力量來分插進去。『革命對專制的徹底勝利』即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這個結論是前進報久已指出來的，我們的「新火星派」總不能逃出這個結論。因除了這個根本力量而外，無論誰也不能對專制有徹底的勝利。

且這樣的勝利，定將成爲一個專政，就是說這樣的勝利，必然應當要依靠軍事力量，依靠羣衆的武裝和暴動，而不是依靠什麼別的機關——用『合法的』、『和平方法』而造成的機關。這只能是一個專政，因爲工農所需要的一些急不容緩的改革要實現，必然引起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專制政府的拚命的反抗。要打破這個抵抗，壓倒反革命的企圖，沒有專政是不可能的，但這自然將是一個民主主義的專

政，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這個民主主義的專政是不能動搖（沒有革命發展的許多過渡的階級）資本主義基礎的。它至多不過能把土地私有權根本上重新分配一次，以滿足農民的利益，施行徹底的完滿的民主主義，直至共和政體爲止，根本上剷除鄉村生活與工廠生活中的一切亞洲式和奴隸式的特點，認真開始工人地位的改良，及其生活程度的提高，最後（按數目上是最後，而不是按重要性爲最後），把革命的火烟遷移到歐洲去。這樣一個勝利，還是不能從資產階級的革命做出一個社會主義革命來的；民主革命是不能直接逃出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關係範圍的：雖然如此，但這種勝利對於俄國將來的發展和全世界將來的發展是有莫大意義的。能將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力量提高到這樣程度，且能將全世界無產階級達到完全勝利的道路如此縮短的，只有俄國已經開始的革命之徹底勝利。

這種勝利的可能如何，——這是另一問題。對於這問題，我們當然不是抱着盲目的樂觀主義，我們並不是忘却這個責任的大困難，但當我們開始鬥爭的時候，我們應當希望勝利，而且應當指出達到這個勝利的真正的道路。能夠達到這種勝利的傾向現在是有的。固然不錯，我們社會民主派對於無產階級羣衆的影響還很不充分，革命運動對於農民羣衆的影響還很小，無產階級和農民（尤其是農民）的渙散及其智識上的黑暗還是很大，但革命潮流能很快地把他們結合起來，很快的使他們覺悟起來。革命發展的每一步驟，都能喚起羣衆，且以莫大的力量吸引他們跟着革命的黨綱前進，因爲這是徹底表現真正羣衆利益的唯一的黨綱。物理學的定律告訴我們，動力與反動力成正比。歷史上革命的

破壞力量也差不多是一樣，而破壞能力的大小，要以壓迫自由力量之大小為標準，要以反古的『上層築物』與現代新鮮活潑力量間矛盾之深淺為標準。且現時國際上的政治情況，在許多問題上是最有利於俄國革命的。工人和農民的暴動已經開始，雖然這種暴動是分散的，自然爆發的，但誰也不能否認這種情形，是證明能去堅決鬥爭且會達到徹底勝利的力量，實是存在。

如若這種力量不夠，——那末，專制政府便來得及把分贓的事情結束，況且這種分贓的事情已有布盧根和斯脫盧威一般老爺們在那裏雙方準備。那末，革命的結局，就是一紙口鼻不全的憲法，或甚至是（壞而又壞的結局）狂吠一頓憲法了事。這也將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不過是流產，半生子罷了。

社會民主派自然不是自己妄想的，它知道資產階級變節的根性，縱有資產階級的憲法取得『謝波夫式的』光榮之一日，它還是不灰心，不拋棄自己對無產階級的革命訓練的努力和忍耐工作的。這樣的結局，將與十九世紀中歐洲所經過的一切民主主義革命差不多不相上下，而本黨的發展，亦將按困難，遼遠，且久已開闢而為我們所已經認識的道路進行了。

現在且問道兩個結局中，社會民主派在那一種結局之下，在反對不徹底的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的時候致自己實際上擊肘致自己實際上被瓦解，或差不多被瓦解於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

只要把此問題的本身這樣看清楚，便毫無猶疑地可以回答它。

若資產階級拿與專制分贓的方法得將革命破壞——那時社會民主派要反對不徹底的資產階級，定將實際上掣肘，那時社會民主派定將瓦解於『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因為那時候的無產階級不能使自身對革命有很顯著的影響，不能用無產階級的手段，或像馬克思曾經說過的一樣，『用平民的手段』以處置專制政府。

若是革命得能徹底勝利——那時我們能够用甲可賓的手段，或用『平民的手段』以對付專制。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曾在新萊茵報說過：『全部法蘭西的恐怖主義不是什麼別的方法，而是對待資產階級的敵人，對於專制，對待封建和小資產階級心理的一種平民手段』（見馬克思與恩格斯文集，梅林格出版第三卷，第二一一頁）。現在民主主義的革命時期，有些人非難俄國社會民主派的工人爲『甲可賓主義』，不知道這些人對於馬克思的這兩句話曾經加以思索沒有？

現代俄國社會民主派中的『基浪特派』*『新火星派』雖未與解放派打成一片，但在事實上，因其口號的性質，以致當了解放派的尾巴而解放派——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想要用緩和和改良的方法對付專制對貴族，皇親讓步，不要得罪他們，謹慎而敦厚，恭順而和睦，用貴人的客氣態度，帶白色的手套（如一九〇五年六月六日別龍劫維 Petrunkewick 在尼古拉歡迎『人民代表』（？）大會上

*『基浪特派』 Girondist —— 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右派，爲大商

工業資本的政黨。——譯者。

所帶的手套之類。)

現在社會民主派之「甲可賓派」*——布爾塞維克派，「前進報派」，第三次大會派，——是想要用自己的口號，把革命的和要求共和的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提高到無產階級（完全保存自己階級特立的無產階級）徹底民主主義的水平綫。他們想要民衆（無產階級與農民）用『平民的手段』對付君主專制和貴族，對自由的敵人要無情消滅，對敵人的反抗要用武力去推倒，對農奴制，亞洲式的專橫與侮辱人們的苛殘淫虐等遺孽，要毫不讓步。

這自然不是說，我們定要拿一七九三年的「甲可賓派」做模範，採用他們的黨綱，口號，及其行動的方法。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我們自己的黨綱不是舊的，而是新的——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最小限度黨綱。我們自己有了新的口號，——即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若是我們能達到革命的真正勝利，則我們亦將有適應自己政黨性質與目的之行動方法，即工人階級政黨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行動方法，我們只是要拿這樣一個譬喻，以說明二十世紀的先進階級的代表，即無產階級的代表——社會民主主義者之分成兩派（機會主義派與革命派），一如十八世紀之先進階級的代表，即資產階級的代表分為「基浪特」與「甲可賓」兩派一樣。

*「甲可賓」派 Jacobean ——為革命小資產階級的組織，曾推翻君主專制與封建，使法國革命

達到完全勝利。——譯者。

只有民主革命能得完全勝利的時候，無產階級與不徹底的資產階級奮鬥時，方不致自己掣肘，也只有在那種時候，無產階級方不致瓦解於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而對於全部革命行程都能與以無產階級的影響，或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影響。

總之，要在與不徹底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奮鬥時不使自己掣肘，無產階級就應有相當的覺悟與能力，俾能把農民提高到革命的自覺，領導其鬥爭，致自己能單獨實行無產階級徹底的民主主義。

與不徹底的資產階級奮鬥時致自己掣肘的危險一問題是應該這樣來觀察的，像「新火星派」那種說法，全不能使我們滿意。資產階級是永遠不會徹底的。規定某些條件和執行某些條件，然後認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是不會為民衆的假朋友，——這種辦法是再無聊也沒有的了。能為民主主義徹底奮鬥者，只有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之能為民主主義奮鬥勝利，只有在農民羣衆參加革命鬥爭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若是無產階級達到這個勝利的力量不夠，那時資產階級便要成為民主革命的首領，且使這個革命帶着不徹底的性質和資產階級自私自利的性質。若要這樣，我們便得着這樣一個結論，就是「新火星派」的策略，按其客觀的意義，正符合着資產階級的願望，宣傳組織上的渙散，甚且主張平民投票，妥協原則，使黨的出版物離開黨的指導，輕視武裝暴動的責任，把無產階級的一般政治口號與資產階級君主派的口號混為一談；曲解『革命對專制徹底勝利』的條件，——這些綜合起來，正造成一個尾巴主義的策略，錯亂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對於問題的認識，破壞其組織，蒙混其覺悟，而蔑視

社會民主派的策略，對於達到勝利的唯一道路，使要求共和的一切民衆革命份子都聯合到無產階級口號之下的等等問題，全然置之不理。

我們由分析臨時大會決議案而得到了上面的結論，現在爲證實這個結論，且將該問題由另一方面觀察一下。第一，我們來看看那個真直而公開的「孟塞維克」在格魯精社會民主黨上是怎樣解釋「新火星派」的策略，第二，我們來看現時政治局面之下，究竟新火星報的口號事實上爲誰所利用。

第七章 排斥政府保守黨的策略

我們在上面已經略為提及「孟塞維克派」提弗利司「委員會」機關報（社會民主黨第一期）所載的那篇文章：『鄉紳會議與我們的策略』這篇文章的著者還未完全忘掉我們的黨綱，故提出共和政體的口號，但他對於策略的問題却這樣說：——

為要達到這目的（共和政體），可指出兩條道路：或對於政府召集的鄉紳會議完全置諸度外，用武力推翻政府，建立革命政府，召集立憲大會，或宣告鄉紳會議為我們行動的中心，用武力威逼其人員及行動，強迫他宣告自己為立憲大會——或由他召集立憲大會。這兩個策略的分別是很明顯的。現在且來看看，這兩個策略中何者對於我們比較有益。

這就是「新火星派」對於我們在上面已經分析過的臨時大會決議案理論的解釋。我們要注意，這篇文章是在對馬島事件之前發表的，那時候，蒲利根的『草案』完全還未出世。甚至連自由主義者都不能忍耐了，在公開的出版物中會對政府表示不信任的意見，而新火星報的社會民主派，却比自由主義者還要堅忍。他們宣稱鄉紳會議正在『召集』，信任專制政府，把那個還未實現的鄉紳會議（也

許那是一個『國會』或是一個參議院吧！要我們拿來作爲自己行動的中心。是文的著者（提弗里司人），比較起草臨時大會決議案的人要爽直痛快得多，他不把他所提的兩個『策路』比較一下（而僅止無聊的說明了兩句），便直說第二個『策路』『較有益』聽他說下去吧！——

第一個『策路』是你們知道的，目前的革命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這個革命要造成的新制度不但於無產階級有關，即對於全部資產階級社會也有關。現在一切階級都反對政府，連資本家自己也是反對政府的。正在奮鬥的無產階級與正在奮鬥的資產階級在某種意見上是共同前進的，是共同從各方面向專制政府進攻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政府，完全孤立，得不着社會方面的同情。故要消滅這政府是很容易的。俄羅斯的無產階級要以自己階級起來實行革命，那邊缺乏覺悟，太無組織。即使它自己一階級起來實行，那它實行的不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了。所以我們爲有利於己起見，應使政府不能得着同盟者，不能離開反對它的各派勢力，不能把資產階級拉攏，而使無產階級陷於孤立的地位……

這樣，爲着無產階級的利益，要使專制政府不能離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喂！丟錯了吧，爲什麼格魯精的機關報名爲「社會民主黨」，而不名爲『解放』？請讀者注意，這是民主革命之何等世界無變的哲學觀呀！難道我們還不明白，這位可憐的提弗里司人對於『資產階級革命』一觀念完全陷入了

尾巴主義的迷夢嗎？他分析無產階級有在民主革命中可能孤立的危險，但他忘却——忘却了一樁小事——農民從無產階級可能的同盟者中，他知道且注意紳士和地主，而不知道農民，這還是在高加索說話呀！這樣看起來，我們說新火星報不設法把革命的農民提高為自己的同盟者，而反因自己的論調致將自身低降到資產階級君主派的水平線——這話難道不對嗎？

……否則，無產階級必然失敗，而政府必然得勝。專制政府就想達到這目的。它在鄉紳會議上，必將貴族，城市，大學等資產階級機關的代表拉攏到自己方面，必將以小的讓步使這些代表軟化，而使他們與政府妥協。政府能得這樣鞏固，便把自己所有的力量來對付孤立的工人羣衆。我們的責任，即在於提防這種不良的結果。但要達到這目的，是否可走第一條道路呢？假定我們現在對鄉紳會議完全置諸不理，而自己一心開始準備暴動，到某日某時，我們的武裝勢力便到街上去暴動起來，奮鬥。那時，我們面前不是一個敵人，而是兩個敵人即政府和鄉紳會議。且當我們準備的時候，他們已來得及商量，互相妥協締造一個於他們有利的憲法，而彼此分割政權。這簡直是於政府有利的一個策略，我們應一律的拒絕……

這才是老實的話了！要決心地拒絕準備暴動的『策略』因為在『這時候』政府可與資產階級去分吧！在『經濟派』舊的著作作品中可否還找得出與這樣污辱革命社會民主派相似而論調嗎？工人和農民的暴動，再接再厲，此屈彼起——這是事實。鄉紳會議，就是蒲利根的勾當。提那里司城的「社會

民主黨」公然決定：拒絕準備暴動，而等候鄉紳會議為『行動的中心』……

……反之，第二個策略，正是要使鄉紳會議受我們的監視，不給它以按自己意志行動而與政府妥協之可能（用什麼方法使鄉紳們不按自己意志行動？不是一紙特別文書吧？——著者）。

我們擁護鄉紳會議，是因為它與專制奮鬥；當這種會議與專制妥協時，我們還是與它奮鬥的。我們用武力把這種會議的代表隔離起來（哼！真是『深奧』的策略！沒有武力在街上爭鬥，而『隔離代表』却有武力了。聽呵！提弗里司的同志，吹牛是可以的，但要知吹牛的大小程度——著者）急進的代表們，——我們與之聯合，保守黨人，——我們將他排斥於政府之外，這樣一來，我們便可將全部鄉紳會議扶上革命的道路。這樣的策略，使政府常久孤立的，而使反對政府的力量是厲害的，如此，造成德謨克拉西制度便容易了。

好吧，好吧！現在去讓人家去說我們把「新火星派」描寫它傾向於經濟派的蠢笨太『張大其辭』了吧。這簡直與用鉛粉來對付蒼蠅一樣：捉住一個蒼蠅，撒些粉在牠身上，然後一棍一棍來打死牠。用武力來隔離鄉紳會議的代表，將『保守黨人排斥於政府之外』而全部鄉紳會議便走上革命的路了……不用任何『甲可賓式的』武裝暴動，而用溫雅的態度，好像在國會裏的辦法一樣，『強逼』鄉紳會議的代表。

可憐的俄羅斯！人們都說它永遠只戴歐洲拋棄不用的舊式帽子。現在國會還沒有，連蒲利根都還未來得及把它締造出來，而吟詠國會主義的聲調却是高莫可比了。

……怎樣去干涉這個鄉紳會議呢？我們首先就應要求，要這種會議用普通平等，直接選舉權和不記名投票法來召集。在這種選舉法頒佈的時候（在火星報上頒佈——著者），應規定選舉前宣傳的完全自由（山尼古拉規定麼——著者），即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且選舉人和被選舉人的權利應完全不受侵犯，政治犯應一律解放。選舉的時期應愈遲愈好，因我們要有相當的時間以認識民衆并準備民衆。且因召集鄉紳會議的規則，已任命內務大臣蒲利根的委員會起草，故我們也應強逼這個委員會及其會員（這就是所謂『排斥保守黨人於政府之外』的策略——著者）。如果蒲利根委員會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我們這方面既有正確且費過深思遠慮的策略，不會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著者）且把選舉權只交給有產階級，那時我們應干涉這個選舉，用革命的手段逼選舉人選舉先覺的份子，且在鄉紳會議上要求立憲大會。末了，我們可用種種方法，如巡行示威，罷工，且於必要時，暴動以逼迫鄉紳會議召集立憲大會，或要它宣佈自己爲立憲大會，立憲大會的保護者應當是武裝的無產階級，二者（是武裝的無產階級與被從政府排斥出來的保守黨人嗎——著者）并肩齊進而達到民主主義的共和政體。這就是社會民主派的策略，只有這個策略方能保證我

們的勝利。

讀者不要以為這篇無聊已極的論文是一個什麼不負責任和沒有聲望的「新火星派」初出茅廬的文字。不是的，這是在新火星派的整個執行委員會（提弗里司委員會）機關報上發表的。不但如此，這篇無聊的論文，簡直還為火星報所稱贊，該報第一期論「社會民主黨」說：

第一期的內容，已編得有生氣而精粹，可知編輯兼著者是一位富有經驗的聰明能手……。

他們可肯定的說，該報定能很壯麗的執行自己的使命。

不錯的！如果這個使命是在將「新火星派」的思想上的完全腐敗明白告訴人家，那真的可說執行得『很壯麗』。要就「新火星派」低降到自由資產階級機會主義水平線的情形這樣『有生氣而饒有興趣』地描寫出來，那真個除這個『能手』外誰也辦不到。

第八章 解放派與新火星派

現在我們且來看看關於「新火星派」另外一個有政治意義的證據。

斯脫盧威先生在其最優秀、最可領教的『怎樣找着自己』（見解放第七十一期）一文中與我們過激政黨的『黨綱革命主義』開戰。斯脫盧威先生特別是不滿意我個人*。至我一方面，對斯先生

*『以列寧及其同志等先生之革命主義爲比較，則西歐社會民主派如柏柏爾及考茨基之革命主義實一機械主義也；雖然，即列寧等先生革命主義之基礎，亦已爲歷史所洗滌而徹底澄清。』這一棍却打得很猛烈。可惜斯先生只以爲我是一個死人，什麼都可推到我身上來。我却只要質問斯先生一下，他便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在何時何地我曾把『柏柏爾和考茨基的革命主義』叫做機會主義，在何時何地我曾主張在國際社會民主派中創立特樹一幟的方向——不與柏柏爾和考茨基相同的方向；在何時何地我與柏柏爾和考茨基之間曾經發生過意見上之分裂——與柏柏爾和考茨基之間所曾發生異見（如關於布列斯拉夫的土地問題）相似的，我曾有過沒有請斯先生試一回答這三個問題。

是再滿意也沒有的了；在反對「新火星派」的「經濟主義」和「社會革命黨」的完全沒有原則的態度一點上，他是我最好同盟者，斯先生和解放報曾經怎樣地在實踐上證明了社會革命黨綱草案中對於馬克思主義加以『修改』的反動性，這問題我們當另作討論。當斯先生每次在原則上贊同「新火星派」時，他是如何的誠心幫助了我，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屢次說過，*現在不妨重說一次。

而對於讀者方面，我們應告訴的是：自由資產階級無時無地不用它慣用的手段，就是告知國內自己的同情者說，國內的社會民主主義是最愚蠢的，而其處在鄰國的同志却是『好孩子』。德國資產階級要柏柏爾和考茨基學法國社會主義者——『好孩子』已經不止數百次，法國資產階級不久以前也要法國社會主義者以『好孩子』——柏柏爾為模範。斯先生，這是人人知道的舊套子，只有小孩子和新娘子能被你引上這釣鉤吧！國際革命社會民主派在黨綱和策略的一切大問題上是完全一致的，

*讀者應回憶！不做什麼（火星第五十二期）那篇文章，曾為解放大吹大擂地慶祝一番，它認為這
 是一個對機會主義者表示讓步的「顯著的轉變」。「新火星派」之原則上的趨向，曾為解放報所
 特別嘉許，以為這是俄國社會民主派分裂的表徵。關於托洛茨基所著我們的政治責任一書，解放
 報謂是書著者的見解與前此「工人事務派」克里狄夫斯基、馬丁諾夫和亞坂母夫等所曾發表
 的見解同一性質，馬丁諾夫的兩個黨亦為解放報所稱贊。還有史達洛尼爾對於老火星的口號
 『先要分開後再聯合』所懷的不滿，也為解放所特別同情的。

——這是一個毫無疑義的事實。

斯脫羅威先生那篇文章中間有許多最有興趣的見解，我們現在不能詳論，只得略提。斯先生預備『建立一個俄國民主派，其力量不在於鬥爭，而在於階級合作』，同時，在『社會上有特權地位的智識階級』（斯先生所特別崇拜的『文明貴族』之類）『把自身所處社會地位的能力』（錢袋的能力）用於這個『超階級的』政黨，斯先生願意把人們所說『資產階級已經害怕了，賣了無產階級且賣了自由的過激語套』不適用於俄國的情形，告訴一班青年（我們十分歡迎這種『願意』。馬克思主義這種『語套』的得着證明，莫過於斯先生對於這一『語套』之宣戰。斯先生，請你做起來吧，不要把這個很好的計畫攔遲了吧！）

對於本題重要的，是要指出俄國資產階級中這位在政治上很靈敏，且對於風色的絲毫變動都能注意得到的人物，現時用些什麼實際口號在這裏戰鬥。第一是共和政體和政體的口號。斯先生確信這個口號，現時還為『民衆所不瞭解，且為民衆所見外』（他忘了添上一句：民衆是瞭解的，不過於資產階級不利！）我們願斯先生能到我們的小組會議和羣衆會議上去看看，工人們對這問題有什麼回答！或許說工人們不是民衆？那末，農民呢？據斯先生說，農民的共和主義是『幼穉的共和主義』（『驅除沙皇』）——但是自由資產階級相信將來代替幼穉共和主義的，不是有覺悟的共和主義，而是有覺悟的君主專制主義！斯先生這還要看情境如何才能決定哩。無論專制政府也好，資產階級也好，都不能

不反對處置地主土地以根本改良農民的生活，而工人階級在這一點却不能不幫助農民以達到目的。

第二，斯先生說『國內戰爭中攻擊人家者，想是不對的』，這個見解已經與上述「新火星派」的傾向很相接近，我們當然不能說國內戰爭中攻擊總是有利的——反之，有時候一定要有臨時的防禦策略。但是斯先生所提出的這種見解，若拿來應用於俄國一九〇五年的事件，那就是恰恰表示着一部份『過激語套』的現實性（『資產階級害怕，且出賣自由』）現在誰不想攻擊專制政府，不攻擊反動勢力，不准備這個攻擊，不去宣傳舉行這個攻擊，——他就是空負革命黨人名字，絲毫沒有價值。

斯先生很非難『秘密』工作與『騷動』（這是『葫蘆裏的暴動』）他以『接近羣衆的可能』（！）為觀點，蔑視『秘密』又蔑視『搗亂』。我們只要問問斯先生：如像『他看來是極端革命的人所著的做什麼』一書中，他能否指出宣傳搗亂的話語？至於『秘密』的問題，譬如在我們與斯先生之間的分別究有多大？不是我們兩個人都為『秘密的』報紙而工作且『秘密』的運到俄國以供解放社和俄國社會民主黨『秘密』組織之用嗎？我們的工人集會常是『秘密的』——這是一個缺點。但是解放派先生的集會呢？斯先生，試問你有什麼可在主張秘密的人的面前誇大自矜？

誠然不錯，工人們要得到槍枝，非加倍的秘密不可。在這一點上，斯先生却比較說的更痛快了。你們聽他說吧：『至於武裝暴動的事情，或革命的技術方面，那只有把民主主義政綱在羣衆中普遍宣傳，才能造成整個武裝暴動之社會心理上的條件。這樣，即使根據把武裝暴動看作是為現代自由而戰的必

然的結果一觀點（我所不贊同的觀點）來說話——使羣衆認識民主改革的思想，亦還是最根本，必要的東西。』

斯先生費盡氣力的想離開問題的本身。他不說爲革命勝利，故有武裝暴動之必要，而只說暴動的必然。現在暴動已經開始，不過它是無準備的，是自然暴發的，是散漫而無聯繫的罷了。自然誰也不能擔保這個暴動一定能擴大到整個的民衆武裝暴動，因爲這要看革命力量（這種力量的大小，要在實際戰鬥中才能完全度量出來的）如何才能決定；要看政府與資產階級的態度如何，又要看其他現在不能確計算出來的許多情況如何。依斯先生那種對於具體事變絕對確信的態度來說『必然』簡直是徒費口舌，說是要說的。不過斯先生若想做一個革命的黨人，他便應說：爲着革命勝利，是否有暴動之必要，是否有積極地主張宣傳，且從努力地準備這暴動之必要。斯先生不是不瞭解上面這兩個意思間的分別；譬如他不把在目前革命過程中獲得普通選舉權之必然的問題、對於政治家費爭論而且沒有實踐意義的問題（拿來埋沒那每個民主主義者所不爭論的普通選舉權之必要的問題。斯先生有意把暴動必要的問題放在一邊，這就很明顯的表示了自由資產階級政治態度的本質。資產階級是準備與專制調和而不把專制推翻的，——這是第一；第二資產階級無論如何總是厭惡鬥爭，而拿起槍來對付工人的。這就是斯先生擺開武裝暴動必要問題的實際意義。也就是斯先生避匿這問題不提，而拿什麼『社會心理』的條件和預先『宣傳』的問題來敷衍的原因。一八四八年的法蘭西革命，在要抵

抗政府的武裝力量，羣衆運動『已發展到』武裝戰鬥之『必要』，口頭上的批評（在準備時期必要的批評）已只是表示資產階級的『束手無策』和懦怯的時候，國會中資產階級的代表們還在那裏起草決議案，宣言和計劃，舉行『羣衆宣傳』造成『社會心理的條件』等事——現在的斯先生正是這樣：避開暴動的問題，拿口頭上的話語來敷衍。斯先生這樣很明顯的表示，却是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所看不清楚的，就是革命時期與平常一般的歷史的，準備時期之區別，即在於羣衆的感覺，羣衆的怒潮，應當在行動上表現出來，且正在行動上表現出來。

平凡的革命派，不懂得講話也是一種事情；這對於一般的歷史，或對於沒有羣衆公開政治運動（這種是爲任何方法所不能代替的，也是爲任何高明手段所不能引起的）的歷史時期是毫無辯解的。革命黨中的尾巴主義者，不懂得在革命時期已經開始，舊的『上層建築物』已經全部動搖，創造新上層建築物之階級和羣衆的公開政治鬥爭已經成爲事實，國內戰爭已經開始的時候，還是『仍舊貫』的只『講話』不提出直接『作事』的口號，只以造成『社會心理條件』和宣傳爲藉口而避開動作——這就叫做死無生氣，『專尙清談』或叫做出賣革命，對革命變節。法國民主主義資產階級的失敗者——即這種變節和清談愚笨在歷史上永誌不忘的覆轍。你們要不要解釋俄國社會民主運動歷史上平凡革命派與尾巴主義間的這個分別？你們能對你們有個這樣的解釋：試一回想一九〇一年和一九〇二年的事，這兩年的功夫過去還不久，而現在我們便感覺得那是好久以前的事實。當時巡行示威

運動開始了。平凡的革命派便大叫『衝鋒』起來（見工人事務報）。*大發『流血的傳單』（我還記得這傳單是由柏林發出的），攻擊『文學派』和以報紙為方法施行全俄宣傳運動的官僚性質的思想（拉德金）。* * 尼巴主義派當時的態度却是相反，他們宣傳說，『經濟鬥爭為政治煽動之最好的

* 一九〇一年的二月與三月間，許多地方曾經舉行學生與工人的羣衆遊行運動（二月十九日，哈爾可夫城為農民解放四十週年紀念，舉行遊行示威，繼起者，有莫斯科，比得堡和加莊等處）。二月二十三——二十六數日內，莫斯科的示威運動特別表現的勇敢，工人羣衆曾擊退干涉示威運動的哥薩克。莫京之有巷戰，此為第一次。這時候，『經濟派』的機關報『工人事務』（前此反對普列哈諾夫與專制政府激烈鬥爭的）便大吹大雷喊叫起來，用大號字發表一篇論文，顯為歷史的轉變，主張『應強有力的組織，以向專制政府衝鋒猛擊』。列寧關於這問題曾發表一篇評論，從什麼做起（一九〇一年五月間），說明現在的階段中號召羣衆起來暴動為胡鬧，——要號召暴動須先做很多的準備工作，如組織和訓練羣衆，出版一全俄政治機關報等。只有時時跟着羣衆尾巴上跑的人，才可見政治運動有高漲的傾向，不經任何過渡時期，便號召羣衆起來直接暴動衝鋒。——

摘譯自本書附錄。

* * 拉德金為自由社的首領，俄社民主黨第二次大會前，該社存在於國外，其思想是一種經濟派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混合物。他們主張『恐怖行動』。列寧稱之為『恐怖主義的經濟派』。——

摘錄自本書附錄。

方法。』那時候革命的社會民主派會作何態度呢？它對於上面這兩派都是反對的。它會痛罵那些關於衝鋒的胡鬧和輕薄的狂叫，因為當時大家都知道或應當知道公開的羣衆運動還沒有爆發。它會痛論尾巴主義的不是，且直接提出武裝暴動的口號，甚且是全民暴動的口號。自然這個口號在當時用意不是在於即刻號召羣衆去暴動（斯脫羅威先生在那時候便是找不出我們舉行『搗亂』的口號的），而是一種必要的結論，是要去『宣傳』（斯先生到了現在才想到這個宣傳——他對這些問題，總是事後數年才知道）要去準備爲那些手忙腳亂，咬文嚼字的自由主義者所『悲歡驚嘆，不合時節』。僅到現在才講到的『社會心理條件』，那時候的宣傳與煽動，煽動與宣傳，因客觀情形的要求，的確是首要的任務。那時候準備暴動的中心工作是（曾經在做什麼一書提出）出版一全俄政治機關報，不過原定每週出版一次的計劃未得實現罷了。那時候的口號是做羣衆的鼓動工作，不要直接的武裝暴動；做準備社會心理條件的工作，不要輕薄的狂叫——這是那時候革命社會民主派唯一正確的口號。現在呢，這些口號已成爲古董，只能爲遮蔽解放派的假面具和「新火星派」尾巴主義的工具了。

或許是我錯誤了吧？或許革命現在還未開始吧？各階級的公開政治運動時期現在還未到來吧？或是國內戰爭還沒有，且武器的批評不應當現在就成爲一定必要的批評的武器吧？*

* 馬克思在一八四三年『批評黑智兒的人權哲學』一文裏說：『批評的武器，自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評，物質的力量，自然應以物質的力量才能推倒。』

你只要看自身的週圍，從讀書室去到街上，便可回答這些問題。難道政府不已經開始國內戰爭，到處槍殺徒手和平羣衆嗎？難道保護專制政府的武裝百人團不已經開始向羣衆運動進攻嗎？難道資產階級——甚至連資產階級——不已經覺悟有『公民警察』的必要嗎？斯先生——思想上很溫和，頭腦很清楚的斯先生不正在說。（喂！只要口頭上說，以便避匿起來吧！）『公開的革命行動』（像我們現在這樣）『爲現時訓練民衆最重要的條件之一』嗎？

誰是明眼人，他就自然會毫無疑義的知道，現在的革命黨人對於武裝暴動的問題應持若何態度。試閱現時能够稍許影響羣衆的機關報，便可曉得對於這問題的態度有三種。

第一種態度，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決議案所提的態度，該決議案承認且大聲疾呼的說，現在普遍的民主革命運動已經發展到武裝暴動之必要。爲暴動而組織無產階級，是目前急不容緩的責任，是本黨最實際，最重要且最必要的責任。且爲武裝無產階級與保證直接指揮暴動之可能起見，已決定採取各種最有力量的辦法。

第二種態度，是解放報中原則上的論文，『俄國立憲派的首領』（不久以前歐洲資產階級的機關報法國報曾把斯先生這樣稱呼過）或俄國進步資產階級的首領所持的態度。關於暴動必然的意見是他們所不同意的。由他們看來，秘密與搗亂——是愚蠢革命派的專長手段。共和主義——是胡鬧的辦法。武裝暴動——老實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最根本，最主要的事情』是向羣衆宣傳且準備社會

的心理條件。

第三種態度，是「新火星派」臨時大會決議案所持的態度。他們以為我們的責任——是在於準備暴動。有計劃的暴動是沒有可能。有利於暴動的條件，是由於政府的散漫，我們自己的煽動和我們自己的組織而造成。只有在那些條件之下「技術上戰鬥的準備才能得着多少真正的意義。」

「新火星派」的態度只是這樣嗎？只是這樣暴動是否成了必要，無產階級的首領「新火星派」對於這問題是還不知道的。為直接鬥爭而組織無產階級的責任是否可容遲緩，他們也還不明瞭。他們以為不要號召採取最有力量的辦法，而對於他們最重要的（這是在一九〇五年，而不是在一九〇二年）是在於一般的解釋這些辦法，在些什麼條件之下這些辦法「才能」得着多少真正的意義……

「新火星派」的同志們，你們傾向馬丁諾夫已使你們走到什麼地方了，現在該看清楚了罷？你們政治哲學已弄成了解放派的哲學，你們自己明白了罷？——你們自己成了（固然這是違背你們的志願且未按照你們的覺悟）資產階級君主派的尾巴，你們明白了罷？你們重犯舊錯，「專尚清談」，忘掉了一種情形，即（用斯脫羅威先生那篇不可忘記的文章中不可忘記的話來形容）『公開的革命行動為現時訓練民衆最重要的條件之一』——這話你們現在該明白了罷？

第九章 何謂在革命的時候持極端反對政府黨的

的態度

我們現在且回頭來講臨時政府的問題。我們在上面已經證明，「新火星派」的策略不是把革命推往前進，——若要有這可能，他們便要拿自己決議案來保證，——而是把它推往後退。且已證明，與不徹底的資產階級奮鬥時致使社會民主派自己掣肘，且不能提防自己瓦解於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斯者，就是「新火星派」這個策略。決議案的前提既不正確，自然由此所得的結論也不正確，所以該決議案說：『因此，社會民主派不應當以奪取政權或在臨時政府中分得政權為目的，而應持極端革命之反對政府黨的態度。』試以他們這一結論的前半節——規定自己目的的前半節來看，「新火星派」是否把革命對專制的徹底勝利看作是社會民主派行動的目的呢？——是的，他們是這樣看的。不過他們不會界說徹底勝利的條件，而與解放派所說的條件混作一塊。再他們是否把臨時政府與暴動看得是有密切聯系的呢？——是的，他們是把這兩件事看得是有密切聯系的，且他們直說臨時政府是『由民衆暴動勝利產生出來的。』末了，他們是否以指揮暴動為自己的目的呢？——是的，他們固然與斯

脫盧威先生一樣，不承認暴動是必要的，且是急不容緩的，但他們同時却又與斯先生不同，謂社會民主派應設法使暴動受自己的影響和指導，並利用之以實現工人階級的利益。

你們看，這不是很有聯系的嗎？我們的目的是使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羣衆的暴動受我們的影響和我們的指導，並利用之以實現自身的利益。所以我們的目的，是在暴動的時候指導無產階級，又指導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非無產階級的部份）換言之，即社會民主派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分開』來指導暴動。我們的目的，是在使暴動勝利而建立臨時政府。『由民衆暴動勝利而產生的臨時政府』因此……因此我們不應以奪取政權或在臨時革命政府中分得政權爲目的！

我們的朋友，無論怎樣也不能使頭尾相合。他們在避開暴動的斯先生之觀點與承認要即時進行這個問題社會民主派之觀點之間，搖擺不定。無政府主義在原則上是承認一切參加臨時革命政府都是對無產階級變節的，而馬克思主義，却在社會民主派對暴動有指導影響的條件之下，是要求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我們的朋友還在這兩者之間搖擺不定。他們沒有任何獨立的態度：不像斯脫羅威先生的態度一樣，願意與「沙皇」妥協，故此，他應當避開暴動的問題，也不像無政府主義者的態度一樣，否認一切『自上而下』的行動，否認對於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切參加。「新火星派」把與「沙皇」分贖和對「沙皇」勝利的兩件事弄得糊塗莫辨，他們想參加資產階級的革命。他們比馬丁諾夫的『兩個專政』稍許進步了些。他們甚至贊同指導民衆的暴動——以便於暴動勝利之後（或許在要直

接勝利的時候)馬上放棄這個指導,換言之,以便於暴動勝利之後,不利用這個勝利的結果,而把這些結果完全交給資產階級。這在他們看來是叫做「利用暴動以實現工人階級的利益!」

沒有必要再將這個糊塗觀念分析下去了。現在就他們「持極端革命之反對黨的態度」一辭句來觀察——觀察這個糊塗觀念的起源,却較有益處。

我們有一個國際革命社會民主派大家所認識的原則,這是完全正確的原則。是在有國會的國家裏一切反對修正主義或機會主義的共同方法。是抵抗國會主義,米勒蘭主義,伯因斯坦派*意大利改良主義者那拉底**一流人物的必要的公律。我們那些善良的「新火星派」對於這一原則大吹大擂且把它運用起來……這完全不合時節。現在什麼國會都沒有,決議案中却寫起國會鬥爭的原則來了。「反對黨」一觀念,是在沒有人真正說到暴動時政治局面的一種反映和表現——現在的政治局面是暴動已經開始,且凡是革命的黨人都正在討論對於這個暴動的指導——在這種情形之下,「反對政府黨」的觀念無意思的被挪到俄國來了。現時的革命要求於勝利時必要自上而下的行動——正

* 伯因斯坦 E. Bernstein——是德國有名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於一八九九年曾著社會主義的

前提一書,其內容主張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社會民主派的實際。——譯者。

** 都拉底 Turati——為意大利改良派的首領,主張階級協作,參加資產階級的政府,世界帝國

主義大戰時,他的態度是騎牆的和平態度。——譯者。

在這時候，他們却還大聲疾呼表示願意如在以前情況之下一樣，『保持』僅止自下而上的行動。

我們的「新火星派」真糊塗之極！甚至當他們提出社會民主派的正確的原則時，他們還是不會運用這原則。他們想不到，在沒有國會，而革命已經開始的時候，國會鬥爭實際的觀念和術語是怎樣的變成了自己相反的方面。他們想不到，在現在條件之下，上書建議應以遊行示威為方法來實現，請願質問應以武裝民衆攻擊行動為方法來實現。

俗傳有學道賀吊喪的愚人，當遇見送葬的人，他道賀，遇見接親的人，他吊孝，崇拜馬丁諾夫的人也一樣不識時節，正當他們自己眼見着武裝直接行動已經開始的時候，却反來背誦那和平國會主義的教訓。臨時大會的決議案開始說，『革命的徹底勝利』民衆的暴動，後面却正正經經提出『極端反對政府黨』的口號——這是何等的奇怪呀！先生們，你們也想想吧！究竟什麼叫做在暴動的時期自己持「極端反對黨」的態度？這是批評政府，還是說推翻政府？是說投票反對政府，還是說在公開的戰場上擊敗政府的軍事力量？是說拒絕補充政府的國庫，還是說用革命的手段奪取這個國庫，以充暴動，武裝工農，召集立憲大會之用？先生們，你們該開始明白了罷：「極端反對黨」的觀念是表現着消極的態度——批評，投票反對，拒絕，為什麼是這樣？因為這個觀念是僅止在實行國會鬥爭，而誰也不以『徹底勝利』為目的的時期才可運用的。你們該開始明白了吧；在政治上受壓迫的民衆為勝利而已起來作堅決鬥爭的時候，這情形就根本變動了哩？

工人們現在問我們，是否要努力來進行不可延緩的事——暴動呢？要使已經開始的暴動能得勝利，應怎樣辦才好呢？怎樣利用這個勝利呢？那時候可以而且應當實現一個什麼黨綱呢？深解馬克斯主義的「新火星派」回答說：保持極端革命之反對黨的態度……哼……我們曾經叫這些英雄爲坐井觀天，胸襟窄狹，不識時務的上等名角，難道不是對的？

第十章 革命的公社與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

「新火星派」臨時大會對於新火星報所主張的無政府主義的態度（僅只「自下而上」，而「自下而上」同時又自上而下）沒有堅持到底。主張暴動，而不主張勝利和參加臨時革命政府——這種愚笨未免太打眼了。因此決議案對馬丁諾夫和馬爾托夫的意見只得添了一些申明與限制。我們現在且來看看這些申明。該決議案說：

『這個策略（「保持極端革命之反對黨的態度」）對於部份的與非根本的 *Episodheskii* 奪取政權之便利，自然不是除外的，對於在這一城市或那一城市，在這一區域或那一區域建立革命的公社專為促進暴動之擴大和政府組織之破壞一意見，也不是除外的。』

若果是這樣，那就是說在原則上主張不但自下而上的行動，而且要自上而下的行動。那就是說馬爾托夫在火星報上（非第九十三期）所做的那篇評論便要推翻*而承認前進報所主張的策略——不僅『自下而上』，且要『自上而下』是正確的了。

再，這裏所謂奪取政權（固然是部份的，非根本的等等）不言而喻的是不僅以一個社會民主派和一個無產階級的參加爲前提的。這是以主張民主革命且積極參加這個革命的不僅只一個無產階級爲前提的。這是以暴動爲『民衆的』暴動，參加這個暴動的尙有『非無產階級的部份』（這是臨時大會派決議案中關於武裝暴動的術語）——即資產階級的部份爲前提的。這是說，承認社會主義者爲小資產階級一同參加任何臨時革命政府是對工人階級變節的原則，被臨時大會『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這正爲前進報所會要求的。若謂造成變節的行爲，只是部份的，非根本的，和區域的等，那還是不能說這個『變節』便成了不變節。這是說，把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拿來與卑鄙的趙列司主義相對比這一把戲，也被臨時大會『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這也正爲前進報所久已要求的。若謂這個政府的權力不普及於許多城市，而只及於一個城市，不普及於許多區域，而只及於一個區域，那還是不能說這個政府便不成爲政府了，同樣，任憑你把這個政府怎樣命名，那這個政府還不失其爲政府。這樣，新火星報對於這問題曾經想要保持的原則上的態度，已爲臨時大會所推翻。

*馬爾托夫曾在火星報上第九十三期（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七日）發表一篇評論，題名工人的政權與奪取政權爲我們最近的責任。馬爾托夫在這篇文章中批評巴爾格司（Parvus）與托洛斯基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之後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口號。馬爾托夫主張俄國社會民主黨應持極端革命之反對黨的態度。——摘譯自本書附錄。

臨時大會既在原則上主張建立革命政府和參加革命政府，那麼，它對於這種政府之建立和參加所規制的限制又有何意義，——現在是就這點來觀察一觀察。『非根本的』與『臨時的』二觀念有何分別，我們不知道。恐怕這裏是僅以這一『新奇』字眼來敷衍那思想上的糊塗吧。就這個字眼來看，表面上好像是『深奧點』，但事實上——這只是表示更不明白，思想更混亂罷了。在某都市裏或某區域裏部份『奪取政權』的『便利』與參加全國臨時革命政府有何分別？像彼得堡這樣曾經發生過一月九日事變的地方難道不是那些『都市』中之一嗎？像高加索這樣大過許多國家面積的地方，難道不是那些區域中之一嗎？難道監獄、警察局、會計處等等的問題，甚至在一個都市裏（且不說在一區域裏）『奪取政權』時不會發生嗎？在力量不夠，暴動不能得到完全勝利和澈底勝利的時候，自然有些部份的都市的，……臨時革命政府之可能，——誰也不否認這個。但是這與問題有什麼關係？不是你們自己在決議案的開始一段中說『革命澈底勝利』說『民衆暴動勝利』的話嗎？分散無產階級的注意力與目標——指導它去作『部份的』鬥爭，而不指導它去作共同的，一致的，全部的和完滿的鬥爭，——這種無政府主義者幹的事情，社會民主主義者從何年何月起開始為他們負責代庖的呢？你們預定在一都市裏『奪取政權』同時自己又說是為『擴大暴動』——我們可否說把它擴大到其他都市呢？可否希望把它擴大到其他一切都市呢？先生們！你們的結論與你們的出發點是同樣動搖且無系統，矛盾且非一貫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關於一般的臨時革命政府的問題，給了一個

完滿而且明顯的回答。這個回答對於部份之臨時政府是包括在內的。而臨時大會的回答，却把問題的一部份任意劃分出來，而逃避（但沒有成功）全盤的問題，弄得一團糟，什麼都辯不清楚。

何謂「革命的公社」？這個觀念與「臨時革命政府」觀念有分別沒有？若是有分別，則分別何在？這是臨時大會派自己所不知道的。他們的革命思想之亂雜，如常有的事實一樣，使他們犯了革命的辭令病。在社會民主派代表會議的決議案中運用「革命的公社」一術語，除為一種革命的辭令外，別無他意。這類的辭令是無異拿已成過去之「動心奪目」的術語以遮蓋未來的責任，曾為馬克思所歷次非難。在歷史上有過作用的漂亮術語，在現在的時候却成了空洞而有害的謬說，小孩玩的衝天炮。我們現在對於工人與全體民衆應給一明白確定的觀念，為什麼我們要建立臨時革命政府，若已經開始的民衆發動結果能得勝利，且我們對臨時革命政府將有很大的影響，那我們要實現一些什麼改革。這些問題才是政治首領目前應回答的問題。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大會對於這些問題會有最明顯的回答，它對我們將要實現的改革會歸納成一完滿的政綱，即最小限度的黨綱。而「公社」一名詞却什麼回答都沒有給，僅只使人家「顧無聊」，埋頭聽着遠遠的鐘聲罷了。歷史上的事實，如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其名聲對於我們愈貴重，則我們若不分析它的錯誤，與當時的特殊條件，便愈不可任意借用。如若不然，那便要重犯，為恩格斯所恥笑，對於「公社」一切行動都崇拜恭維的白朗基派（一八七四年白朗基派的「宣言」）

的錯誤。若有工人對臨時大會派問及決議案中所述這個「革命公社」的事情，我們的臨時大會派將怎樣設法呢？他只能說，歷史上「革命公社」一名詞是指的一個工人政府，這個工人政府曾經不會且不能瞭解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的分別，曾把為共和政體而奮鬥的責任，與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責任混作一塊。曾不會以軍事手段猛烈地攻擊凡爾塞，曾犯了不估領法國銀行的錯誤等等。總之你們在解釋這個問題時，無論拿「巴黎公社」為例也好，拿其他公社為例也好，你們的回答只有一個，即這樣一個政府，應該不是我們的政府。這個回答是好的，別無他話！可是關於黨的實踐黨綱一聲不響，不問必要與否，在決議案中開始講授歷史起來，——是否證明這是一種書獃子的清談與革命黨人的懦弱呢？有些人空費力量的非難我們，說我們的錯誤是在把與任何「公社」不同的民主革命與社會革命混為一談，上述那種情形，不正是表示臨時大會派犯有這種錯誤嗎？

臨時政府（把它名為公社是不通的）的目的在於「專為」擴大暴動與破壞政府的組織。「專為」二字的本意，是說撇開其他一切的責任，而為僅祇「自下而上」行動愚笨理論的口供。這種撇開其他責任的態度，仍舊是表示一種近視和空浮。「革命的公社」即革命的政權（甚至在一個都市裏的革命政權）必然要執行（不管他臨時的執行也好，「部份的非根本的」執行也好）國家的一切事務，若在這裏便害怕起來，把頭躲在被窩裏面，不顧實際，——那就是愚蠢之極。這個政權，一應規定八小時的工作時間制，二應創設工人監督工廠制，三應辦理免費的普通教育，四應規定審判官的選舉制，

五應設立農民委員會，以及其他等等的職務——總之，這個革命政權定要施行許多的改革。把這些改革都歸納到『促進暴動之擴大』觀念，無異是說廢話，且於必要澈底明白的地方，反而故意使它更不明白。

「新火星派」決議案最後的一段中，無新的材料可供我們批評本黨中『經濟主義』重新發生後原則問題之用，但這一段却更可以另一方面證明上述的分析。

這一段說：『僅祇在一種情形之下，社會民主派應自動的運用一切力量，以求握得政權，且掌握這政權在自己的手裏應盡可能的求其長久，——這種情況，就是要假設革命已經蔓延到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已達到相當（？）成熟的西歐各先進國家。在這種情況之下，俄國革命範圍在歷史上所受的限制才能大大地推開，走上社會主義改革道路的可能才得出現。』

社會主義派採取的策略，是使社會民主黨在全部革命期間對革命行程中一切此伏彼起的政府保持着極端革命之反對派的態度，同時，最好能準備起來，俾於政府權力落到（？）自己手裏來的時候，能利用之。』

這一段的根本意思是前進報曾屢次提及的，它曾屢次說，我們不應當害怕（如馬丁諾夫害怕一樣）社會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完全勝利，就是不要害怕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因為這種勝利能使我們喚起歐洲的無產階級，而歐洲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壓迫，同時就可幫助我們完

成社會主義的革命。但請你們看看，這個意思就「新火星派」解釋起來，是如何的減色了。我們請不談枝葉的問題——比如說，政權似乎能『落到』有覺悟的政黨手裏來，能『落到』認奪取政權的策略爲有害策略的政黨手裏來；如歐洲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不僅已達到相當的成熟，而已達到一般的成熟；又如我們的黨綱不知道任何社會主義的改革，而只知道社會主義的革命。現在只拿前進報與臨時大會決議案二者在思想上的主要和根本異點來觀察前進報對於俄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曾示知以積極的責任——在爭得德謨克拉西的奮鬥中達到勝利，且利用這勝利以轉延革命於歐洲，臨時大會決議案却不懂得我們這個『澈底勝利』（不是「新火星派」所說的那種「澈底勝利」）與歐洲革命二者間彼此的聯系，故所說的不是無產階級的責任，不是無產階級勝利的希望，而是說明一般可能中之一個可能：『假設革命已經蔓延到』……前進報已直接了當指明出來，（且這些指示已載入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的決議，）究竟怎樣可以而且應當『利用政府權力』以求無產階級利益之實現，認明在俄國現時會發展的階段上可能而且必要首先實現什麼，以作爲社會主義奮鬥之民主主義性質的先決條件。決議案却是失望的跟着尾巴後面跑，它說：『最好能够準備起來俾……利用』，而不會說明怎樣準備，怎樣去利用。譬如我們知道，「新火星派」『能够準備起來，以利用』黨中的指導權位，但是問題不在這裏，問題是在於「新火星派」直到現在對於這種利用的經驗及其準備不能夠保證使可能成爲實際。

前進報已正確說明，究竟有何種實際的『可能以掌握政權在自己的手裏』——這備可能即在民主革命之工農專政，在於工農聯合之羣衆力量，因為只有這力量才能够征服一切反革命，在於民主主義改革一點上工農利益必然之一致。臨時大會之決議在這問題上也沒有絲毫積極之回答，而僅用些遁辭以避開這問題。如要在俄國掌握政權，自然應根據俄國階級力量的成份說話，應根據俄國目前民主革命的條件說話。不知歐洲無產階級之勝利（且自革命移到滿洲起至無產階級勝利止，還有相當時間之距離）定然引起俄國資產階級之大反革命，——俄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大會議案對於這個反革命力量的意義已有估計，而「新火星派」的決議案關於這問題却一字不提，因此，若是除無產階級外，我們不能同時拿住農民作爲爭得共和政體與民主主義之力量，則『掌握政權』的事將成失望。但若這事將不成失望，若『革命對專制澈底勝利』能予我以『掌握政權』之可能，——那我們更應明顯的指出這種可能來，並積極的使這種可能由理想變爲事實；不但應提出革命可能移到歐洲的實際口號，而且應提出怎樣移到歐洲的實際口號。社會民主派的尾巴主義者，總是藉口於『俄國革命範圍在歷史上所受的限制』，這種藉口，只是掩蔽他們對於這個民主革命責任與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的領導作用瞭解之窄狹罷了！

• 反對『民主革命之工農專政』口號的意見有好幾種，其中傳佈最普遍的，謂專政應以『共同意志』爲條件，而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無共同意志之可能。這種意見不澈底，因爲它對共同意志的觀

念，是根據抽象的『形式上』的態度來解釋的。不知意志在某一時候是可以共同的，而在另一時候是不可以共同的，在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和為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無共同意志，但這不是說在民主主義的問題上和為實現共和政體的鬥爭中也無共同意志。如果忘了這點，就等於是忘了民主革命與社會革命在邏輯上和歷史上的分別。如果忘了這點，就等於是忘了民主主義革命的全民性質：若是『全民的』那就是說這裏有一個『共同的意志』，因為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一個實現全民需要與要求的革命。超乎民主主義的範圍以外，自然說不上無產階級與農村資產階級之意志共同。這兩個階級間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民主共和制的基礎上，這種階級鬥爭將成為爭得社會主義之最深刻且最普遍的民衆鬥爭。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像世間一切存在的物件一樣，是有其過去與將來兩方面的。其過去的方面為專制，農奴制度，君主，特權等。在反對過去這些成份時，與反革命鬥爭時，無產階級與農民有『共同意志』之可能，因為他們有共同的利益。

其將來的方面——是反對私有財產制，僱傭工人為反對主人而鬥爭，因為這裏的道路，不是由專制達到共和的道路，而是由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達到社會主義的道路。

在歷史上具體的事件，過去的成份與將來的成份自然沒有這樣分明。前一道路與後一道路總是交相綜錯，僱傭勞動及其反對私有財產制之事實，在專制之下也是有的，而且在農奴制之下就已萌芽了。但還是不妨礙我們把社會發展的過程在邏輯上和歷史上劃分為數大時期來觀察。我們都是主

張把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兩個對立的東西，而且都是主張必要把這兩個革命嚴厲分開的；但是因此便能否認歷史上前一革命與後一革命的各個成份是交相錯雜的嗎？難道在滿洲的革命時期中，不會有過許多社會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的企圖嗎？又難道在將來的歐洲社會主義革命時，不還有許多帶着民主主義性質的問題需要完滿解決嗎？

凡是社會民主主義者，都應時刻不忘無產階級爲着社會主義是必然要與民主共和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鬥爭的。這話毫無疑義。唯其如此，所以社會民主派應是一獨立的嚴厲的階級政黨。唯其如此，所以我們與資產階級『合作』是臨時的性質，所以『對待同盟者應如對待敵人一樣』取嚴厲監視的態度。凡此等等，也都是毫無疑義的。但若因此便忘記，不理或輕視目前臨時過渡的緊急責任，那便是笑話，是反革命與專制奮鬥——是社會主義者的一個臨時過渡責任，但若不理或輕視這個責任，便無異對於社會主義變節，爲反革命黨工具。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自然只是社會主義者的一個臨時過渡責任，但若在民主革命的時期置這責任於不理，那簡直是反動。

具體的政治責任，應在具體環境中提出來。一切情況都是相對的，流動的，變遷的。德意志的社會民主派，沒有把共和政體的要求載入自己的黨綱。他們那裏的情況不同，故共和政體的問題與社會主義的問題在實踐上很難分開，（固然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批評愛爾富政綱*的時候，也曾提醒德國人不要輕視共和政體，以及爲爭得共和政體而奮鬥的意義）俄國社會民主派中，連關於要取消黨綱裏

和日常煽動工作中共和政體的要求的問題都未發生過，因為在俄國這樣的國家，要說共和政體問題與社會主義問題有不可間斷的聯系，簡直無從起齒。一八九八年的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專心提出共和政體的問題作為首要的問題，是一種盡人皆懂，不引起任何非難的自然現象。如果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在一八四八年把關於共和政體的問題放在一邊不理，那他們便成為革命的直接叛變者了。沒有抽象的真理，凡真理總是具體的。

當與專制的鬥爭要完結時，俄國民主革命的時期便要成為過去，若在那時候還來談什麼無產階級與農民之『共同意志』和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等話，便要成為笑話。那時候，我們便要直接地想一想無產階級之社會主義專政，且詳細地來討論一討論這個專政。而現在呢，先進階級的政黨，不能不很努力的以求達到民主革命對專制之澈底勝利。而民主革命之澈底勝利不是別的，就是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

* 德國社會民主派的愛爾富政綱 (Erfurt programma) 曾受恩格斯的批評。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恩格斯寄此批評給考茨基，僅至後十年才在新時代雜誌發表。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對此批評有詳細的分析——摘譯自本書附錄。

第十一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大會與臨

時大會幾個決議案的概略比較

臨時革命政府的問題，是社會民主派目前策略問題中的中心問題。要將臨時大會所有其他決議案都拿來作同樣詳細的分析，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我們只將提出數條，以證明我們在上面已經分析過的第三次大會與臨時大會決議案在策略方面之原則上的異點。

試就革命成功前對政府策略應持的態度問題而言。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決議案中，你們對這問題能獲得完滿的回答。這個決議案，會觀察到特殊情形時各種不同的條件與任務：如揭破政府護步的假面具，利用『民衆代表會議的滑稽形式』，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工人階級現時的要求，（其中首要者爲八小時的工作時間制）以及與「百人團」* 奮鬥等事。這問題在臨時大會的決議案中，却是

* 「百人團」(Cheornay Sotnia) 是一九〇五年「沙皇」政府的官僚組織的，其份子爲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流氓無產階級。此種強盜團體之設立，專爲殺害工人學生，自由主義的智識份子和猶太人等。「百人團」爲君主團體之基礎，君主團體中之最大者，爲「俄民同盟」…… (Russian Peoples) 和「亞爾漢格聯合會」(Union of mihel-Athangel) —— 摘譯自本書附錄。

分爲幾個單獨的決議來敘述的：『抵抗反動勢力』的問題僅在對其他政黨關係的決議案的原由中提了一提。參加代表機關選舉的問題，却在專制政府與資產階級『妥協』的決議之外，另有決議。不號召羣衆用革命的手段以實現八小時的工作時間制，而却用標題爲『關於經濟鬥爭』的另種決議案，便把爭得法定『八小時工作制』之舊的煽動口號重抄一遍（這是在唱高調之後呀）。這個口號在現時情形之下之缺點與落後已經是很明顯，用不着多費口舌來證明。

如關於公開政治鬥爭的問題。第三次大會觀察到我們目前工作中根本的變更。我們無論如何不可放棄秘密機關的發展，否則，將正合於巡警的要求，對於政府再便利也沒有的了。

但是現在已經不可不想到公開的政治鬥爭了。必須從速準備這種鬥爭的適當的形式和適合於這個目的之特殊機關——比較不秘密的機關。必須利用公開的與半公開的會社，俾盡可能的變牠們爲俄國社會民主黨將來實行公開的重要對外組織。

臨時大會把這個問題也弄得七零八落沒有完整的口號。特別滑稽的是責成「組織委員會」注意對於一班公開的文學家之「利用」。最無聊的是決議『使以幫助工人運動爲目的的民主主義的報紙，服從自己的影響。』這個目的，是俄國所有自由主義的公開報紙——按其傾向，差不多全數爲「解放派」的報紙——都承認的，爲什麼火星報的編輯部不自己執行自己的意見，不給我們一個模範，究竟怎樣使解放報服從社會民主派的影響呢？……不把利用公開會社以造成黨的重要對外機關的

口號提出來，而第一，只說關於『職工』聯合會（凡黨員皆應參加）的部份的意見，第二，建設指揮『工人的革命團體』——『沒有完成的組織』——『革命工人的俱樂部』這些「俱樂部」怎樣弄到沒有形成的組織一塊去了，這是一些什麼「俱樂部」。只有鬼知道。我們在這裏所看見的，不是本黨高級機關正確而明瞭的訓令，而是一種什麼文學家預備發表意見的芻議和草稿。關於本黨全部工作開始過渡到完全另一基礎的整個的見解，一點也得不着。

對於農民問題，大會與臨時大會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大會對這問題所擬定的決議——是『與農民運動的關係』。臨時大會對這問題所擬定的決議——是『農民中的工作』。前者是把為全民利益而與專制奮鬥的全部民主革命運動之指導責任，看得異常重要。後者是把全部問題都歸納到農民的特殊階級中的『工作』。前者是把全部即時組織革命農民委員會以施行一切民主主義的改革作為現時的中心實際口號。後者謂『組織委員會的要求』應提交立憲大會。為什麼我們應該等候這個立憲大會？這個大會是否將在事實上成立憲的大會？如果不預先同時組織革命的農民委員會，這種大會是否將能穩固？——這些問題都為臨時大會所未會注意到的。在資產階級的革命中，我們應只實行自己的專門工作，不要以指導全部民主運動和獨立實行這個運動為目的。——所有臨時大會的決議案都反映着這樣一個見解。經濟派會常常說過，社會民主主義者——要幹經濟鬥爭，而自由主義者——則幹政治鬥爭，現在的「新火星派」也抱同一態度：在他們對於一切問題的論調中，都以為我們社

會民主主義者——對資產階級革命只要對岸觀火，很謙恭的坐在一邊就好了。而資產階級——却去積極地實行這個革命。

末了，關於對其他政黨關係的決議案也不可不略為提及一下，俄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的決議案說，要揭破了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的一切不徹底性和缺陷，而不味味的在每次大會上都來說那種不徹底性之一切可能的事實，以及規定一些標準以分別善良的資產階級與不善良的資產階級。臨時大會却重犯斯脫盧威的錯誤，拚命的在那裏找這種分別資產階級好壞的標準，發表其所謂『試驗紙』的理論，斯達洛崙理想上的出發點是很好的，就是給資產階級以嚴厲的條件。可是他忘記了一點，就是拿各種標準來預先分別那能够得到同情和稱贊等等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與不能得到同情和稱贊等等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一類的『公式』，總是馬上為事變的發展所推翻而徒然混亂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斯脫羅威把問題的重心由實際鬥爭的一致，移到了一些空洞的申明，允許和口號。他認為這種口號之最主要者，是『普通，平等，直接和不記名投票的選舉權。』兩年的時間還未過去，——『試驗紙』便證明了自己的無用，普通選舉權之口號為解放派所採用，可是他們不但未從這個口號更與社會民主派接近，而是相反！——正是以這個口號為方法，使工人們的觀念模糊，離開社會主義。現在的『新火星派』向資產階級提出更『嚴厲』的條件，『要求專制的敵人』努力且懷二心的（21）擁護有組織無產階級之各種堅決行動……直至『積極參加民衆自動的武裝為止』。他

們曾不斷的這樣計劃，可是這種計劃又已經陳腐，即刻現得無用了。譬如爲什麼沒有共和政治的口號？怎樣社會民主派爲實行『猛烈的革命戰爭以反對君主等級制之一切根基，向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隨便』『要求』什麼都可，而不要求爲共和政體的鬥爭？

此問題並非小的問題，「新火星派」的錯誤有很重大的政治意義，——這有「俄國解放聯合會」*爲證（參閱前進報第四期）。**此外用不着多說。這個「專制的敵人」對於「新火星派」的「要求」是能完全接受的。而同時，我們已知道這個「俄國解放聯合會」的黨綱中（或無黨的黨綱中）是充滿着解放派的思想，且解放派是很容易使它跟着自己背後走的。臨時大會在決議案的末尾說，「社會民主派將如以前反對民衆的假朋友一樣，現在來反對一切高舉自由民主主義旗幟，而拒絕實際擁護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政黨。」「俄國解放聯合會」不但不拒絕這個擁護，而且自己誠心建議有這個擁護。但這是否能担保「聯合會」的首領——甚至是解放派的首領——不會爲「民衆的假朋友」呢？

*「俄國解放聯合會」的黨綱載在列寧全集第六卷六二四頁附註第五百十。

**一九〇五年七月三日前前進報第四期出版載有革命工人聯合會一文，介紹該「革命工人聯合會」宣言的內容。該會曾名「俄國解放聯合會」，以武裝暴動召集立憲大會爲目的。此文申規定了社會民主派對於這類無黨聯合會的關係。

這樣「新火星派」於事前規劃一些『條件』，提出一些紙老虎的滑稽『要求』，便將自身即刻陷入了可笑的地步。他們的條件和要求，即刻成了不足以計算時起變化的具體情形之白紙黑字。他們那種捕風捉影的公式，是沒有希望的，因為無論用什麼公式，你總不能把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各種各色的假面具，不澈底和限制等等的表現——歸納無漏。問題不在於『試驗紙』，不在於公式，不在於白紙黑字的要求，不在於事前分別『民衆朋友』的假面具者與非假面具者，而在於實際奮鬥之一致，在於社會民主主義者方面對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一切『動搖』步驟之竭力批評。爲『團結所有需要民主革命之一切社會力量』計，不要有臨時大會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所規定的那些什麼『條文』，而要有真正的革命口號。要有把革命的要求共和政體的資產階級提高到無產階級水平線的口號，而不要把無產階級的責任降低到資產階級君主派水平綫的口號。要極努力的參加暴動，而不要用清閒的遁辭以逃避武裝暴動的責任。

第十二章 若資產階級離開民主革命則這個革

命力量的擺動是否因之減少

在以上各節已經作好的時候，我們接到了「新火星派」高加索臨時大會在火星報上所發表的決議案，爲作一好的結論，我們連想都想不出比這還再好的材料了。

火星報的編輯者很公正的說：『在策略方面的根本問題上，高加索臨時大會的決議，還是與以前全俄臨時大會（如「新火星派」的臨時大會——著者）所通過的決議案相似的（真話！）關於社會民主派與臨時革命政府之關係的問題，高加索同志決定堅決否認前進報一部份人及傾向於他們的所謂大會代表所宣傳的新方法。』『無產階級的政黨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應持的策略，要承認臨時大會所規定的是最適當的。』不是真話，還是真話。關於「新火星派」的根本錯誤，真個誰也不能這樣『適當的』說明出來。我們現在且把這段說明全部抄錄於下，先在括符中略爲質難，後再分析。

「新火星派」高加索臨時大會關於臨時政府的決議案說：

臨時大會認爲自己的責任，是在利用革命時期以加深（呵，當然！不過還要加一句）用馬丁諾夫的

方法來加深)『無產階級之社會民主主義的覺悟』(只利用革命時期以加深覺悟,而不利用革命時期以爭得共和政體嗎?這是對於革命何等『深切』的瞭解呀)『且為保證本黨對於正在發生的資產階級國家制度之批評完全自由起見』(保證共和政體不是我們的事情!我們的事情只在保證批評的自由。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產生了無政府主義的謠言;『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臨時大會反對組成社會民主主義的臨時政府,并反對加入臨時政府』(參閱恩格斯在西班牙革命十個月前所引證之巴枯寧派的決議案見無產者第三期) * 『而認為最適宜者莫如自外而內的』(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威迫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使國家制度得相當的(?!)民主主義化。臨時大會認為由社會民主主義者組織臨時政府,或加入這個政府,——一方面,必使無產階級羣衆對社會民

* 恩格斯在其巴枯寧派的工作,關於一八七三年西班牙暴動的日記,一文中曾說過,不管巴枯寧派的大會(一八七二年九月)是如何決議,如何承認一切臨時革命政府都只是一種欺騙,是無產階級的危險,但西班牙的巴枯寧派,爲西班牙的事變所逼迫,還是違反了決議做事的,且這些巴枯寧派曾於事變前數月在哥爾托夫城說過建立革命政府,便是變賣工人,哄騙工人,現在他們却在安達路阻各都市革命政府中工作了,——不過他們到佔少數就是。……』

列寧在無產者第三期中論臨時革命政府,對於恩格斯這篇文章曾有詳細的分析。——摘譯自本書附錄。

主派灰心而離開社會民主派，因為社會民主派固然奪取政權，但不能滿足工人階級的緊急需要，直至實現社會主義爲止（共和政體不是緊急的需要，作決議案的人自己未注意到，用無政府主義的口吻來說話，似乎已否認參加資產階級的革命了？）另一方面逼迫資產階級離開革命的事業，致減少革命力量的搖動。」

這就是問題實質的所在。這就是無政府主義的理想與純粹機會主義交相錯綜（如西歐伯恩斯坦派中常有的現象一樣）的所在。你們只想想：不加入臨時政府，因為加入臨時政府，可逼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的事業，以致減少革命力量的擺動，這原來是「新火星派」全部哲學觀最清楚的最澈底的表现，即謂革命既爲資產階級的，所以我們應該拜倒於資產階級的道德之前，把路讓給他走，如果我們真受這種理論一分鐘的支配和部份的支配，真以爲我們參加臨時政府，可逼得資產階級離開革命，那我們便要把革命的全部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我們便將全部無產階級交給資產階級去指揮（自己則持完全『批評自由』的態度？）強使無產階級處恭順柔和的態度，以便資產階級不離開革命的事業，我們便要把經濟派及其生徒永不會好好瞭解的無產階級的政治需要，去精刮髓，以便資產階級不離開革命的事業。我們便要完全由革命的鬥爭——實現無產階級所需要之民主主義範圍的鬥爭——走上與資產階級妥協的道路，而以自己出賣原則，出賣資產階級的革命來換得心願的同情，俾資產階級不離開革命的事業。

高加索的「新火星派」，竟於兩小行的辭句中，把叛賣革命變無產階級為資產階級尾巴的策略描寫出來，我們在上面分析「新火星派」一些錯誤所得的結論，不過是一種傾向，而現在却成了一個明確的原則，作資產階級君主派的尾巴。因為實現共和，可逼使（且已經逼使——如斯脫羅威先生就是一例）資產階級離開革命，故應打倒爭得共和政體的鬥爭。因為無產階級方面種種有力而澈底的民主主義的要求，總是逼使全世界的資產階級離開革命，故工人同志們！你們還是躲起來吧，只要自內而內的行動不要為着革命，想法設計去利用『資產階級國家』制度的各種武器和工具，而保存自己的『批評自由』吧。

對於『資產階級革命』一名詞瞭解的根本錯誤，這裏已完全顯露無餘。馬丁諾夫或『新火星派』對於這一名詞的『瞭解』，結果直是把無產階級賣給資產階級。

誰要是忘了以前的經濟主義，要是不研究這問題，不想這問題，他便難於瞭解現代經濟主義的新生命。試一回想伯恩斯頓主義的我的信仰。*是書著者從『純粹無產階級』的觀點和黨綱出發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即謂我們社會民主主義者要作的事——經濟，為真正工人的事情，對於一切政治

*我的信仰為「經濟派」主要文件之一。是書之創設者為古司柯瓦，但總其成的，却有其他經濟派的

參加。列寧當時與一部份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同囚於葉民寧克司者，發起宣言反對是書，署名

者共十七人。——摘譯自本書附錄。

的自由批評，爲真正加深社會民主派的工作。他們自由主義者要作的事——政治，上帝去保佑他們。使他們不傾向『革命主義』吧，因爲這可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誰能把我的信仰全部細覽一遍，或把工人思想*第九期（一八九九年九月）的附錄細讀一遍，他便能看見這類論調中一貫的論點。

現在「新火星派」的理論也是一樣，不過範圍較大，用以觀察全部『偉大的』俄國革命，繼續從前平凡正統理論家的手段，把這個革命全部描寫得像一種庸俗卑鄙的諧劇罷了！我們社會民主主義者——只要『批評自由』加深覺悟，自外而內的動作；他們資產階級——作事自由，革命的（讀作『自由主義的』吧）指導自由，自上而下的施行『改革』自由。

這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卑鄙惡濁的人們，從來對於馬克思所謂『必要拿武器的批評來代替批評的武器』一語，未加以思索過，他們徒誦馬克思之名，事實上，在起草策略上的決議案時，却完全採納了佛蘭克府資產階級那些雄辯家紙上談兵的精神——自由地批評專制主義，加深民主主義的覺悟，殊不知革命的時候，是行動的時候，是要自上而下，且自下而上行動的時候，「新火星派」把馬克思主

*工人思想於一八九七年十月在彼得堡出版。主張只爲改良目前工人經濟生活而奮鬥，不理政治。

曾與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派打成一片。注意於工人運動之純粹理論上的研究，以便於專制政府檢查出版條件之下，得到公開言論的可能。這種態度，不期然而然的把革命的思想與鬥爭的口號改變了色彩，且從而發生階級合作與和平進化到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的理論。——譯者

義變成了清談主義，把最先進，最徹底，最奮勇的無產階級思想做成了這階級中一部份最無覺悟份子的思想——逃避艱難的民主革命責任，而把這些責任雙手奉送給斯脫羅威一流的先生們。

如果資產階級因社會民主派參加臨時革命政府而離開革命的事業，那他們（資產階級）即此就是『減少這個革命力量的擺動』。

俄國的工人們，你們聽吧：如果由不被社會民主派嚇得心驚胆落，不想對專制勝利，而想與專制分贓的斯脫羅威一流先生來實行革命，那末，革命力量的擺動，就要強大些！如果從我們在上面所述俄國革命兩個可能的結局中實現第一個結局，就是說，如果資產階級的君主派能根據謝波夫一類的『憲法』基礎與專制政府商量妥善，那末，革命力量的擺動就要強大些。

社會民主派在指導全黨的決議案中既然說出這樣無廉恥的話語，或在機關報中嘉許這類『適當』的決議案，事前已經辯論得頭昏目眩，失落了馬克斯主義的全部活潑的生氣，現則不知這些決議案，是何等的把他們所說的一些好話變成了空談，試拿火星報的隨便那篇論文來看，拿我們的名角馬丁諾夫的傑作來看都可以——你們能到處看得見民衆暴動，實行革命到底。憑藉下層民衆以與不徹底的資產階級奮鬥……等語，可是從他們自己說這話起，或嘉許人家說，因資產階級的脫離『革命力量的擺動便要減少』他們的一切好話都成了可憐的空談。先生們，下面兩種情形中，只能就中取一的：或是我們應不顧慮不徹底自私自利戰戰兢兢的資產階級，與民衆在一塊兒來實行革命，完全推翻專

制；或是我們不能『不顧慮』我們害怕資產階級脫離革命，那時就要把無產階級和民衆出賣給不澈底，自私自利，戰戰兢兢的資產階級。

你們不要誤解我的話。不要大聲疾呼的說，人家罵你們爲有覺悟的叛賣無產階級。不是的，你們以前無意識地時時陷入了泥坑，與現在無意識地混入了亂山歧路，也猶如舊時的經濟派一樣，高山滾石，牢不回頭的下跑去，以力求『深解』馬克思主義，直弄到反革命，無精神且無生氣的道學儒生了。

『革命力量的擺動』要依靠些什麼社會實際力量來決定，——這問題你們曾經想過嗎？我們現在且把對於我們很有利的國外政治與國際情況的力量放在『一邊』，不歸入觀察範圍之內，因爲這裏的問題是關於俄國內部社會力量的問題。你們試看看這些內部的社會力量吧。反對革命的有專制政府，皇族巡警，官僚，軍隊，高級貴族。民衆中的不滿愈深刻，則軍隊對於政府也愈無希望，官僚中的動搖也愈激烈。其次，資產階級，全盤的說來，是同情於革命的，且大叫要求自由，不但常常代表民衆說話，而且常常代表革命說話。但我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由理論上固然知道資產階級的本性，且現在觀察自由主義者，鄉紳派，和解放派等的行爲，無日無時不證明資產階級之同情於革命是不澈底的：是自私自利的，是畏首畏尾的，全部的資產階級只要滿足了自私自利的狹隘的利害，只要『離開』澈底的民主主義（它現在已經開始離開澈底的民主主義）它便必然的即刻變到反革命方面，變到專制政府方面以反對革命，反對民衆。餘下的便只有『民衆』，即無產階級和農民；無產階級是幹到底的。因爲只有

它能無遠近的走出民主革命的範圍。故此，無產階級站在革命的陣頭上為共和政體而奮鬥，對於一切愚笨而無價值的規勸——不要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等話，置之不理。農民本身中除小資產階級份子外，尚包括有許多半無產階級的分。這種情形使農民本身無固定的性質，使無產階級不得不團結成一嚴厲的階級政黨。但是農民之沒有固定性，是與資產階級之沒有固定性根本上不同的。因為農民把現時沒收地主土地（私有財產的一重要形式）的事情，看得比無條件的保存私有財產一問題要重要。固然不可說農民因此便成了社會主義的分，而不為小資產階級的分了，但它能為民主革命最完滿且最激進的擁護者。若是提高農民智識的革命行程不太早為資產階級叛變與無產階級的失敗所割斷，則它定然為這樣的擁護者。農民在這種條件（即革命行程不太早為資產階級的叛變與無產階級的失敗可割斷——譯者）之下，定然為革命與共和政體之屏障，因為只有得着完全勝利的革命，能給農民以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滿足農民自己所需要的及其日常所想像的一切，且農民必須要還一切，也不是如『社會革命黨員』所想的樣子，要消滅資本主義，而是要使自身脫離半農奴制的束縛，脫離奴隸的黑暗境遇，以便於商品經濟可能的範圍內，改良自己的生活條件。

不但如此：不僅祇是農村激烈的改革促進農民傾向革命，而且農民的日常一般利益亦喚醒它自身起來革命。甚至與無產階級奮鬥，農民也需要德謨克拉西，因為只有德謨克拉西的制度能確切表現農民的利益，能表現它在民衆中佔大多數的優越地位。農民的文化程度愈高（自日俄戰爭起，它的文

化程度正在很快的提高，這是許多慣用學校尺碼來度量文化程度的人們所未注意到的）則它的同情於德謨克拉西革命也愈將堅決而澈底，因為它不想像資產階級一樣，害怕民衆抬舉出來頭腦，而是願意有這種頭腦，這種民衆的上層頭腦於它正是有益。只要農民能開始從原始的君主制度解放出來，民主主義的共和政體便即刻成爲農民的寶貝，因為資產階級臆造出來的君主制度（設立上議院等等）使農民還是一樣的沒有權利，一樣的黑暗，一樣的被壓迫，不過這種制度稍許蓋有歐洲憲法的粉飾罷了。

所以資產階級自然而且必然要跑到自由主義的君主政黨旗幟之下，而農民羣衆——必然要跑到革命共和政黨領導之下。所以資產階級不能實行民主革命到底，而農民能實行這個革命到底，且我們應盡已之所能以幫助農民這種傾向。

有人可反對我說：這用不着證明，這是A B C，凡社會民主主義者都十分明瞭。這話不對，誰能說因資產階級離開革命，致使革命力量的『擺動減少』者，他就不懂得這個A B C。這樣的人，知道背誦我們土地政綱裏面的話，但是不懂得這些話的意義，因為若是懂得這些話的意義，他們便不會害怕由全部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及由本黨黨綱所必然產生的民主革命之工農專政的觀念，若是懂得這些話的意義，他們便不會拿資產階級力量的擺動來限制俄國大革命力量的擺動。這樣的人，拿自己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革命的具體的決議案來推翻了自己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抽象的辭句。

誰要是真正瞭解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他就不能說當資產階級離開革命的時候，革命的力量的擺動就要減少。因為事實上，只有在資產階級離開革命，而農民羣衆與無產階級共同積極參加革命的時候，俄國革命力量的真正擺動才能開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中可能的真正革命力量的強有力的擺動才能開始。爲使我們的民主革命能貫徹到底，這個革命所憑藉的力量，便要是能使資產階級必然而有的不徹底性成爲不發生作用的力量（即能『逼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的力量，爲高加索的「火星派」所懼怕的。）

無產階級應實行民主革命到底，連絡農民羣衆，以使用實力壓倒專制政府的抵抗，用實力來停止資產階級的不固定性。無產階級應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聯絡民衆中半無產階級的份子，以使用實力壓倒資產階級的抵抗，用實力來停止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不固定性。這就是無產階級的責任，這些責任，是被「新火星派」在其自己關於革命力量擺動的一切論文和決議案中看得異常窄狹的。

不過還有一種情形是在人們討論『力量擺動』的時候常常不注意到的，我們却不要忘却了它。就是不要忘却這裏的問題，不是關於責任困難的問題，而是關於在怎樣一條道路上去尋找這個責任的解決。這裏的問題，不是關於要把革命力量的擺動做成強而有力——容易，還是困難，而是應怎樣去使這個擺動更有力量。這裏的爭論，恰恰是關於行動的根本性質，關於行動本身的方向。我們所以要把這話更明白的說出來，是因為有些不注意的人和故意搗亂的人，總是把兩個不同的問題混作一塊：

(一) 關於道路方向的問題，即關於從前兩條不同的道路中選擇一條的問題，(二) 關於在該道路上容易實現目的的問題，或實現目的的較近的問題。

後一問題，我們在上面完全未分析過，因為這問題並未引起本黨中的異見和爭論。但是這問題本身自然極重要，值得一切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注意。若是忘却吸收工人階級羣衆與農民羣衆加入革命運動的困難，那便是一種不可寬恕的樂觀主義。唯其有這種困難，所以實行民主革命到底的努力，已經不止一次的失敗，且在這時候，最興高彩烈的是不澈底的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它既得君主勢力之保護以提防民衆，以得『保持』自由主義……或『解放派』的『純粹潔白』。但是不能因有困難，就說什麼都不能執行了。這裏重要的是在於自己相信所選擇的道路之正確，而這個自信又可增加無數倍的革命熱誠與革命奮勇，能使我們排除困難，百折不撓地向自己的目的前進。

現代社會民主主義者關於選擇道路的問題，意見已分歧到何種程度，從『新火星派』高加索臨時大會與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兩種決議案的比較中就可顯明的看出來。第三次大會的決議案說：資產階級是不澈底的，它定將竭全力以奪取我們在革命中所得的勝利品，故工人同志們，你們要準備去努力的鬥爭，武裝起來，把農民吸收到自己方面來。不決一勝負，我們是不把在革命中所得的勝利品讓給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的。高加索『新火星派』的決議案說：資產階級是不澈底的，它可離開革命。故工人同志們，請你們別要想參加臨時政府吧，因為那時候的資產階級定然離開革命，而革命

力量的擺動定將因此而減小！

前者說：把革命推往前進。推得到底吧，不要顧慮不澈底的資產階級之反抗或消極。

後者說：你們別想單獨實行革命到底吧，因為那時候不澈底的資產階級會脫離革命哩。

難道這不是兩條完全相反的道路麼？難道這不是很明顯的兩個不能并存的策略麼？又難道不是

很明顯的，前一策略是革命的社會民主派唯一正確的策略，而後一策略，實質上純粹是一種解放派的策略麼？

第十三章 結論：我們敢不敢勝利

只在表面上認識俄國社會民主派內部情形的人，或是從旁觀察，不知道我們內部自從經濟派時代起爭鬥歷史的人，常常藉口於一切社會民主運動中兩個自然且必然完全可以調和的傾向，以敷衍特別自第三次大會後策略上已經形成的分裂。他們說：這裏一方面，是特別注意經常的每日工作，特別注意宣傳和煽動之必要，特別注意準備力量，使運動更加深切等等之必要。另一方面，注意革命運動之戰鬥的，一般的政治責任，指出武裝暴動之必要。提出民主革命專政，臨時革命政府等口號。不要把兩方面都吹噓得太大，兩方面都不好走極端等等。

在這類的論調中間，自然含有些平凡才智的廉價格言，不過這種格言，常常埋沒着政黨中緊急不容遲緩的需要。試拿現在俄國社會民主派中策略上的爭論來看吧。「新火星派」在討論策略問題的時候，特別注意日常方面的工作，——僅祇這種情形，自然還不能發生任何危險。且於策略方面的口號問題上，自然還不能引起任何意見上的分裂。但只要拿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大會的決議案與臨時

大會的決議案來比較一下，這個意見上的分裂便馬上現得刺目了。

究竟這裏是怎樣一回事呢？第一，僅祇一般的抽象的指出革命運動中有兩個水流和兩方各走極端的弊病，自然還不够。還應具體的知道，爲什麼這個運動在現在的時候受着痛苦？黨的實際政治危險，究竟何在？第二，要知道，究竟那些實際政治力量因有這些策略方面的口號或那些策略方面的口號（或沒有這種口號和那種口號）致能更加轉激你們試聽聽「新火星派」的說話，便能得着這樣一個結論，即社會民主黨有放棄宣傳和煽動，放棄經濟鬥爭且放棄批評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而專注意於軍事上的準備，注意於武裝暴動與奪取政權等事之危險。事實上實際的危險並不是從這方面來的，稍許知道革命運動情形的人，留心觀察這種運動的人，都能看得出「新火星派」這種恐懼心的可笑方面。事實上，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全部工作已完全練成了一個鞏固的形式，完全能保證工作的重心集中於宣傳和煽動，集中於傳單和羣衆的秘密集會，集中於傳單與小冊之分配，集中於經濟鬥爭之幫助及其口號上的擇定。所有黨的委員會、區委員會、中央聯席會議、工廠小組等無不總是常常把自己百分之九十九的精神，力量與時間用在這些還是從九十年代下半期起就已經固定了的工作上面。只有完全不認識俄國革命運動的人，才不知道這種事實。祇有最天真或完全不通消息的人們，才可不辨青紅皂白，拿起「新火星派」的說話就到處背誦。

現在的事實是，我們不但未太過注意於暴動的責任，太過注意於一般的政治口號，太過注意於全

部民衆的革命之指導，而是相反，在這些問題上，我們的落後特別表示得明顯，這是我們最大缺點之所在，是革命運動的實際危險，這個運動可由（且有些地方已經發現）事實上是革命的變而為只在口頭上是革命的。從進行黨的工作的千百個支部和小組中間，你們找不出一個，如「新火星派」的博士，像發現了新定律到處吹噓的一樣，從其發生起，直到現在，未施行過那種日常的工作。反之，你們從這些支部和小組中間，僅能找出很少數很少數的支部和小組，是曾經覺悟到武裝暴動之任務的，是已經開始執行這些任務的，是已經明白有指導全部民衆革命以反對專制之必要的，是明白爲了執行這個指導任務應提出這樣的口號，而不是其他口號的。

我們比真正的革命任務要落後許多了，我們在許多時候沒有覺悟到這些責任的施行，我們因自己的落後，到處未曾使得革命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更加强厲。而新火星報的記者却回轉身來，把背心對着事變的行程和時間的要求很嚴重的說：你們不要忘了舊的！不要爲新的所迷惑！這是臨時大會一切決議案中牢實根本不變的要旨，同時，你們在第三次大會的決議案中也可牢實的讀着：我們評定已往的舊事（且不要連編累牘的咀嚼它，就是因爲它是已往的舊事，是已經決定，已經載之於書，筆之於決議案，集之於經驗的已往的舊事），同時提出新的任務，注意新的任務，提出新的口號，要求一切真正革命的民主主義者速即實行這種口號。

事實上，社會民主派中關於策略問題兩派別原來是這樣。革命時期自己提出了新的任務，不看見

這些任務，只有雙目不明的人可辨到。現在一部份社會民主主義者堅決的承認這些任務，且視之爲現時必行的事：武裝暴動不容遲緩，速即努力的準備起來，記着爲要澈底勝利，必須武裝暴動，提出共和政體的口號，提出臨時政府的口號，提出民主革命之工農專政的口號。而另一部份社會民主主義者，却見往後退縮，走踏步，不提口號，而牢作緒言，不評定已往舊事，且同時指出新的工作，而牢實拉雜無味的咀嚼這些已往舊事，且濫設遁辭以逃避新的任務，不會說明澈底勝利的條件，不會提出唯一能適合達到完滿勝利目的的口號。

這個尾巴主義之政治上的結果，我們現在看得很清楚。俄國社會民主黨『多數』黨員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接近的謠言，現在還是謠言，因爲沒有一件事實，沒有一個「多數派」的決議案，沒有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方面的半個舉動可以證實這個謠言。而同時以解放報爲代表的機會主義資產階級的君主派，却好久就歡迎「新火星派」『原則』上的傾向了，現在且得着他們的幫助以增加自己的影響，接受他們的論調與『思想』，反對秘密和『搗亂』，反對鼓吹革命，『技術』方面的事情，反對直接提出武裝暴動的口號，反對主張激烈要求的「革命主義」等等。社會民主黨高加索「少數派」全體臨時大會的決議案，以及新火星報對於這個決議案的稱贊，對於上面這樣傾向作了一個政治上直接的結論，就是：不要無產階級參加民主革命專政，致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吧！用這樣一句話，什麼都說明了，說明了無產階級之變成資產階級君主派的尾巴，已告最後的成就。且

事實上說明了這裏的證據不是一個人偶然的說話，而是一個爲整個派別所嘉許的決議案，說明了「新火星派」尾巴主義的政治意義。

能對於這些事實加以思索的人，他就能明白現時人們所指出的社會民主運動中兩方面和兩個傾向的真正意義。試就伯恩斯坦派的思想來觀察一觀察，以便大規模的研究這兩種傾向。原來伯恩斯坦派也恰恰是這樣肯定的說，只有他們瞭解無產階級的真正需要，只有他們明白發展無產階級力量的責任，只有他們明白使全部工作更加深切，準備新社會種子，宣傳和煽動的責任。伯氏說，我們要求公開承認現在有的東西，藉此以創造一個沒有『終結目的』的『運動』，創造一個防禦策略，宣傳畏懼驚慌的策略，『不要使資產階級脫離革命』。而且伯恩斯坦派也曾大叫特叫地批評過革命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甲可賓主義」，批評過不懂『工人自立性』的「文學家」等等。事實上，大家都知道，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連想都未想過要拋棄準備力量等等的日常小工作。他們只曾經要求過對於終結目的之明確的認識，對於革命任務之明確的態度；他們曾要把半無產階級和半小資產階級份子提高到無產階級的革命程度，而不把無產階級的革命程度降低到機會主義的思想，『致不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我們敢於勝利嗎？許可我們勝利嗎？我們勝利不危險嗎？我們應當勝利嗎？』——這個問題，可說曾經是社會民主黨裏智識階級機會主義派與無產階級革命派中間隔了相差的最顯明的表現。表面上看來，似乎很奇怪，爲什麼有這樣的問題發生，但是這樣的問題已經有過，且是不會不有過的。

因為機會主義自己曾經害怕勝利，使無產階級也畏懼勝利，預言勝利的不幸，嘲笑一直到達這個勝利的革命口號。

現在俄國也同樣的分成智識階級機會主義派與無產階級革命派兩種傾向，所不同的，只是我們這裏的問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而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問題。我們也有一個同樣在表面上看來是很愚蠢的問題：『我們敢於勝利嗎？』這問題曾經在馬丁諾夫的『兩個專政』中提出來，該書預言說，若是我們很好的準備暴動且很順利的進行這個暴動，定得發生許多不幸。這問題曾經在「新火星派」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一切著作中提出來，且他們曾經誠心（但無成績可言）想把米拉蘭參加資產階級機會主義政府的問題拿來與瓦爾龍參加小資產階級革命政府的問題混為一談。*這問題更顯露於臨時大會的決議案：『不要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固然像考茨基一樣，現在也在那裏試議

*瓦爾龍是第一國際的會員，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時曾掌理財政列舉在論巴黎公社與民主專政的任務（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一日無產者第九期）一文中說，加入公社的除無產階級的代

表外，還有小資產階級的份子，因此得着一個這樣的結論，即謂：『無產階級的代表與小資產階級

一同加入革命政府，在原則上是完全許可的，且於相當條件之下——是必要的……』

「巴黎公社曾要執行的實際任務，首先就是實現民主主義的專政，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

摘譯自本書附錄。

諷我們說，我們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爭論，猶如熊還未打死，便爭分其骨，然而這種諷諷只是表示給我們看，甚致連聰明而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在聽見人家爭論，只就傳聞所得，而不知其底細的時候，都致弄成莫明其妙。德意志的社會民主派距打死熊（完成社會革命）的時間還不很近，但是『我們敢不敢』打死這熊的爭論，是有過很重大的原則上的實際政治意義的。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有能力『以打死自己的熊』（完成民主革命）——距這時間還不很近，但是『我們敢不敢』打死這熊的問題，對於俄國的將來，對於俄國社會民主派的將來，是有極其重大的意義的。譬如我們不相信自己『敢於』勝利，則要竭力順手的集中軍隊，好好的指揮軍隊，簡直無從說起。

就拿我們舊時候的經濟派來講吧！他們也曾大叫特叫地說過，他們的敵人——陰謀客，甲可賓派，這些人離開了羣衆，迷於政治，忘却了工人運動的基本，不注意工人的自立等話。事實上呢，這些『工人自立』的擁護者，是一批把自己對於無產階級的任務瞭解得異常窄狹，異常淺俗的觀念傳遞給工人們的智識份子——機會主義。事實上呢，凡是讀過舊火星報的人都知道，經濟派的敵人并未放棄且並未輕視過社會民主主義工作的任何方面，并未忘却過經濟鬥爭。且同時，會把各種臨時緊急的政治任務也完滿的提出來，以防止工人的政黨變為自由資產階級之『經濟』的附屬品。

經濟派時常背誦過，政治的基礎為經濟，且對這話的『瞭解』是，要把政治鬥爭壓低到經濟鬥爭。『新火星派』時常背誦過，民主革命在自己的經濟基礎上，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且對這話的『瞭解』

是要把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責任壓低到資產階級溫柔順的水平綫，壓低到不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的界限。經濟派以加深工作為藉口，以人工自立和純粹階級政策為藉口，事實上却把工人階級交給自由資產階級政治家的手裏去了，就是說，他們領導黨所走的道路，其客觀的意義正是如此。現在的「新火星派」藉口於同樣的話語，事實上却把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賣給資產階級，就是說，他們領導黨所走的道路，其客觀的意義正是如此。經濟派會以為政治鬥爭中的領導任務，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事情。而是自由主義者私有的事情。現在的「新火星派」，以為積極實行民主革命——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事情。而是民主資產階級私有的事情，因無產階級之領導與積極參加，可使革命力量的『擺動減少』。

總而言之，「新火星派」不但按自己在本黨第二次大會上的產生是經濟派的生徒，而且按其現在對於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策略問題方面的態度，也是經濟派的生徒。這也是本黨的智識階級機會主義派，在組織上，這個派別是開始於智識分子之無政府黨的個人主義，結果，是一個『破壞組織的過程』，在臨時大會上通過『章程』內中固定了出版物開黨的組織，規定了間接選舉法，（幾乎是經過四層階段的選舉法）拿白蘭巴不特（法國皇朝——譯者）的平民投票法來代替了民主主義的代表制，末了，還規定了部份與全體中間『協商』的原則。在黨的策略上，他們也沿着同樣的斜徑跑了。在『鄉紳會議的計劃中』，他們把在鄉紳面前的說話叫作『示威的最高形式』，同時，在政治的舞臺

上，他們僅曾找得兩種積極的勢力（這還是在一月九號前呀）——即政府與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武裝的緊急任務，他們拿來弄得很『深切了』，『用自己武裝的熱烈要求來武裝』之口號，代替了直接實踐的口號。武裝暴動，臨時政府和民主革命時專政等任務，現在被他們在自己的正式決議案中挖精去髓的曲解了。『不要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這是他們最後決議案中的一句結語；這個結語明白告訴我們，究竟「新火星派」的道路把無產階級的政黨領導走往那裏去。

俄羅斯的民主革命，按其社會經濟實質，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這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若僅只拿來重背重讀是不夠的，必須會了解它，會運用它於政治上的口號。全部政治自由——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上——是資產階級的自由。『自由』的要求，首先就是表現着資產階級的利益。資產階級的代表，曾首先提出此要求。資產階級的擁護者，依着主人翁的地位，曾到處利用已經得着的自由，在和平的時候，把這個自由作成很溫和很正確的資產階級的法碼，用以爲最文雅的方法來對付革命的無產階級，而在情形上不安的時候，却用爲野獸不如的殘暴手段來對付革命的無產階級。但因此便否認或輕視爭得自由的鬥爭，那只有民粹派中的「暴動派」，無政府主義者和「經濟派」才能辦到。且要使這種智識階級的淺陋思想能傳染給無產階級，到永遠只是暫時的現象，永遠只是違背無產階級意志才可做到。無產階級已經知道，政治自由固然是直接鞏固資產階級，組織資產階級的東西，但自身還是需要這個自由，且比任何人都需要這個自由。無產階級不是離開階級鬥爭來

等着自身解放的，而是發展階級鬥爭，擴大階級鬥爭的範圍，發達階級鬥爭的覺悟和組織，堅決來求得解放的。凡看輕政治鬥爭者，他無異把社會民主主義者由民衆的首領變爲英國職工會的秘書。凡看輕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者，他無異把社會民主主義者由民衆革命的首領變而爲自由工人聯合會的指導員。

是的，民衆革命的，社會民主派曾經反對，且現在還是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對於民衆二字的濫用。社會民主派要求不用這兩個字以掩蔽自己對於民衆內部階級矛盾之不瞭解。它無條件的主張無產階級政黨應有自己階級的完全獨立性。但是它所以把『民衆』分爲各『階級』不是爲的要使先進階級只掃自己門前雪，緊緊的縛住自己，限制自己的行動，便使世界上的經濟主人翁不離開革命，而是爲要使先進階級不受各過渡階級不澈底，不固定，不決心的連累，且因此更要努力，更勇敢的爲全民事業而奮鬥，且領導全體民衆去奮鬥。

這就是現代「新火星派」時常不瞭解的問題，他們只把『階級』二字放在口頭上念來念去，變性變格，而看不見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積極政治口號！

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強硬瓜分』或『土地與自由』——這是智識閉塞，環境黑暗，可是正在拚命尋找光明和幸福之農民羣衆中最普遍的口號，——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口號，但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知道要使無產階級與農民達到真正的自由，除資產階級的自由和資

產階級的發展道路外，沒有第二條道路。我們應當知道在現在的時候便要跑近社會主義，除政治上的完滿自由，除民主主義的共和政體，除民主革命之工農專政外，沒有第二個方法，且不可能有第二個方法。無產階級是先進的階級，是無條件，無疑義，無躊躇的可說它是唯一革命的階級，我們爲這個階級的代表者，應當儘可能廣大，勇敢且積極地把民主革命的責任在全體民衆中提出來，藐視這些責任，便無異是在理論上海辱馬克思主義，卑鄙的曲解馬克思主義，而在實踐上與政治上，是無異把革命的事業奉送給資產階級，奉送給必然離開澈底革命的資產階級。在達到革命完全勝利的道路上，自有許多很大的困難在。如果無產階級之代表們能就已之所能盡力奮鬥，而一切力量都爲反動勢力之抵抗所挫折，爲資產階級之叛變和羣衆之黑暗所挫折，那是誰也不能責罵他們的。但是，若社會民主派將以害怕勝利爲藉口，以使資產階級不離開革命爲緣由而限制民主革命的革命奮鬥，限制革命的熱烈，那是人（首先就是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得而誅之的。

革命爲歷史的車頭，——馬克思曾經這樣說過。革命是被壓迫者與被剝削者的紀念日。民衆之能爲新社會秩序的積極創造者，只有在革命的時候表現得最力。根據小資產階級新進的狹小觀點看來，這種時候的民衆，能有不可思議的力量，但是在這種時候，也還需要革命黨的首領能很廣大很勇敢地把自已的任務提出來，需要他們的口號能時時領導羣衆革命的自動精神，爲它的燈塔，用其偉大與光明以表示我們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目的，表示達到完全澈底勝利之最捷近且最直的道路。「解

「放派」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者害怕革命害怕直的道路，我們且讓他們去尋思那些彎曲的、間接的、妥協的道路吧。如果他們以實力來強迫我們走這些道路，那我們在日常小的工作中還是能盡自己應盡之職的。但是首先應拿無情的鬥爭來解決擇選道路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利用現在羣衆中這個鼓舞的奮勇心和革命的熱烈心以忠實而拚命的爭得澈底的直的道路，那我們就要成爲革命的叛變者。讓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去望而生畏的想像那將來的反動的局面吧。工人們是不會爲反動勢力將要很厲害，資產階級將要脫離革命等念頭嚇倒的，工人們不是坐等分贓，請求打化的，而是要拚命的達到反動勢力的破壞，換言之，即達到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

不用說，我們的船——黨，在狂風大浪的時候，自然要比平風息浪的時候所招的危險要多點，就是說自然要比照着自由主義的和平發展，工人階級飽受着痛苦拖延，被剝削者吸吮着自己的血汗時所招的危險要多點，不用說：民主革命專政的任務，自然要比一個「極端反對黨」和一個國會鬥爭的任務要困難萬倍，要複雜萬倍。但若是有人在現在革命的時期就預先擇定平安的『航綫』和沒有危險的「極端反對黨」的道路——那就是最好讓他暫時離開社會民主派的工作，讓他坐待革命的結束，等到『紀念日』的時期過去，日常工作從新開始，而他那種不適用的政策不會成爲這樣討厭，這樣醜陋的曲解工人階級任務時，再來不遲。

領導全體民衆，特別是領導農民——爲完滿的自由而戰，爲澈底的民主革命而戰，爲共和政體而

戰領導一切勞苦羣衆和被剝削的羣衆，——爲社會主義而戰——這就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在事實上應有的政策，也就是革命時期中，應當貫徹且範圍工人階級政黨所有策略問題決議案及其一切步驟的階級口號。

書 後

——還有一次解放派就還有一次新火星派——

解放報的第七十一期至第七十二期和火星報的第一〇二期至一〇三期對於我們在本書第八節所分析的問題又貢獻了一些新的材料。我們現在沒有可能來詳細研究這許多材料，只得就其中幾個最重要的問題來分析：分析第一，解放報所稱贊的社會民主派中的「現世主義」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現世主義，為什麼解放報要稱贊它；第二，革命與專政兩觀念的相互關係。

一 為什麼自由資產階級的現世家要贊美社會民主派的現世家呢

俄國社會民主派的分裂與健全思想的凱旋這兩篇文章（見解放報第七十二期）是代表自由資產階級的人們，對於社會民主派所發表的言論。這種言論對於有覺悟的無產者是很有價值的。可惜

不能介紹給每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都去源源本地認識這兩篇文章，且對於其中的一字一語都加以考慮，現在且說一說這兩篇文章中的要點。

解 放 報 說：

「外間之觀察者，很難得悉社會民主黨分成兩派之爭論中，究竟其實際政治意義何在。人們對「多數派」與「少數派」之定義，以為此二者之不同，在於前者是比較急進的，往往直前的，而後者則為於事有益起見，認為可有幾許之妥協。此種定義，不能認為完全正確，且無論如何，亦不能認他能總括情形之各方面。至少，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教條在少數派方面比之於在列寧派方面恐怕要精明得多。故此，若為如下之觀察，實較為正確。「多數派」之根本政治傾向是一種抽象的革命論。是一種暴徒思想，不拘於各種方法。只要達到鼓起民衆暴動且代表民衆從速取得政權之目的為是，這種傾向便使「列寧派」接近於社會革命派，且使其階級鬥爭的思想為俄國全民革命的思想所蒙蔽；「列寧派」一方面在實踐上拋棄了社會主義思想的許多狹隘之點，另一方面，却犯了革命論之狹隘病，除準備速起暴動外，其他一切實際工作均為他們所拒絕，公開與半公開之各種鼓動形式，以及與其他反政府派別於實際有益之各種妥協，亦均為他們原則上所輕視而不採用。反之，少數派能堅守馬克思主義之教條，且同時，又能保持着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裏面的現世的原則。此派之根本思想，即在於以「無產階級」之利益與資產階級之利益相對立。但另一方面無產階級鬥爭之舉行——當然在社會民主派教條所許之

相當範圍之內——必須實際而確當，且此種鬥爭之所有具體條件及任務亦都須明白瞭解，此兩派別，對於自己根本觀點之實行，都不完全澈底，因其自己政治思想之創造均為社會民主主義教案中之嚴厲公式所束縛；「列寧派」為此種公式所障礙，致不能如少數社會革命派一樣，成為公然直接的暴徒，「火星派」為此種公式所障礙，致不能成為工人階級現世政治運動之實際指導者。」

解放報的作者，以下便把幾個重要決議案的內容舉出來，並以其體的批評來說明自己對於這些決議案的一般的「意見」。他說：

『對於武裝暴動的問題，少數派臨時大會的態度與第三次大會態度完全不同。』因對於武裝暴動的態度不同，故關於臨時政府的決議案也各異。『對於職工聯合會的關係問題，也有同樣意見上的分歧。「列寧派」在自己的許多決議案中，關於這個組織工人階級及其政治訓練之最重要的出發點，甚致一語不提。反之，少數派關於這問題曾有一很嚴重的決議案。』對於自由派的關係問題，似乎多數派與少數派的意見一致，但是第三次大會『差不多字字都是抄寫着第二次大會所通過的普列哈諾夫的決議案，而推翻了同一大會所通過的斯脫羅威的（對自由派傾向較好的）議決案。關於農民運動的問題，大會「和臨時大會的決議案性質上大概相同，但「多數派」較注重以革命的方法「沒收地主等等的土地」一說，而少數派則想以國家和行政上的民主主義的改良一些要求來作為鼓勵工作的基礎。』

還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就是解放報從火星報第百期舉引一個少數派的決議案出來，其中的一段說：『因現時僅只一個秘密工作，不能保證羣衆充分的參加黨的生活，且有時還使羣衆與本黨（秘密的組織）對立，故本黨必須把職工聯合會的鬥爭拿到自己手裏，且在公開的原則上由工人們實行之，同時，必須嚴厲的使這種鬥爭與社會民主主義的任務發生密切的連系。』解放報關於這個決議案欣然地說：『我們很熱烈的歡迎這個決議案，因為它是健全思想的凱旋，是社會民主黨中某一部份份子之策略上的光明。』

讀者現在對於解放報諸重要的論斷，可一目了然了。從適合於客觀的事實與否一點來看，若認為這些論斷是對的，自然是絕大的錯誤。這些論斷中的錯誤，每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都能到處容易發現。若忽視這些論斷是激頭激尾的帶着這種傾向——那也未免太無政治常識。這些論斷之反映社會民主派的見解，猶之如凸面鏡或凹面鏡反映着某種事件一樣的可笑。但是若忘了資產階級的這些曲解的論斷畢竟還反映着真正資產階級的利益，——那就要鑄成更大的錯誤，因資產階級是一個階級，社會民主派的內部的那些傾向是於它有利益的，與它親近的，與它心心相印的。再那些傾向是於它有害的，與它遠隔不相親的，爲它所嫌惡的，——它對於這些自然有正確的瞭解。同時，資產階級的哲學家也好，資產階級政論家也好，無論對於少數派的社會民主派或多數派的社會民主派，任何時候也不能正確瞭解的。可是任何稍具聰明的政論家，他總不會爲其階級的根性所愚弄，且社會民主派的內部種種

派別對於資產階級之意義，他固然描寫的不對，但在實質上，他纔能領會得正確。所以，我們階級敵人之階級根性及其階級根性的論斷，時時值得每一個有覺悟的無產者最大的注意。

俄國資產階級的本性經着解放派的口吻告訴我們些什麼呢？

它對於「新火星派」的傾向，十分肯定的表示自己的滿意，稱贊「新火星派」的現世主義及其觀察上的確當，健全思想的凱旋，決議案的嚴重，策略上的光明——對於三次大會的傾向都表示不滿意，責備它爲狹隘革命論，暴徒思想，說它不該否認於實際有益的各種妥協等語。我們的出版物中，曾經屢次根據很精確的材料證明說，「新火星派」是俄國社會民主派中的機會主義派，而其敵人則爲俄國社會民主派中的革命派，現在資產階級的根性，恰把這話暗示資產階級自己了。自由主義者不同情於「新火星派」的傾向，而非難第三次大會派的傾向。自由主義者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他們很知道工人階級的『實際，確當，嚴重』，是有助於資產階級的，因爲工人階級的這種傾向，就是實際上拿資本主義，改良主義和工會鬥爭等等的範圍來限制自己的行爲。他們又很知道，無產階級的『狹隘的革命論』及其爲着自身的階級任務曾在俄國全民革命中得到指導作用，是對於資產階級有危險的。

「現世主義」這一名詞的意義，在解放派看起來的確是如此——要證明這，只要看前期解放報及斯脫羅威先生對於這一名詞的運用就够了。連火星報自己也曾經不能不承認「解放」派所謂「現世主義」的這一種意義。試一回想火星報第七三至七四期附錄中什麼時節一文吧。這篇文章的

作者（他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上表示各種搖擺意見最澈底的一人）簡直這樣說：『亞坡姆夫在大會上的作用，與其說是機會主義的真正代表者，寧可說是機會主義的一種象徵。』火星報的編輯部爲更正『什麼時節！』作者的說話，不得不馬上在附注中作如下之申明：

『我們與這個意見不能同意。在細坡姆夫同志對於黨綱的見解中，明白表示着機會主義的傾向，這連解放報的記者都承認的——該記者在最近解放報某期中說，亞坡姆夫同志現的傾向，在接近於「現世主義者」（請讀爲「修正主義」的）傾向。』

這樣火星報自己很知道，「解放派」的「現世主義」就是機會主義，而不是什麼別的東西。如果現在火星報在攻擊「自由派的現世主義」（見火星報第百〇二期）的時候，關於自由派前此會怎樣贊美火星報的現世主義的事一句話都不提及，那這只是因爲這樣的贊美，比之任何非難和責罵都要來得傷心刺骨。這樣的贊美（已經爲解放報不是偶然且不是第一次所表示的贊美），事實上證明自由派的現世主義與社會民主派的「現世主義」（請讀爲「機會主義」）間是有一種同性的緣分在，且這樣「現世主義」的傾向，因「新火星派」（全部策略態度的錯誤，是充滿着他們（新火星派）每個決議案的。

事實上，現在俄國的資產階級已經顯露出它在『全民』革命中不澈底的性質和其自私自利的性質了。斯脫羅威的言論，大批自由派報紙的內容和神氣，大批鄉紳派，智識分子，以及其他站在托盧卑

茨基、別德簡架、微基、洛坡秩夫等方面的一流人政治活動的性質——這些都把資產階級不澈底和自私自利的性質顯露出來了。資產階級當然不能處處精確的瞭解，但就一般而言，因其階級根性的衝動，它很能領會：一方面，無產階級和『民衆』對於它的革命是有利的，因為可用他們來當炮灰，當反對專制的攻城器，但另一方面，如果無產階級和革命的農民對『專制澈底的勝利』且將民主主義的革命實行到底，那麼，這樣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對於它是十分危險的。因此，資產階級竭力要使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只抱着『謙恭』的作用。要使無產階級格外精當些，格外實際些，格外現世些，要使它的行為拿這樣一個原則為標準，就是：『不要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

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很知道工人運動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們並不反對工人運動，並不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他們甚且還大吹罷工自由，高唱文明的階級鬥爭，不過同時是拿着布連塘與洞架洛夫的觀點來認識工人運動和階級鬥爭的。換句話說，只要工人們能放棄『暴徒的思想』，放棄『狹隘的革命觀』，不要仇視『於實際有益的各種妥協』，不要企圖對於『俄國的全民革命』予以自己階級鬥爭的影響，予以無產階級澈底鬥爭的影響，放棄無產階級的堅決手段，放棄『平民式的甲可賓主義』——只要工人們能够這樣，那他們對於工人們的罷工自由，結社自由，是準備『讓步』的（實際上，工人們差不多已經自己爭得這種自由了）。因此，俄國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到處千方百計（如書籍，研究班，講演和討論等等）竭力要使工人們對於（資產階級的）確當說，（自由主義的）實際

論，（機會主義）的現世觀，（布蓮塘的）階級鬥爭說，（洞架洛夫的）職工聯合會說等等都能吸收到自己腦子裏。尤其是後面這兩個口號對於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或「解放黨」特別方便，因為就表面上看起來，這兩個口號是與馬克思主義的口號相同的，因為稍許不留心和稍許加以曲解，都可以使這兩個口號與社會民主派的口號混為一談，有時候簡直可認為是社會民主派的口號。譬如公開出版的黎明報（關於它，我們將與無產者的讀者另作詳細的討論）關於階級鬥爭，關於資產階級欺騙無產階級的可能，關於工人運動，關於無產階級的自動性等等，常常說出這樣『勇敢』的話來，致使不留心的讀者和程度不高的工人，莫辨青紅皂白，容易認作是真正的「社會民主主義」。而在事實上呢，這是一種資產階級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假冒，是階級鬥爭觀念的機會主義的曲解。

資產階級的這個大把戲（按它對羣衆的影響而言）其根本上的傾向，是要使工人運動偏重於職工運動，使它遠遠離開自己單獨的政策（即向民主專政走出的革命的政策），『使工人們的俄國全民革命的思想為階級鬥爭的思想所蒙蔽。』

讀者看到這裏，知道我們已把解放報的說話頭尾倒置過來了（上面引證中，解放報曾說列寧派『使其階級鬥爭的思想為俄國全民革命的思想所蒙蔽。』——譯者）這句說話，很能表示對於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之作用的兩個態度，即資產階級的態度與社會民主派的態度。資產階級想要無產階級只作職工運動，且藉此『就使無產階級的俄國全民革命的思想為階級鬥爭的思想（布蓮塘的

思想）所蒙蔽』這完全與我的信仰的著者伯恩斯坦派曾以『純粹工人運動』的思想來蒙蔽工人們政治鬥爭的思想一樣。社會民主派則反之，它要使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發展到在俄國全民革命中佔得領導的地位，即要使這個革命達到工農的民主專政。

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說，我們的革命是一個全民的革命。——因此，你既是一個特殊的階級，就應該只限於自己的階級鬥爭，——應該爲着『健全的思想』把自己的主要目光移轉到職工聯合會及其組織的公開，——應該把這些職工聯合會認爲是『自身政治訓練和組織的最重要的出發點』——應該在革命的時期，像「新火星派」一樣，起草些『嚴重的』決議案——應該對『對自由派傾向較好的』決議案表示愛惜，——應該選擇的首領，要是『成爲工人階級現世政治運動實際領導人材』傾向的首領，——應該『保持馬克思主義世界裏面的現世的原則』（若是很可惜，傳染了這個『非科學的』教案之『嚴厲的公式』）

社會民主派對無產階級說，我們的革命是一個全民的革命。——因此，你既是一個最先進且唯一能革命到底的階級，你就應該對於這個革命不僅祇是作最努力的參加，而且要領導它。因此，你的行爲就應該不僅祇陷於狹義的階級鬥爭的範圍，偏重於工會運動，而要設法將自己的階級鬥爭的範圍及其意義擴大到不僅祇能包括現在俄國全民德謨克拉西革命所有一切的責任，而且要擴大到能包括將來社會革命的責任。因此，你對於職工運動固然不應該輕視，對於公開活動的半點可能固全都應利

用，但同時，你應該在革命的時期，把武裝暴動和組織革命軍的任務看做是自己的首要任務，因這是民衆對專制完全勝利和取得民主共和政體及真正政治自由之唯一的道路。

至「新火星派」的決議案，以其『路綫之錯誤』對於這問題所持的態度是如何的不澈底，如何的流產，如何的爲資產階級所同情的，這裏用不着多說了。

二 馬丁諾夫同志又來「深解」問題

現在且來看看馬丁諾夫在火星報第百零二期和百零三期所發表的文章。馬丁諾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想要證明我們從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引出來的許多說話解釋得不正確，而他自己的解釋却正確，——對於這種企圖，我們在這裏當然不能答覆。這種企圖是不值得注意的，馬丁諾夫的詭滑是很明顯的，問題於我們是很清楚。若再把它提起來說，當然沒有趣味。凡是有思想的讀者，都能容易看出馬丁諾夫對於全部問題退讓的詭滑，尤其是在無產者編輯社現時正在準備的譯稿——恩格斯之巴枯寧派的工作和一千八百五十年三月馬克思之共產主義者和同盟幹事會宣言出版時，更容易看出這種詭滑。現爲使讀者明白馬丁諾夫的退讓起見，只要從他的論文中舉出一個證據就够了。

馬丁諾夫在火星報第百零三期說：『火星報是承認建立臨時政府爲革命發展的許多可能和有

利的道路中之一條道路，而否認社會民主派參加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之有利其理由，就在爲將來完全掌握那副國家的機器，以便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革命。」換句話說：火星報現在已承認前此畏懼革命政府要對於國庫與銀行負責的謬誤，已承認畏懼奪取『監獄』等到自己手裏來的危險和不可能之妄誕。但此火星報的糊塗還和以前一樣，它把民主主義的專政和社會主義的專政混爲一談。馬丁諾夫要掩護自己的退讓，這種混亂與荒謬是無可避免的。

雖然新火星報的荒唐者中，馬丁諾夫還是一位頭等的荒唐角色，也可說是一位精緻的荒唐角色。當他看問題不清楚，而費盡氣力以求『深解』這問題的時候，他差不多屢次都『想出』一些新的語句來，而這些新的語句很能把馬丁諾夫所持態度的全部詐僞都告訴我們。試一回想他在以前經濟派時期如何『深解』了普列哈諾夫的意見吧！他曾創造一個語句說：『與業主和政府作經濟鬥爭。』我們從經濟派所有的作品中，很難找出比這更能表示經濟派的傾向全部詐僞的語句。現在也是這樣。馬丁諾夫很熱烈的爲新火星報服務，且當他每次說話的時候，差不多次次都貢獻我們一些新材料以估計新火星報所持態度的詐僞。他在火星報第二百零二期中說：『列寧無形中把專政和革命的兩個觀念交相替用了。』

實際上，所有「新火星派」對於我們的非難都可歸納到這一點。對於這種非難，我們是如何的感激馬丁諾夫呀！當他給我們以這樣非難的語句的時候，對於我們與「新火星派」的鬥爭是予以如何

的幫助呀！我們簡直要請「火星社」把馬丁諾夫拿出來反對我們，以便能對無產者作「深一層」的攻擊，以便能把這些攻擊的意見拿『自然原則』的話句表現出來。因為馬丁諾夫愈就原則來討論問題，他愈出醜，且愈將新火星報派的謬誤表示得透澈，對於自己和自己朋友所給的教訓愈有益處；使新火星的原則一直達到無稽妄誕為止。

前進報與無產者是把革命和專政的兩個觀念『交相替用』的。火星報不要這樣『交相替用』。正是這樣的，最尊敬的馬丁諾夫同志！你無意中把一個大的真理說出來了。你用一個新話句，把我們所說的話證實了，就是我們會說火星報跟着革命的尾巴後面跑，它對於革命任務的鑑定，是傾向着解放派的觀點，而前進報與無產者所提出的口號，是領導民主革命前進的口號。

馬丁諾夫同志，你不明白這個意思嗎？因為問題重要的原故，我們且來費點氣力，對你作番解釋。

民主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除上述各節中的分析外，還表現於下一點，就是有許多社會的階級和部份，雖然是完全站在承認私有財產和商品經濟上的基礎上說話的，是不能超越這種基礎的範圍的，但客觀的條件，使他們不得不承認專制政府和全部農奴制之無用，而傾向於自由的要求。同時，爲『社會』所要求且爲地主和資本家口頭（也只有口頭）所擁護的這個自由，其資產階級性質的暴露，已一天天明顯了。爲自由而戰的工人階級的鬥爭與資產階級的鬥爭，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與自由派的民主主義，其間根本上的分別，也一天天瞭然了。工人階級和其有覺悟的代表者自己前進，且把

這個鬥爭推往前進，它在這時候，非但不害怕這個鬥爭實行到底，而且竭力要把這個鬥爭推得比民主革命的最徹底還要徹底。資產階級是不徹底的，是自私自利的，它採取自由的口號是不完全的，是帶着假面具的。資產階級於兩個陣地（專制政府與無產階級）之間，能適應潮流之轉變，要左則左，要右則右，不斷的調和，不斷的妥協，以千方百計改變自己的態度和口號，因此，要以特別標幟，特殊『條文』（如斯達洛維爾或臨時大會派決議案中所提條文之類）來畫出一定的界限，以為到了某地步，自由的朋友——資產階級便開始帶假面具，或到了某地步，自由的朋友——資產階級便開始出賣自由，那定然是沒有效果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任務，不在乎想出這種死笨的『條文』來畫出一定的界限，而在乎熱烈地批評現時正在發展的政治局面，在乎暴露與日俱新且為我們所預先見不到的資產階級之畏退和叛變。

試一回想以前斯脫羅威先生在公開出版物中的論文，以及社會民主派與他作戰的歷史，你們便明顯地看出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擁護者——社會民主派對於上面這種任務是怎樣實現的，斯先生是從一個純粹謝波夫派的口號開始的，即所謂『地方自治與鄉紳會議的權力』，社會民主派曾經暴露他的假面具，且把它推入一定的憲法政綱。當這種『推促』因革命行程特別迅速而得有勢力的時候，我們的鬥爭便集中到了第二個問題，即不僅只要求一般憲法，而一定要求的是不記名投票的普通平等直接選舉權。當『敵人』的這一新陣地也為我們所『佔領』的時候（即解放聯合會採取普

通選舉權口號的時候，我們便再往前逼，指明兩院制的假面具和虛偽，指明解放派承認普通選舉權之不完全，且根據他們的君主思想，指明他們那種民主主義的妥協性質，換句話說，即指明解放派這批英雄是以俄國大革命的利益在那裏作買賣。

專制政府之頑固，國內戰爭的大進步，君主派之陷俄國於絕境，這些情形，使最滯鈍的頭腦，也要覺醒起來了。革命已是一個事實。要承認革命，已經不要求先生爲革命黨人。專制政府之破產，已是人所共見的事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獵德斯古在公開的出版物中說，實際上，這個政府已經無人服從了，——這話却是很公平的。現在專制政府表面上似很強固，實際上，只是一個紙老虎，革命的事變，簡直把這個垂死的寄生物拋在一邊了。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份子，已不得不把自己的行爲（或正確點說：把自己的買賣行爲）建築在事實上已經形成的社會關係上，而開始走到承認革命之必要。他們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爲他們是革命黨人的原故，而是因爲他們非革命黨人。他們其所以如此，是不得已的，是違背自己的志願的，是懷着妬忌的心臟看着革命進步的，是怒罵專制政府不該革命的，因專制政府不想妥協，而願爲生死存亡之奮鬥。他們的生性是如此，仇視鬥爭，又仇視革命，但是環境逼得他們走到革命的立場上去，因爲現在找不出其他立場的原故。

我們現在好像看滑稽戲劇一樣，帶假面具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公然企圖着起革命的禮服來了。解放派（請你們這批老爺們慢點開玩笑吧！）公然開始代表革命說話了！解放派公然開始向人們

說，他們『不怕革命了』（解放第七十二期中斯脫羅威的言論）解放派公然表示自己『要當革命的首領』了！

這種特殊現象，不但表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之進步，而尤表示革命運動之真正的發展，因這個革命運動已使人們不得不承認它自己了。現在連資產階級亦開始覺得站到革命方面之有益。但是另一方面，這種現象是證明革命運動正在發展到較高的階段，因之我們目前也有一些較新和較高的任務發生。資產階級之承認革命，不管其某個思想家個人的意識如何，但總不會是誠心誠意的。在現在革命運動轉變到較高階段的時候，資產階級亦必然表現其自私自利，不澈底和反動的狡猾行爲出來。故此，爲着我們的黨綱，爲着我們的黨綱發展，我們現在應當把最近革命的具體任務另行審定。昨天够用的口號，今天已不够用了。譬如我們昨天的第一個民主主義口號是要求承認革命，現在却不够了。革命這件事實，甚致使斯脫羅威先生也不得不對它承認了。這個革命底急不容緩的任務，其內容的本身如何，現在的局面，要求先進階級有確當的說明。斯脫羅威等一流人物雖然承認了革命，但他們馬上就張揚着自己驢子式的耳，又在那裏唱舊調，說什麼和平了結的可能，以及尼古拉號召解放派去掌握政權等等的话。解放派這流人物之承認革命，爲的是要更無危險的埋葬革命，出賣革命。我們現在要作的事，是要告訴無產階級與民衆，僅只革命一口號是不够的，應當把革命的內容本身精確了當，毫無二可，澈底堅決的表示出來；而能作這個表示，且能正確說明革命之『澈底勝利』者，又只有這樣一個口號，就是

『工農的民主專政。』

我們已經說明，在民主主義的承認這一問題上，解放派已步步高升了（自然不無社會民主派推進之影響）。我們開始與他們的爭論是：謝波夫的計劃（地方自治與鄉紳會議的權力）還是立憲後來：有限制的選舉制，還是普選制？再後：承認革命，還是與專制分贓妥協？現在是：承認革命而不承認工農專政，還是承認民主革命中工農專政的要求？解放派（無論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左派中之那一派：現在的解放派或其後起者）很有可能還前進一步，就是時候一到（也許在馬丁諾夫同志再前進一步的時候），他們也承認專政的口號，若是俄國革命大踏步的前進之一直達到堅決的勝利，那簡直必然將承認。那時候社會民主派的態度又將如何？現在革命之完全勝利，就是民主革命之終結，也就是社會革命堅決鬥爭的開始。實現現在農民的要求，完全壓倒反動勢力，取得民主共和政體，——這就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終結。也就是無產階級真正為社會主義而鬥爭之開始。民主革命愈完滿，則無產階級之新鬥爭也愈將寬廣，而堅決的發展。『民主主義專政』一口號，就是表示現時革命之歷史的聯系性，且表示站在新制度的基礎上為完全解放工人階級，推翻一切壓迫和剝削，實行新鬥爭之必要。換句話說：當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再向前進一步的時候，不僅只革命成為事實，而革命完全勝利亦成為事實的時候，——這時候，我們要把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的口號（即社會革命的口號）來『代替』（也許那時候的馬丁諾夫派還要悲傷痛叫）民主主義專政的口號。

三 資產階級對於專政的鄙陋見識與馬克思對於

專政的觀點

梅林格曾將馬克思於一八四八年在新萊茵報上所發表的文章重新出版，並加以附註，謂資產階級的出版物上會對該報有一度的非難，就是說新萊茵報似乎曾經要求「速即實行專政，作為實現德謨克拉西的唯一的方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五三頁）。以資產階級庸俗之鄙陋觀點來觀察問題，則專政的觀念與德謨克拉西的觀念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是彼此不相容納的。資產階級的份子不懂得階級鬥爭的理論，看慣了政治舞台上資、唯、着、統各種朋黨和會社之小自由和自治，以為專政的意思，就是取消一切自由和德謨克拉西的保證，就是各種自作自為，就是為着個人的「狄克推多」而濫用政權。實質上，我們那位馬丁諾夫就犯了資產階級庸俗的鄙陋觀點，因為他在新火星報自己的論文結論中說，前進與無產者之堅持着「專政」的口號，是因為列寧「苦心願一嘗幸福」（見火星報第二百零三期第三頁）。為使馬丁諾夫明白階級專政與個人專政的分別，以及民主主義專政的任務與社會主義專政的不同，我們若把新萊茵報的觀點拿來分析一分析，是不無裨益的。

一八四八年九月十四號的新萊茵報說：「革命後一切臨時的國家組織都需要專政，且要強有力

的專政。我們從最初起就責備干加仁（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後的內閣總理）說他未按專政的手段行事，說他未馬上打破舊機關的殘餘。當干加仁先生在那裏作憲法夢的時候，已被擊破的政黨（即反動黨）已得在官僚中和軍隊中鞏固自己的地位，敢於在各地開始公開的鬥爭。」

梅林格說，這幾句話，曾把新萊茵報論干加仁的內閣一篇長文的內容簡略重述出來。馬克思的這幾句話告訴我們什麼呢？這幾句話告訴我們說，臨時革命政府應該按專政的手段行事（這個原則是火星報所不能瞭解的，它害怕『專政』的口號）這是第一。第二，這個專政的任務是在消滅舊機關的殘餘（這正是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關於與反革命鬥爭的決議案中明白指出來的，一點，上面已經說過）第三，馬克斯屬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說他們在革命和公開的國內戰爭時期不該作『憲法夢』。這幾句話的意思如何，可從一八四八年六月六號新萊茵報的一篇文章中看得特別顯明。馬克思說：『國民立憲會議首先就應該是一個積極的會議，是一個革命的積極的會議。而佛蘭克府的會議却在那裏拿着學者的態度，練習國會議員主義的辭令，同時讓政府去行動。我們假設這種學者會議在長篇計議之後，能得規劃一個最好的議事日程和最好的憲法出來。但德國政府已經把刀槍來作議事日程了，試問在這個時候，從那個最好的議事日程和最好的憲法能發生什麼效力？』

這就是『專政』口號的意思，我們由此可知，若馬克思能看見「新火星派」謂『組織立憲大會的決議』為徹底勝利，或宣告『持極端革命之反對政府黨的態度』等等決議案，其態度為如何了！

民衆的偉大問題，只有拿力量才能解決，反動階級自己總是首先採用武力，採取國內戰爭的手段，『把刀槍作爲議事日程』，從一月九號起到現在，俄國的專制政府就是到處有系統的這樣作法，時局既已如此，刀鎗既已真正成爲政治議事日程的首要問題，暴動既已成爲必須且急不容緩的事——那麼，憲法夢和以學者的態度去練習國會主義的辭令，就都要成爲資產階級出賣革命的掩蓋物，都要成爲資產階級怎樣『離開』革命的掩蓋物。真正革命的階級，這時候就應該提出專政的口號來。

關於這個專政的任務問題，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還說過：『國民會議應該以專政的手段去對付已被淘汰的政府的反動陰謀，那時候，它方能在民衆意見中取得一個能够破壞一切刀鎗的力量，……否則這樣會議，只是拿些寂寞的辭令來疲困德國的民衆，不能吸引民衆，也不能被民衆所吸引。』按馬克思的意思，國民會議本應該把德國當時實際上存在的制度中一切與民主原則相矛盾的都肅清，而後鞏固這個國民會議所托足的革命基礎，保證革命所取得的民主，不受一切攻擊的危險。

故按內容來說，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對於革命政府所提出的一些任務，首先就是歸結到民主主義的革命一點，防止反革命，一切與民主原則相矛盾的都實際上肅清，這不是別的辦法，就是革命的民主主義專政。

現在且再往下看，按馬克思的意見，那些階級而且應當實現這些任務（實行民主原則到底，擊破反革命的一切進攻）馬克思說『民衆』。但是我們知道，馬克思曾經很激烈的反對小資產階級關於

『民衆』一致和民衆內部無階級鬥爭的妄想。當馬克思運用『民衆』二字的時候，他并未拿這一籠統的名詞來抹殺了階級的分別，而只是把能够革命到底的一定的份子，聯合并稱罷了。

新萊茵報說：柏林無產階級於三月十八號勝利之後，革命的結果可分兩方面：一方面——民衆武裝，集會權，實際上已獲得民主的政治，另一方面——君主專制的保存和干加仁及干節曼內閣的成立，即大資產階級政府的成立，這樣，革命得到了一個兩層性的結果，這種結果，是必然要破壞的。民衆是勝利了；他們已獲得民主主義澈底性質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統治權未移轉到民衆手裏，而落到大資產階級手裏去了。總之，革命未得實行到底。民衆會使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得建立內閣，而這些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們馬上就表示了自己的圖謀，提議與舊時的普魯士的貴族和官僚合作。亞爾尼康尼刺和史維林等都加入了內閣。

大資產階級從最初起就是反革命的，它因害怕民衆，即害怕工人們和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便與反動勢力結成了攻守的同盟。

這樣，不僅祇一紙『組織立憲大會的決議』還不够使革命澈底勝利，甚至於這種會議事實上已經召集都還不够，甚至於在武裝鬥爭中（在利工人羣衆於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對於軍隊的勝利）已經得到部份的勝利，都還有革命『未完成』，『不實行到底』的可能。要怎樣才可使革命實行到底呢？要看直接的統治權移轉到誰的手裏，——移轉到別德龍架、俄基和羅基秋夫，一班人手裏去（干加

仁)和干節曼(一流人物)還是移轉到民衆手裏去,即工人們和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手裏去,在第一種情形之下,資產階級將握得政權,而無產階級將得着的是『批評自由』、『持極端革命的反對政府黨態度』之自由。獲得勝利後的資產階級,必馬上就與反動勢力結爲同盟(設若彼得堡的工人們在街上與軍隊鬥爭的時候只能獲得部份的勝利,且使別德龍架微基等等一班人得建立政府,那德國當時的情形必然要在俄國發生。)在第二種情形之下,有民主主義革命專政之可能,即革命完全勝利的可能。

現在還要的確明白的是,馬克思拿來與工人們一併稱爲民衆且以之與大資產階級對立的那個『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究竟是什麼?

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九號新萊茵報所載的一篇文章對於這問題有一個明顯的回答:『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不過是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的一種騙人的模彷彿罷了。

『一七八九年八月四號,佔領巴西利三星期後,法國的民衆於一日之內把一切封建的負擔都解除了。

『一八四八年七月十一號,三月巷戰後四個月,封建的負擔却把德國民衆征服了。喬爾架和干節曼是其中狼狽爲奸的。*

『一七八九年的法國資產階級,沒有一分鐘曾經拋棄過自己同盟者——農民,它知道自己統治

的基礎是在於消滅鄉村的封建關係，而造成自由的地主農民階級。

『一八四八年的德國資產階級，毫不顧良心的出賣了農民，出賣了自己的最天然的同盟者，這種同盟者是與德國資產階級骨肉相親的，德國資產階級沒有他們是無力量反對貴族的。』

『保存封建的權利，用着贖買（自欺）的形式來准許這些特權的存在，——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的結果是如此。真似太山生下了——一個老鼠。』

上面這段引證，給我們四個重要的結論：（一）未完成的德國革命和已完成的法國革命不同，是在德國資產階級不僅對一般的民主主義變了節，且對於農民也變了節。（二）造成自由的農民階級為完全實現民主革命的基礎。（三）造成這樣的階級，就是消滅封建的負擔，破壞封建——絕還不是

*千節曼是大資產階級政黨的團員（俄國的士盧白次基或羅基秋夫等人都配得上）儒爾傑為千節曼內閣中的土地部長，曾起草土地問題的草案書，該書本身似乎要『無報酬的』取消封建的負擔，但在事實上，僅把那些小而重要的負擔取消了，而最重要的負擔卻是保存着或要贖買。儒爾傑這種人，如俄國的加魯阿夫、曼龍翼羅夫、儒爾維、斯坦等都配得上（加氏為從前莫斯科大學的教授，長於統計學，為農村實業的專門家。曼氏——經濟學者立憲民主黨，以前莫斯科大學教長，曾充一九一七年第一屆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儒氏——立憲民主黨，經濟學教授，為土地問題的專門家。——譯者）這些人都想『增加農民的土地』，但又不想得罪地主。

社會主義革命。(四)農民爲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最天然的』同盟者。沒有這種同盟者，資產階級是『無力量』對付反動勢力的。

若把各具體的民族特點相當的加以變更，把封建制來代以農奴制，則上述各點可完全適用於一九〇五年的俄羅斯。

我們把馬克思所分析過的德國經驗中的教訓拿來考慮，爲使革命堅決勝利，除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口號外，我們不能有別的口號，這是無疑義的。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拿來與反動勢力和出賣革命的資產階級相對立的『民衆』，其主要的成份爲無產階級和農民，這也是無疑義的。現在俄國的自由資產階級和解放派也正在出賣農民，且將出賣農民，這就是說，他們必以騙人的改良來解決問題，而在地主和農民激戰的時候，他們必跑到地主方面去。只有無產階級在這個激戰中擁護農民到底。這是同樣無疑義的。俄國農民戰鬥的勝利，即全部土地歸農民所有的時候，也將是民主革命的完成，且將爲革命已實行到底的社會基礎，但這決還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也決還不是像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和社會革命黨人所說的那種『社會化』。這是很明顯的。農民暴動的成功，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說在民主共和的基礎上爲社會主義真正堅決的鬥爭肅清一條大道罷了。這個鬥爭中的農民因爲是一個地主階級，其作用與現在的資產階級爲德謨克拉西而鬥爭一樣，也是叛變的，也是動搖的，如果忘記這一點，就無異忘記了社會主義，無異在無產階級的利益和責任上忘記了自己和他人。

爲使馬克思於一八四八年的觀點在我們的分析中完滿起見，必須指出當時德國社會民主派（或按當時的稱呼，名爲無產階級的共產黨）與現代俄國社會民主派中間的一個重要不同點，關於這問題，且把柯林格的一段話先摘錄如下：

新萊茵報的登政治舞台，是一個『德謨克拉西的機關報。』該報所登載的一切論文，自有一貫的主張，不可忽視，但它直接擁護資產階級革命的利益，反對專制和封建，比較擁護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反對資產階級利益要多。革命的時候，關於工人運動的特別材料在該報上找得的很少，但要知道該報有一附刊，爲堅利容工會的特別機關報，莫爾和沙波爾爲其編輯，每週會出版兩次，固然德國工人運動的能幹人材彭爾，曾爲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和普略塞的學生，且於一八四八年在柯林格充萊茵報的通訊員，但無論如何該報之少注意當時的德國工人運動，是爲現在的讀者看得很顯明的，彭爾在自己的『回憶』中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說出一句話來表示過自己對於他們的工人組織之不滿。可是看後來恩格斯的聲明，使我推想他們那時候是不滿意的，至少是不滿意那種鼓動的方法。若以彭爾對於當時工人階級覺悟完全還未發達（尤其是德國）的情形所不得不作出許多讓步（根據共產主義宣言來觀察，是完全受不起批評的一些讓步）而言，他們的不滿意是很有根據的。若以彭爾所指導所擁護的鼓動工作比較的還做得有計劃而言，他們的不滿是無根據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把當時工人階級最重要的任務首先就看在盡可能的擴大資產階級革命，這在歷史上和政治上都正確，是無

疑義的。……雖然如此，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九年四月即主張特別的工人組織，且決定參加東普魯士無產階級所籌備的工人代表大會，這個事實是證明工人運動的一點粗淺的機能，如何的能夠改變了偉大思想家的意見。」

這樣，僅於一八四九年四月，即於這個革命的報紙差不多出版一年之後（新萊茵報是於一八四八年六月一號開始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才主張特別的工人組織！至此時為止，他們所幹的不過是一個『德謨克拉西的機關報』是與單獨的工人政黨沒有絲毫組織聯系的機關報！這件事實（按我們現在的觀察是如何奇怪的一件事實）明白的告訴我們，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與現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之間的差別，是達到如何程度。這件事實告訴我們，德國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的影響，無產階級的力量是表現的少了多少倍（因為一八四八年德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國家不統一——都落後）。這一點，當我們考慮馬克思在這一時期（及此後不久）所發表的許多言論（關於工人階級單獨組織政黨的必要）時，不要忘記馬克思僅從民主革命的經驗，差不多經時一年之久，才得到一個實際結論，前此時候，德國的全部環境都是市儈的，小資產階級的。馬克思所得的實際結論，對於我們已經是國際社會民主派半個世紀的經驗可獲，從這個經驗，我們已開始組織「德國社會民主黨」了。如此現在我們誰都不說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報紙可存在於無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外，或使這種報紙的態度能够在片刻之內不過像『德謨克拉西的機關報』一樣，發表言論。

但是馬克思與彭爾之間所恰恰開始暴露的那種矛盾，現在在俄國比較更顯明的存在，且無產階級在俄國民主革命巨流中的力量愈強大，則這種矛盾的形式亦愈將擴大。梅林格推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彭爾鼓動工作不滿的時候，其言辭未免太軟弱而偏袒了。其實，恩格斯於一八八五年關於彭爾的事曾經這樣說過：

『共產主義者聯合會的會員，會到處爲極端民主主義運動的領導者，且證明這個聯合會是革命行動的一個最好的學校。排字工人彭爾，會爲聯合會在普略塞和巴黎二處負擔工作的會員，在柏林組織了一個「工友會」這個工友會組織的傳佈曾經很廣，存在至一八五〇年爲止。彭爾是一個聰明的少年，但是未免出馬作政治家太快了。他曾與各式各樣的鄙徒『爲友』，唯一的目的是在拉攏一些人到自己身邊。他並不是一種能夠團結各種傾向爲一致，使混亂成爲有條理的人材。故此他的工友會的正式言論中，常常發現些不明不白的意見，把共產主義宣言的見解常常與行會式的回憶和希望混作一塊，與路易布蘭和普魯東的見解混作一塊，與保商主義的擁護等等混作一塊；總之，這種人是想對人討好的。他們所作的事，特別是在於提倡罷工，組織職工聯合會，組織生產合作社，同時却忘記了問題首先在於以政治上的勝利爲方法，先取得一個立場，以便能穩固的有希望的實現那些任務。果然，當反動勢力的勝利逼使得工友會的首領們也感覺得有直接參加革命鬥爭的必要的時候，那時一班團結在他們週圍的無覺悟的羣衆，自然把他們拋棄了。彭爾自己於一八四八年五月曾經參加過德列司

頓的暴動，僥倖得免於死。工友會對於無產階級的偉大的政治運動，好像是一個特立的組織，抱着對岸觀火的態度。這個組織的存在，大半只是紙上的存在，且其作用小，故反動勢力僅至一八五〇年才感覺得必須要封閉它，而其各部分，僅到後來好多年數才封閉。彭爾（其真名為Butler Mijish）到底都未得成爲一個政治家，而僅成爲了一個瑞士的小大學教授，——他不把馬克思的著作譯成其他文字，却把賢良的列爾的著作譯成甜密的德文。」

這就是恩格斯對於社會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兩個策略的估計！

我們的「新火星派」現在這樣的熱心追隨着「經濟派」之後，致使君主派的資產階級誇讚他們，說他們的『光榮』。他們亦把各樣各色的人們拿到自己的身邊，諂媚「經濟派」，用獨斷式的手段，說什麼『自動』，什麼『民主主義』，什麼『自治』等等的口號，以吸引那些無覺悟的羣衆。他們的工會也常常只是存在於新火星報的紙面上。他們的口號和決議案，也表現同樣的不瞭解『無產階級偉大政治運動』的任務。

第一章 我們可以在那一點上來講俄國革命

有國際意義呢

就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俄舊歷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公歷十一月七日）後的最初幾個月看來，似乎因為落後的俄國與西歐各國有極大的差異，所以西歐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將和俄國大不相同。現在我們已有很豐富的國際經驗，可以十分切實地證明，俄國革命有些基本點，並非只有一個國家的，特殊民族的，單獨俄羅斯的意義，而是有國際的意義。我這裏所講的國際意義，並非就其廣義而言，如果就俄國革命對於各國的影響講起來，那末，俄國革命，非只有些基本點具有國際意義，而是一切基本點和許多次要點都具有國際意義。不是的，我是就最狹義而言，即是說，我們要用下面一種見解去瞭解國際意義：就是俄國所發生過的現象，在國際方面也有重大的意義，換言之，在國際範圍內，這種現象必然要在歷史過程中重演出來，因此不得不承認，俄國革命有些基本點是有這一種國際意義的。

如果誇大這個真理，認為這個真理所包括的，不僅是俄國革命基本點中之有些基本點，那自然是

極大的錯誤。同時，將來無產階級革命，即使在一個先進國家中得到勝利以後，多半會發生一種劇變：那時俄國很快地就不成爲模範國家，而又成爲落後的（就『蘇維埃的』與社會主義的意義上講起來）國家——假若忽略這一點，也同樣是錯誤的。

但是在目前的歷史階段上，情形却正是如下：俄國的模範，使各國看見牠們在不遠的將來必然要發生的事件當中的某些事件，而且是很切要的事件。各國先進的工人，早已懂得這一點——而且與其說懂得這一點，不如說由於他們革命階級的本能而覺察了這一點。因此蘇維埃政權以及布爾塞維克理論和策略原理便具有國際『意義』（狹義的說）。可是第二國際『革命的』領袖們，如德國的考茨基，奧國的達威爾和阿德列爾之流，却完全不瞭解這一點，因此牠們也就成了反動者，成了最下流的機會主義與社會民主黨叛賣行爲底辯護士。例如，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出版的全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 Sozialistische Bucherei, Heft II, Ignaz Brand*）這本無名氏的小冊子（註1）特別明顯地表現了他們底整個思想過程和整個思想範圍，更確切一點說，表現了他們的思想之不澈底，拘泥小節，卑污齷齪和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行爲，居然到了什麼程度——而且這都是用『保護』『全世界革命』理想的招牌來粉飾的。

關於這本小冊子，以後有機會再來詳細討論。現在我們只要再講到一點：在很久以前，當考茨基還

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叛徒的時候，他以歷史家的態度研究問題，而預先看到了將來可以有下述一種局面，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精神將成爲西歐的模範。這是一九〇二年的事，當時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報上做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斯拉夫人與革命。請看他在這篇文章上所說的話：

『現在』（和一八四八年相反）『不僅可以認爲斯拉夫人已經加入革命民族底隊伍，而且可以認爲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底重心已逐漸移到了斯拉夫人那邊去了。革命的中心，自西方逐漸移向東方。十九世紀之前半期，革命中心在法國，有時亦在英國。到了一八四八年，德意志就踏進了革命民族底隊伍……新世紀開始時所發生的事變，使我們感覺到革命中心將繼續移動，即移向俄國……俄國曾由西方吸取了這樣多的革命創作力，牠現在或許自己要成爲西方革命精力底根源。如火如茶的俄國革命運動，也許將成爲最有力的藥品，將一切已開始滋蔓於我們中間的腐敗的市俗習氣與近視的政客行爲，一掃而清之，使鬥爭的熱忱以及對於我們偉大理想所表現的忠誠，又能光芒萬丈地爆發起來。俄國久已不是西歐反動與專制勢力底簡單支柱了。現在情形也許恰恰相反。西歐正在成爲俄國反動與專制勢力的支柱……如果俄國革命家不須同時與俄皇的同盟者——歐洲資本——作戰，那麼，他們或許早已打倒了俄皇。我們希望，他們在這次能夠把兩個敵人都打倒，使新的『神聖同盟』比他的老祖宗更崩壞得快些。俄國現在的鬥爭，無論其結果如何，但是烈士們（可惜在

鬥爭中犧牲的烈士實在太多了)的痛苦和鮮血,總不會落空的。他們的痛苦和鮮血在整個文明世界裏灌溉着社會革命的嫩芽,使之發育得更迅速,更茂盛。在一八四八年時期,斯拉夫人好像嚴霜一樣,摧殘了人民春氣中的鮮花。現在他們也許將成爲春風,溶解反動的冰雪,給各國人民開闢幸福的新春。』(卡爾·考茨基著:斯拉夫人與革命,見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第十八期俄國社會民主黨革命的報紙——火星報)。

十八年前的考茨基寫得多麼好呵!

第二章 布爾塞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經看見，如果我們布爾塞維克黨內沒有真正極嚴格的鐵的紀律，如果他没有得到全體工人階級羣衆最完備的和最不顧犧牲的擁護，即是說，如果他沒有得到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能力的，純潔的，肯犧牲的，有影響的，能够領導或吸引落後部隊的人們的擁護，那末，布爾塞維克黨，莫說兩年半，便是兩月半，也不能維持政權。

無產階級專政，乃是新階級向比較強有力的敵人，向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最不顧一切的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底反抗，因為他被人推翻（即使在一個國家內也罷）的緣故而更加強十倍，他的勢力不僅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不僅在於資產階級國際聯繫底強固，而且還在於習慣底勢力與小生產底勢力。因為小生產留存在世的，可惜還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然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因此之故，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如果不作長期的，百折不回的，不顧生死的戰爭，如果沒有堅忍心，沒有紀律，沒有堅強的精神，沒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和統一的意志去進行這種戰爭，那末，

要戰勝資產階級是不可能的。

我再重說一遍，俄國得勝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經驗，明白告訴一切不會思索或對此問題不會思索過的人們說：無條件的集權與無產階級底最嚴格的紀律，乃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這個問題人們時常講到。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在什麼條件之下這才有可能，人們却很少加以思索。除了向蘇維埃政權及布爾塞維克致歡迎辭外，難道不應當時常去極其鄭重地分析布爾塞維克黨之所以能够養成革命無產階級所必需的紀律之原因嗎？

布爾塞維主義之成爲政治思想派別與政黨，是從一九〇三年開始的。只有布爾塞維主義整個存在時期的歷史，才能圓滿說明布爾塞維主義何以能够在最困難的條件之下，養成而且保持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

這裏首先發生一個問題，就是無產階級革命黨的紀律是靠什麼東西來維持的？是靠什麼東西來檢驗的？是靠什麼東西來鞏固的？第一，是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及其對於革命的忠心，靠牠的堅忍性，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第二，是靠他善於同廣大勞動羣衆——首先同無產階級的羣衆，同時也同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聯繫，接近，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和他們融成一片。第三，是靠這個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底正確，牠的政治的策略與戰路底正確，而且要使最廣大的羣衆根據自身的經

驗確信這種正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真正能夠充當先進階級（以推翻資產階級，改造整個社會爲已任的先進階級）政黨的革命黨內部之紀律是不能實現的。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整飭紀律的企圖，將不免流爲空談和虛妄。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並不是一下子就能產生的。只有經過長期工作，艱苦經驗，才能造成；正確的革命理論，可以促進這種條件的形成，而這種理論本身也不是信條，這種理論只有與真正羣衆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際密切聯繫起來，才能完全形成。

布爾塞維主義之所以能够養成最嚴格的，集中的與鐵的紀律，並且能够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異常困難的條件之下順利實現這種紀律，其原因只是在於俄國歷史上的許多特徵。

一方面，布爾塞維主義於一九〇三年是在最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個——只有這個——革命理論底正確，不但是由整個十九世紀全世界的經驗所證明，而且特別是由俄國革命思想界的迷惑，遊移，錯誤和失望底經驗所證明。大約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五十年內，俄國進步的思想界，會處在空前野蠻與反動的俄皇專制壓迫之下，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如渴思飲，他用了驚人的奮勉精神與縝密態度來探索歐美關於這方面的每一種「新發明」。俄國在半世紀裏，受到了空前的痛苦與犧牲，表現了空前的革命勇氣，牠表現難以設想的努力，牠專心致志從事探究，牠在半世紀裏經過訓練，實驗，失望，審查，參照歐洲經驗等等磨折，他真正受盡了千辛萬苦之後，才獲得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革命者不堪俄皇政府的迫害而不得不僑居國外，所以革命的俄國，

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其國際聯絡之頻繁，及其對於各國革命運動的形式與理論之熟悉，為世界任何國家所不及。

另一方面，在這個堅固的理論基礎上所產生出來的布爾塞維主義，有了十五年（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年）的實際歷史，這種歷史經驗的豐富，世界上沒有倫比。因為在這十五年內，任何國家都沒有這樣多的革命經驗，革命運動各種形式——合法的與非法的，和平的與激烈的，祕密的與公開的，小組的與羣衆的，國會議主義的與恐怖主義的種種形式——彼此交替，都沒有這樣迅速和複雜。任何一國都沒有在這樣短促的時期內，積聚這樣多的現社會一切階級鬥爭的形式，方法以及鬥爭所帶的色彩；而且因為俄國的落後與俄皇政府的殘暴壓迫，這種鬥爭特別快地成熟起來了，特別迫切和順利地領會和採用了相當的歐美政治經驗的『新發明』。

第三章 布爾塞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革命底準備時期（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到處感覺大風暴底逼近。一切階級內部都在醞釀和準備。國外僑民的報紙，把革命的一切根本問題都在理論上提出。三個主要階級，三個主要政治派別——資產階級自由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他掛着『社會民主』與『社會革命』的招牌）以及無產階級革命派——底代表，以綱領觀點上與策略觀點上的激烈鬥爭，預示和準備將來公開的階級鬥爭。凡羣衆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以及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用武裝鬥爭以求解決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而且應當）在那時報紙上找到他們的雛形。在這三個主要派別中間，自然還有無數其他居中的，過渡的，騎牆的派別。更確切一點說，在機關報、政黨、政派、政團間的鬥爭中，形成各種真正階級的政治思想派別；各階級各自鍛鍊他們的思想，與政治上的適當武器，準備來日廝殺。

革命時期（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一切階級都公開出台。一切綱領上與策略上的見解，都經受羣衆運動底檢驗。罷工鬥爭底廣泛與激烈，爲全世界空前所未有。經濟罷工轉變爲政治罷工，而政治

罷工轉變爲武裝起義。領導的無產階級與被領導的遊移不定的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經過實際上的檢驗。在鬥爭的自然發展過程中，產生了蘇維埃的組織形式。當時關於蘇維埃的意義之爭論，已預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的大鬥爭。國會的鬥爭形式與非國會的鬥爭形式，抵制國會的策略與參加國會的策略，合法的鬥爭形式與非法的鬥爭形式底交替，以及他們的相互關係與聯繫——凡此種種，都令人驚訝其內容之豐富。如就羣衆和領袖、階級和政黨所得到的政治科學原理的訓練而言，那末這時期底每一個月，實等於『和平的』『憲法的』發展時期底一年。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

反動時期（一九〇七到一九一〇年），俄皇帝制得勝了。一切革命的與反政府的政黨都失敗了，消沉，喪氣，分裂，渙散，叛變，無恥等等行爲代替了政治活動。日益趨向唯心論的哲學，神祕主義成爲掩飾反革命情緒的烟幕。但同時正是這種大失敗給革命政黨與革命階級以真正的最有益的教訓，給牠們以歷史辯證法底教訓，給牠們以瞭解進行政治鬥爭，能够而且善於進行政治鬥爭的教訓。患難之中識朋友，戰敗之軍善學習。

俄皇帝制勝利之後，不得不趕快破壞資本主義以前的宗法制度底殘餘。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很快地前進，超階級的和非階級的幻想，相信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幻想，也從此烟消雲散。階級鬥爭完全用新的方式表現出來，並且表現得越發顯著。

革命的政黨須要學習到底。他們學習了怎樣進攻。現在須要懂得，除了學習進攻的科學之外，還須補習善於退守的科學。他們須要懂得——而革命的階級在自身痛苦的經驗中學習懂得——如果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守，就不能得到勝利。在一切被擊破的反政府黨和革命黨中間，布爾塞維克黨退却得最有秩序，他的『軍隊』損失最小，他的幹部保存最多，分裂最微（就其分裂的深度與是否可以挽救的程度而言），頹喪最輕，他最有能力用最廣大的規模，最正確的辦法，最強大的毅力去恢復工作。布爾塞維克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為他們無情地揭破了，並驅逐了講大話的革命家，這些講大話的革命家不願了解，必須退守，必須善於退守；他們不願了解，一定要學會在最反動的國會，最反動的職工會，協作社以及保險處等組織中公開發進行工作。

革命高漲時期（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革命高漲最初發展得非常之慢，到了一九一二年連那河事變以後，便稍微快些了。孟塞維克是工人運動中的資產階級走狗，整個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以後，看清了他們的這種作用，所以百般幫助他們來反對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戰勝了莫大的困難，打退了孟塞維克。可是，如果布爾塞維克不運用正確的策略，把秘密的工作與必須利用的『公開可能』配合起來，那麼他們就永遠不能打退孟塞維克。在最反動的國會內，布爾塞維克奪得了全部工人議席。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時期（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在這個時期內『國會』反動到了

極點，在這種條件下，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布爾塞維克黨）公開參加國會而得到極大的益處。布爾塞維克的議員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在國外僑民底報紙上，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沙文主義，社會愛國主義，不澈底的與澈底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以及反對和平主義幻想的革命主張，這些派別中各色各樣的觀點完全表現出來。第二國際中的書蟲與老太婆，趾高氣揚嘲笑俄國社會黨內「派別」之複雜與鬥爭之劇烈，可是當大戰把一切先進國內稱頌一時的『公開』可能取消以後，他們連近似俄國革命家在瑞士及其他許多國家裏所辦到的自由（祕密）交換意見，自由（祕密）得出正確觀點這種事情，都不能組織起來。正因為如此，所以各國直爽的社會愛國派與「考茨基派」都成了無產階級底最壞的叛徒。布爾塞維主義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之所以能夠勝利，其中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牠從一九一四年末起，便無情揭破了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法國的龍格主義，英國的獨立工黨首領與費邊派（註二）底見解，意大利的徒拉梯等，都與「考茨基主義」相同）之卑鄙齷齪，而羣衆後來本着自身的經驗，日益相信布爾塞維克底見解是正確的。

俄國第二次革命時期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一月（俄舊歷二月至十月）這個時候，俄皇政府異常零落和凋蔽（加上痛苦萬分的戰爭之打擊和負擔），這就造成一種非常的破壞力，去破壞俄皇政府。在幾天之內，俄國就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在戰爭的環境裏）都要自由些。反政府黨與革命黨底領袖，也和最『澈底的國會主義的』共和國內一樣，出來組織政府，從前

在國會內（雖然是在反動絕頂的國會內）反政府黨領袖底稱號，會使得這種領袖容易在革命中起自己的作用。

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在幾個星期內，就精通了第二國際底歐洲英雄們，關員派以及其他機會主義壞蛋底一切方法和手腕，一切論據和詭辯。我們現在讀到關於謝德曼和諾斯克，關於考茨基和希法亭，關於連聶爾和阿烏斯鐵爾里茨，關於奧托·鮑威爾和弗里茨·阿得列爾，關於徒拉梯和龍格，關於英國的費邊派及「獨立工黨」領袖等等所寫的東西，總覺得（事實上也是這樣）都是枯燥無味的重述，舊曲老調的再唱而已。所有這些，我們都在孟塞維克那裏見過了。歷史惡作劇，使落後國家的機會主義者，把許多先進國家的機會主義者底見解，先說了出來。

第二國際底一切英雄們破了產，他們在蘇維埃和蘇維埃政權底意義與作用的問題上手了醜，現在脫離了第二國際的三個主要政黨（就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法國龍格黨和英國獨立工黨）底領袖們在這個問題上，丟醜與昏亂，特別厲害，所有他們都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成見底奴隸（完全與一八四八年自命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小資產者同聲同氣），凡此種種，我們在孟塞維克底例子上都已經見過了。歷史惡作劇而開了以下的玩笑：俄國在一九〇五年產生了蘇維埃；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十一月（俄舊歷二月到十月）間，孟塞維克偽造了蘇維埃，而這些人因為不能了解蘇維埃底作用 and 意義，以至破了產；現在蘇維埃政權的思想，在全世界上都產生了，牠以空前未有底速度傳播於各

國無產階級中間；同時第二國際的老英雄們，地和我們的孟塞維克一樣，因為不能了解蘇維埃底作用與意義，到處正在破產。經驗已經證明，在無產階級革命底有些很重要的問題上，其他一切國家必然要走俄國所走過的道路。

布爾塞維克進行了勝利的鬥爭去反對代議制的（而事實上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和反對孟塞維克，布爾塞維克開始這種鬥爭，是很審慎的，準備這種鬥爭也不是簡單的——絕不像現時歐美各國所常聽到的那種意見。在第二次革命時期底初期，我們並不會號召推翻政府，而且說明：如果不預先改變蘇維埃底成份與情緒，那末，推翻政府是不可能的。我們並不會宣告要抵制資產階級的國會，抵制立憲會議，而且說過（自一九一七年我們黨底四月會議起，使用黨底名義正式說過）：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比沒有立憲會議的好些，但『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却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的代議制的共和國，都要好些。如果沒有這種謹慎的，周詳的，仔細的，長期的準備，那末，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既得不到勝利，也保不住這個勝利。

第四章 布爾塞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那

些敵人作鬥爭而發育，固鞏和鍛鍊出來的

首先而且主要的，是與機會主義作鬥爭；這種機會主義到了一九一四年完全變成了社會沙文主義，完全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自然，這種機會主義曾經是布爾塞維主義在工人運動內部的主要敵人。牠在國際範圍內現在也還是主要的敵人。這個敵人，過去和現在都是布爾塞維主義所最注意的。布爾塞維主義在這方面的活動，現在國外也已知道得很清楚。

講到布爾塞維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另一個敵人，就不同了。國外還很少知道，布爾塞維主義是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作長期的鬥爭而發育和鍛鍊出來的。這種革命狂熱類似無政府主義，或有些地方剽竊無政府主義，牠在一切主要點上，都離棄無產階級的堅忍的階級鬥爭所需要的條件與要求。在理論上，馬克思主義者完全認定（並且被一切歐洲革命與革命運動的經驗所完全證實）小有產者，小業主（這一種社會階層，在歐洲許多國家裏，有極大的羣衆），由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永受壓迫，並且時常急疾迅速地陷於貧苦和破產，所以容易趨於極端的革命狂熱，但不能表現堅忍，有組織，有紀

律和不屈不撓的精神。被資本主義壓迫以致『發狂』的小資產者，和無政府主義一樣，都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共有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革命狂熱之動搖不穩，華而不實，最容易轉為馴服，消沈和空想，甚至轉而『瘋狂』似地醉心于某種資產階級的『時髦』思潮，——這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黨在理論上，抽象地承認這些真理，這還是絲毫不能使他們免去舊的錯誤：這種錯誤，遇到意外事端，在特殊的——多少特殊的——環境裏，總是要以稍新的形式，以前此未曾見過的形式，又發作起來的。

無政府主義，往往是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惡底一種處罰。兩種畸形彼此互為表裏。俄國居民中，小資產階級成份較西歐各國更多，但無政府主義在兩次革命（一九〇五與一九一七年）及其準備時期，比較起來都只有極小的影響，其原因，一部分當然是由於布爾塞維主義底功勞，由於牠始終進行了最無情的，最不調和的，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我說『一部分』因為削弱俄國無政府主義勢力的，另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在過去（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一度異常繁盛，並完全暴露了牠是不正確的，暴露了牠不能成爲革命階級的領導理論。

布爾塞維主義在一九〇三年發生時，即承受了與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或者是同無政府主義眉目傳情的）革命狂熱作無情鬥爭的傳統。這種傳統始終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所具有的。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當俄國革命無產階級底羣衆政黨奠定基礎時，這種傳統就特別穩固了。布爾塞維主義，承受並繼續這種鬥爭，牠在三個要點上與那表現小資產階級革命狂熱最甚的政黨作鬥

爭，即與「社會革命黨」作鬥爭。第一個要點，就是否認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政黨，絕不願（確切點說不能）了解，在每次政治行動以前，必先客觀上嚴格估計到各階級底力量及其相互關係。第二個要點，就是這個政黨承認個人恐怖，個人暗殺，牠以為這是牠特殊的「革命精神」與「左的精神」，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却堅決排斥這種手段。自然，我們之所以排斥個人恐怖，只是因為牠是達不到目的，至於有些人「原則上」斥責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或一般地斥責那已經取得勝利而被全世界資產階級圍攻的革命黨所實行的恐怖，那麼，這種人還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就已被普列哈諾夫（那時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所嘲笑和唾棄了。（註三）第三個要點，就是「社會革命黨人」以為他們的「左的精神」就在於他們嘲笑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較輕微的機會主義罪過，而同時在某些問題上却又極力模倣該黨極端的機會主義者，例如在土地問題或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

這裏附帶說明一句，歷史上的事實，在巨大的，全世界歷史的範圍內，現在已經證實了我們所始終堅持的一種意見是對的，就是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須知普列哈諾夫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已經要求開除伯恩斯坦（註四）底黨籍，而始終繼承這種傳統的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三年完全揭破了連金之卑鄙和叛變行動*）最近似革命無產階級取得勝利所需要的政黨。現在一九二〇年，

*請參看俄文版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三三三頁至三三六頁德國工人運動中什麼東西不應該仿

微。編輯部註。

經過戰爭期間與戰後最初幾年的一切可恥的破產與危機以後，可以明顯看出，在西歐一切政黨中間，正是德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產生了最好的領袖，而且重新恢復元氣和健康也比其他各黨早些。無論在斯巴達黨團（註五）方面或「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的無產階級左派方面，都可以看出這一點，這個左派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去反對考茨基、希法亭、列迭布爾、克里斯平之流底機會主義和反對他們的毫無氣節的行爲。如果現在我們來總看一看已經完全結束的歷史時期，即從巴黎公社起到第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爲止這一個時期，那麼，馬克思主義對於無政府主義，一般地講起來，採取了十分明確的態度。歸根到底馬克思主義是對的，雖說無政府黨人正確地指斥大多數社會黨中間所盛行的對於國家的見解是機會主義的，但是，第一，這種機會主義乃是由于曲解或甚至故意隱匿馬克思對於國家的見解（我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已經指出，恩格斯有一封信，異常明顯，嚴厲而直截地揭破了社會民主黨內流行的國家觀之機會主義，可是這封信被伯爾埋藏了三十六年——由一八七五年到一九一一年）；第二，正是歐美社會黨中最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最迅速地，最廣泛地糾正了這種機會主義的謬見，承認了蘇維埃政權，承認牠優於資產階級的國會民主制。

布爾塞維主義與自己黨內的「左」傾作鬥爭，有兩次是特別廣泛的：第一次是在一九〇八年，關

*請看俄文版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三六五至四五五頁——編輯部

請看一九三二年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印行的列寧選集第十二卷第九頁至一四六頁——譯者

於是否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是否參加受最反動法律限制的公開工人會社的問題；第二次是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約）關於可否容許某種『妥協』的問題。

在一九〇八年，『左派』布爾塞維克，由於固執成見，不願瞭解有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之必要而被開除了黨籍。那時『左派』——他們中間有許多是出色的革命家，後來又成了（並且現在也是）共產黨底忠實黨員——所特別援引的論據，便是一九〇五年的抵制國會的成功的經驗。當一九〇五年八月俄皇宣布召集諮議式的『國會』時，布爾塞維克底立場，與一切反政府黨及孟塞維克派相反，會宣布抵制國會，而一九〇五年的十月革命也的確把國會掃除了。那次抵制之所以正確，並非一般地不參加反動國會是對的，而是因為正確估計了那時客觀的形勢，在當時那種形勢之下羣衆罷工將急轉為政治罷工，進而為革命罷工，再進而為武裝起義。此外，那時的鬥爭是為着下列的問題：第一次的人民代表機關的召集，還是聽俄皇去辦理呢？還是要設法從舊政府手中奪過來呢？但以後既沒有把握而且不能有把握來斷定是否有同樣的客觀形勢存在，不能斷定這種形勢底發展是『按照相同的方向和採取同樣的速度，那末，抵制國會的策略便不復是正確的了。』

一九〇五年布爾塞維克抵制『國會』，使革命無產階級增加了一個很有價值的經驗，這次抵制指明，在公開的與秘密的，國會內的與國會外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之下，善於拋却國會內的鬥爭，有時是有益處的，甚至於是必要的。但是把這種經驗盲目地，機械地，輕率地搬到別種條件和別種情況中去，

這是極大的錯誤。一九〇六年布爾塞維克黨抵制國會，已經是一個錯誤，雖然這個錯誤是不大的，容易改正的。*至於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以及以後幾年的抵制，却是極嚴重而很難糾正的錯誤，因為當時一方面既不能期待革命浪潮很快的高漲，更無急轉為武裝起義的希望，另一方面，正在維新的資產階級帝制之整個歷史環境，使公開與秘密工作有互相配合之必要。現在試一回顧已經結束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與以後各時期之聯絡，已完全表現出來），就特別明顯，假使布爾塞維克當時不在最激烈的鬥爭中，堅持一定要把公開鬥爭與秘密鬥爭配合起來，並堅持一定要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參加受反動法律所限制的各種組織（如保險儲金會等），那麼他們在一九〇八到一九一四年間，就決不能保持（自然更說不到鞏固、發展和加強）無產階級革命黨底中堅幹部。

一九一八年不會弄到分裂，那時『左派』共產黨人只在黨內形成了一個特殊團體或『小組』，而且為時不久。就在一九一八年內「左派共產主義」最出色的代表，如拉狄克、布哈林等同志，公開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他們曾以為布列斯特和約，是原則上不可容許的，對革命無產階級政黨有害的，與帝國主義者的妥協。這的確是與帝國主義者的妥協，但在當時的情形之下，正是這種妥協是必要的。

*凡論及個人者——稍加修改——亦可適用於政治和政黨。聰明的人並不是不犯錯誤的。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而且是不會有的。聰明的人所犯的錯誤是不很重大的，同時他能夠迅速地敏捷地

糾正這種錯誤。

現在當我聽到人們，例如「社會革命黨人」攻擊我們簽定布列斯特和約所採取的策略的時候，或者當蘭斯白雷同志和我談話，講到「我們英國職工會底領袖們說，如果布爾塞維克可以和別人妥協，那他們也可以和別人妥協」這一段話的時候，我總是首先使用一個簡明「通俗的」比喻來回答：假如你底汽車被武裝強盜攔住了。你交出了你底錢，護照，手槍，汽車，你因此才得幸免。這當然是個妥協。「Dout des」(「我給」你錢，手槍，汽車，「以便你給」我一個機會，使我可以安全脫身)。但是很難找一個頭腦健全的人，會說這種妥協是「原則上不容許的」或者說，這個擅行妥協的人是同強盜打夥(雖然強盜坐上汽車之後，可以利用汽車和手槍，去搶劫別人)。我們和德國帝國主義強盜的妥協，正和這樣的妥協類似。

但是俄國的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德國的謝德曼派輩(考茨基派也與他們大同小異)，奧國的鮑威爾與阿德里爾(更不用說連翹拉黑這一班先生們)，法國的列詩迭里和龍格之流，英國的費邊派，「獨立黨」人，「勞動派」，「工黨黨人」(註六)等，他們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間，同他們本國的資產階級，而且有時同「協約國的」資產階級強盜們妥協起來，以反對本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所有這些先生們底這種行動，才是同強盜打夥。

結論是明白的：「原則上」反對妥協，不問妥協的性質如何而一般反對任何妥協，這完全是孩稚氣，我們甚至難於同牠認真。一個政治家，如果願意為革命的無產階級謀利益，就要善於具體識別那種妥

協是不能容許的，是表現機會主義與叛賣行爲的，因此便要用全力去批評，要最無情地加以揭破，並毫不調和地向這些具體的妥協宣戰，不許那班富於經驗的，『務小失大的』社會黨人以及國會議員的教徒發出『一般可以妥協』的議論來脫身卸責。英國職工會『領袖』以及費邊社和『獨立』工黨底先生們，正是用這個方法來卸脫他們叛賣行爲和實行這種妥協的責任，而他們底妥協的，確是最惡劣的機會主義與叛賣行爲。

有各種不同的妥協。應當善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妥協底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怎樣把兩種人分別開來，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強盜，以便減少強盜的損害，以便後來易於拘捕和鎗斃強盜，另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爲的是要入夥分贓。在政治上，這一點決不時常都像穢稚氣的簡單的例子中那樣容易分析。如果有人異想天開，要替工人想出一個包醫百病的藥方，或者說在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治上，不會有任何困難和複雜情形，他便祇是一個騙子。

爲避免誤解起見，我要簡單地敘述幾個基本點，作爲分析具體妥協的參考。

簽定布列斯特和約而與德帝國主義者妥協的政黨，自一九一四年來，已在事實上造就了牠的國際主義。牠不怕在兩夥帝國主義強盜戰爭中提倡俄皇帝制底失敗，牠不怕指斥『保護祖國』的主張。這個黨底國會議員，不去謀資產階級政府裏的總長高位，而到西比利亞去充軍。革命繼起，打倒了俄皇帝制，建設了民主共和國，這就使這個政黨受到新的極大的考驗：牠絲毫不和『自己的』帝國主義者

作任何妥協，而準備了把牠們推倒，並且已經把他們推倒了。這個政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便把地主與資本家底財產，盡行沒收無遺。這個政黨既公佈和撕破了帝國主義者的密約，又向一切民族建議和平，及至英法帝國主義者不接受和議，而布爾塞維克已經竭盡心力去促進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以後，不得已才屈服於布列斯特強盜底暴力之下。這樣的黨，在這樣環境內，締結了這樣的妥協。這種妥協之完全正確，在一般人看來，已經日益明白和顯著了。

俄國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正如一九一四到一九二〇年間全世界上第二國際底全體領袖們一樣）他們一開始就實行叛賣，他們直接或間接主張『保護祖國』即主張保護本國的掠奪的資產階級。他們繼續叛賣，而與本國的資產階級聯合，與本國的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本國的革命無產階級。他們先勾結克倫斯基與立憲民主黨，後來又勾結高爾察克與列尼金，正如他們的國外同道勾結各該國資產階級一樣，都是投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為敵。他們和帝國主義強盜妥協，自始至終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與帝國主義強盜合夥。

第五章 德國共產黨底「左派」領袖政黨階級羣

衆之間的關係

我們現在要說到的德國共產黨人，自己已不稱爲『左派』而稱爲——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原則上的反對派」。但是他們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底一切症候，這從下面的說明便可以看得清楚。

有一本表現這個反對派觀點的小冊子，叫做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團）之分裂，是由『馬依諾河畔弗郎克福爾特地方的小組』出版的；（註七）這本小冊子把反對派意見底實質，表現得最爲顯著，真切，明瞭而簡括。只要引證幾段，便可使讀者認識這種實質：

『共產黨是最堅決的階級鬥爭底政黨……』

『……就政治方面看來，這個過渡時期（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乃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現在發生一個問題：誰應當是專政的執行者：共產黨呢，還是無產階級呢？在原則上應努力實現共產黨底專政呢，還是無產階級底專政呢？（着重點均按照原文）』

往下著者責難德國共產黨「中央」說「中央」企圖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聯盟，說「中央」之所以提出「原則上承認一切政治鬥爭手段的（包括參加國會）問題」這只是一種掩飾，而真正的主要的圖謀却是要與獨立黨聯盟。

這本小冊子接着說道：

「反對派已另選別路，牠以爲共產黨統治與黨專政的問題，只是一個策略問題。無論如何，共產黨的統治，總是政黨各種統治的最後形式。原則上應致力於無產階級專政。所以黨的一切設施，黨底組織，黨底鬥爭形式，黨底戰略和策略，都須適合於這一點。因此，凡是與其他政黨妥協，凡是回頭再去採用歷史上和政治上已經過時的國會主義，這鬥爭形式，凡是實行迂迴和通融的政策，都應予以十分堅決的排斥。」

「無產階級所特有的革命鬥爭方法，應特別注意，爲的使最廣大的無產階級羣衆，在共產黨指導之下進行革命鬥爭起見，務須建立有最大的基礎，有最廣大範圍的新組織形式。一切革命份子所匯集的這個地點，便是以工廠中的組織爲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工人聯合會。凡聽從『退出職工會』口號的工人，都應當集合於此。在這裏把鬥爭的無產階級，編成廣大的戰鬥隊伍。只要承認階級鬥爭，承認蘇維埃制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便可以加入這種隊伍。至於以後鬥爭的羣衆之政治教育，鬥爭中的政治指導，則是站在工人聯合會以外的共產黨底任務」……

「……因此，現在有兩個共產黨彼此互相對立：一個是領袖底黨，這個黨企圖從上面來組織革命鬥爭，並支配這個鬥爭，牠採取妥協政策，主張國會主義，以便造成一種局面，使得他們可以參加實行專政的聯合政府。另一個是羣衆底黨，這個黨等待革命鬥爭從下面高漲起來，牠爲了這種鬥爭，只知道和採用一種明確的走向目的去的方法，排斥任何國會主義的和機會主義的方法；這個唯一的方法，便是毫無顧忌的推翻資產階級，以便建立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去實現社會主義……」。

「……那裏是領袖底專政——這裏是羣衆底專政這就是我們的口號。」
這就是德國共產黨內反對派觀點底最主要的立場。

每個布爾塞維克，只要曾經自覺地參加過或親近地觀察過一九〇三年以來布爾塞維主義的發展史，他讀到這一番談論之後，便立刻要說：『這是何等陳腐的，早已聽見過的廢話，這是何等『左』的幼稚氣！』

但是我們應進一步來考察這種論調。

「黨底專政還是階級專政？領袖底專政（領袖底黨）還是羣衆底專政（羣衆底黨）」僅僅這一種發問，就已經證明他們思想錯亂到了什麼地步。這些人白費心力，想入非非，結果弄巧反拙，誰也曉得，羣衆劃分爲階級；談論羣衆和階級時，是可以把這兩個名詞彼此對立起來的，不過一個只是指一般

極大多數的人民，並不區分他們在生產中的社會地位；另一個却是指在生產中佔有特殊社會地位的類別；在大多數地方，至少在現代文明的國家裏，階級通常由政黨來領導；按一般通例，政黨又是由最有聲望，最有威信，最有經驗，被選到極負責任地位的，稱爲領袖的人們所形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團來領導。這都是初步常識。這都是簡單明瞭的事情。爲什麼偏要來這一套槍花偏要這樣來標新立異？一方面，大概因爲黨底公開狀況和祕密狀況之迅速遞變，破壞了領袖，政黨以及階級中間的通常的關係，於是人們陷入困難狀況而弄得莫名其妙。在德國及歐洲其他的國家，人們太習慣於公開生活，習慣於按期由各政黨的代表大會遵照正確手續自由在地選舉『領袖』，習慣於用簡便的辦法，如國會選舉，羣衆大會，報章雜誌，職工會和其他團體的情緒等等，來檢閱各政黨影響下的羣衆究竟屬於什麼階級。革命風暴緊張起來，國內戰爭日益進展，因此不得不棄去通常的工作形式，而急趨於公開工作與祕密工作之互相更替及互相配合，不得不採用『不方便的』『非民主的』方法，以便提出或推出或保留『一批領袖』——這個時候，人們就張皇失措，於是想出一種超自然的荒謬絕倫的理論。大概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註八）自己弄得莫明其妙，張皇失措，助長了這種荒謬的臆想，因爲他們不幸生長於小國，在那裏他們的地位特別優越，公開狀況特別穩固，他們享慣了這種條件與傳統，從來不曾見過公開狀況與祕密狀況之互相更替。

另一方面，顯然只是摭拾一些『領袖』、『羣衆』這類現代『時髦』名詞，不加思索，隨便亂用。這

些人時常聽到了並且呆板學會了怎樣攻擊『領袖』怎樣把領袖和『羣衆』對立起來；但是他們却不會想一想彼此間的關係，不會認清實情。

在帝國主義大戰末年以及大戰之後，在一切國家裏，『領袖』和『羣衆』之間背道而馳的現象特別表現顯著。這個現象底根本原因，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九二年間已用英國的例子反復說明過。英國底壟斷地位使『羣衆』中產生一部分半市儈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工人貴族』。工人貴族的領袖，總是投奔資產階級方面去，爲資產階級——直接地或間接地——所蒙養。馬克思之所以被這班混蛋所仇恨，就是因爲他公開指斥他們爲叛徒。最新的（二十世紀）帝國主義，替有些先進國家創造了壟斷的特權的地位，在這個基礎上第二國際裏到處都出現出賣階級的領袖，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他們祇顧自己本行底利益，自己工人貴族階層底利益。機會主義的政黨，因此就脫離了『羣衆』，就是脫離了最大的勞動者，脫離了他們中間的大多數，脫離了工資最低工人。如果不同這個禍害作戰，不揭破，不踏踏，驅逐這班機會主義的出賣階級的領袖，革命無產階級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而第三國際就進行了這種鬥爭的政策。

可是在這個問題上講來講去，講到一般地要把羣衆專政和領袖專政對立起來，這却是可笑的荒謬與愚蠢。尤其可笑的，就是在『打倒領袖』這個口號的掩飾之下，事實上却推出一些專講超自然的怪話之新領袖，來代替對於簡單事物具有凡人見解的舊領袖。這些新領袖在德國便是勞芬別爾格、沃

里夫赫木、霍爾赫爾、什列迭爾、文迭爾、額列爾。*額列爾企圖「加深」問題，他宣稱政黨根本上不需要，宣佈政黨具有『資產階級性』這真是荒謬已極，我們只有對他搖頭。這真是：如果固執錯誤，用各種深刻理由來辯護錯誤，將錯誤『貫徹到底』，那末，小錯誤總是可以弄成極大的錯誤。

否認黨，否認黨的紀律——這就是反對派底主張所得到的結果。這就等於完全解除無產階級底武裝，以幫助資產階級。這就等於小資產階級的散漫、動搖，不能堅忍，不能團結，不能整齊動作等等劣根性，這種劣根性如果任其橫行，必使任何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一敗塗地。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上看來，否

*共產主義工人報（註九）（漢堡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出版的第三十二期上額列爾著：論解散政黨一文）上說：

「工人階級不先消滅資產階級的民主，便不能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但不先破壞政黨，就必不能消滅資產階級的民主。」

拉丁各國工團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中間頭腦最昏亂的人物，可以「心滿意足」了，因為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莊重的德國人（額列爾及霍爾赫爾）在上述報紙所發表的文章中，特別莊重地證明：他們認為自己是莊重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却特別可笑地說出荒謬絕倫的說話，顯示他們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底初步，也發表這種完全不合適的議論。可見僅僅承認馬克思主義，還不能免除錯誤，俄國人特別明白這一點，因為馬克思主義在我們俄國常常是一種「時髦貨色」。

認黨，這就是說，從資本主義破產底前夜，（在德國）一躍而至共產主義底最高階段（不是最低階段，也不是中段）。我們在俄國（推倒資產階級以後的第三年）走着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最低階段）去的初步。階級仍舊存在，而且無論在什麼地方，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階級還會多年存在。這個時期在英國或許可以縮短，因為那裏沒有農民（但仍有小業主）消滅階級，這不僅是趕走地主資本家便算完事——這個我們比較容易地做到了——，這還要消滅小的商品生產者，但這些小商品生產者，是不能驅逐和鎮壓的，而要和他們共居；只有經過很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才可以（而且必須）改造，感化他們，他們用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從各方面來包圍無產階級，他們用這種勢力浸漬無產階級，誘惑無產階級，不斷地使無產階級內部重新發生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散漫，個人主義，由熱心變為消沉等等陋習。所以在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必須有最嚴格的集權與紀律，以便抵制這種惡影響，以便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實現無產階級底組織作用（這是無產階級主要的作⊙用）。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種反對舊社會勢力和傳統的持久的鬥爭，流血的及不流血的，強大的及和平的，軍事的及經濟的，教育的及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乃是一種最可怕的勢力。如果沒有一個鐵一樣的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沒有一個為本階級內全體純潔份子所信任的黨，沒有一個善於考察羣衆情緒和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就不能順利進行這個鬥爭。戰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較之『戰勝』千百萬小業主，要容易千百倍。小業主從事於日常的，瑣碎的，不可捉摸的，起腐化作用的活

動，由於這種活動所產生的結果，正是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東西，正是使資產階級復辟的原因。要是有人減弱——即使減弱一點——無產階級政黨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期間），他就事實上幫助着資產階級而反對無產階級。

除了領袖——政黨——階級——羣衆的問題之外，還有『反動』工會的問題，也須同時提出。但首先讓我根據俄國的經驗，再講到幾點，來結束本章。對於『領袖專政』的攻擊，在我們黨內過去是常常有的：我記得第一次是在一八九五年就有過這樣的攻擊，當時黨還沒有正式成立，可是彼得堡的中央團體已開始形成，牠應當領導各區的團體。在我們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二〇年四月）有過一個小小的反對派，也聲言反對『領袖專政』、『寡頭政治』等等。因此德國的「共產黨左派」的『幼稚病』並沒有什麼稀奇的，新鮮的，可怕的地方。這個病症並沒有危險，病後機體甚至更加強健。另一方面，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之迅速交替（由於這種交替的關係必須特別「隱藏起來」的，特別保守秘密的，正是總司令部，正是領袖）有曾使我們黨內發生十分危險的現象。最壞的，是在一九一二年，奸細馬林諾夫斯基混進布爾塞維克黨底中央委員會。他使百十個最好的，最忠實的同志被捕，使他們做苦工，使他們中間許多人早死。他之所以還沒有形成大害，都是由於我們的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配合恰當。馬林諾夫斯基做中央委員和國會議員，為希圖得到我們底信任起見，不得不幫助我們辦公開的日報，這些日報雖在俄皇帝制下面也能够和孟塞維克機會主義奮鬥，能够採用相當的掩蔽方

式去宣傳布爾塞維主義的原理。馬林諾夫斯基一隻手送百十個優秀的布爾塞維克幹部去受死，去做苦工，而另外一隻手却不得不幫助我們經過公開的報章和雜誌。訓練出成千成萬的布爾塞維克。有些德國的同志（同樣是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意大利的同志）應當學會在反動工會內進行革命工作，這些同志對於上述事實，不妨好好加以思索。

在許多國家裏，就中也在最先進的國家裏，資產階級無疑地正在派遣而且將來也要派遣奸細到共產黨內部去。防範這種危險的手段之一，就是善於配合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註一〇）

馬林諾夫斯基在大戰時被俘於德國。他在布爾塞維克黨當政時回俄，他立刻被捕交法庭，我們的工人把他槍決了。孟塞維克特別厲害地攻擊我們這個錯誤，攻擊我們讓一個奸細混進中央委員。但是在克倫斯基政府的時候，我們要求逮捕國會議長洛強科並將他提交法庭審判，因為他在戰前已曉得馬林諾夫斯基底奸細行動，而不通知國會中的勞動派和工人，當時與克倫斯基一起參加政府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不贊助我們的要求，因此洛強科逍遙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鄧尼金去了。

第六章 革命家應否在反動工會內進行工作呢

德國『左派』對此問題已決定無條件地作否定的回答。他們以為用幾篇宣言和怒氣沖沖的驚嘆詞句把『反動的』『反革命的』職工會大罵一頓（在這件事情上，特別『認真』和特別魯莽的，要推霍爾聶爾），便足以『證明』革命家，共產黨人，不僅不需要，而且不容許在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妥協的，連金派的，反革命的職工會內進行工作。

德國『左派』無論怎樣相信這種策略是革命的，但是實在牠是根本錯誤的。其中除空話外，別無內容。

為說明這點起見，我根據本文的計劃，先從我們俄國底經驗說起——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爾塞維主義歷史上和現在策略上所可普遍採用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必須普遍實行的要點，應用於西歐。

領袖——政黨——階級——羣衆之間的相互關係，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無產階級政黨對職工會的關係，現時在蘇聯的具體情形如下。組織在蘇維埃裏的無產階級實現專政，無產階級，又由布爾塞維

克底共產黨領導，據最近黨的代表大會（一九二〇年四月）底統計共有黨員六十一萬一千元。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後，黨員人數變動很大；以前，甚至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黨員人數要少得多。（註一）我們顧慮黨過於擴大，因為一般希圖升官發財，趨炎附勢，鑽營祿位之徒，必乘機鑽進政府黨內，而這些人本來只是值得槍斃的。當尤迭尼赤只隔彼得堡幾俄里，鄧尼金已抵沃略爾（距莫斯科僅僅三百五十俄里）的時候，當蘇維埃共和國危在旦夕的時候，當冒險投機，趨炎附勢，鑽營祿位之徒，以及一般不堅定的份子無論如何不能指望加入共產黨作為陞官發財的捷徑（他們只能指望因此受絞刑）的時候，在這個時候（一九一九年冬）我們最後一次大開黨門——但也僅僅為工人和農民而大開黨門。黨每年召集黨代表大會（最近一次每個代表，代表一千黨員），由大會選舉十九人組織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同時還有更小的機關常駐莫斯科來進行日常工作，這種機關就叫做「組織局」與「政治局」這兩個機關統由中央全體會議選出，各有五個委員。這樣一來，就成為真正的『寡頭政治』。在我們的共和國內，未經黨中央的指示，任何國家機關，都不能解決任何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

黨在自己的工作中，直接依靠職工會。據最近這次代表大會（舉行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底統計，工會會員在四百萬人以上，職工會形式上是非黨的組織。事實上絕大多數工會底一切指導機關，首先自然是全俄總工會（全俄職工會中央委員會），都由共產黨人組成，實行黨底一切指令。因此，我們就

有一般和整個講起來形式上是非共產黨的，靈活的，比較廣大的，很強有力的，無產階級的機關，黨經過牠得與階級和羣衆密切聯繫起來，經過牠同時在黨的領導之下，實現階級底專政。如果不與職工會結成極親密的聯繫，如果沒有牠們底熱烈幫助，如果沒有牠們不僅在經濟建設上，而且在軍事建設上最不顧犧牲的工作，那麼，我們不要說兩年半，便是兩月半，也不能統治我們的國家和實現專政。自然，這種最親密的聯繫，在實際上是很複雜的和很不同的工作：如進行宣傳，鼓動，及時地經常地不僅與職工會領導者，而且與一般有影響的職工會工作者會議，與孟塞維克作堅決的鬥爭，因為孟塞維克直到現在還有些信徒（雖然很不多），他們教唆信徒實行各種反革命的勾當，從思想上擁護（資產階級的）民主，宣傳職工會『獨立』（離開無產階級政權而獨立）起，一直到對無產階級紀律怠工等等爲止。

經過職工會而與『羣衆』聯繫，我們認爲還不够。在革命過程中，實際生活給我們造成了一種制度，就是非黨的工農代表會議，同時我們用全力去贊助，發展和擴大這種制度，以便考察羣衆底情緒，接近他們，解答他們的問題，從他們中間，提拔優秀的工作人材來擔任國家的職務等等。最近將人民國家監督委員會改組爲「工農監察院」的訓令中，會規定這類非黨的代表會議有權選舉國家監督人員去担任各種檢查事項等等。

此外，黨底全部工作，自然是經過蘇維埃來進行，蘇維埃包括勞動羣衆，而不問其職業。縣蘇維埃代表大會這種民主制度，就在最好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也不會夢見過，經過這種代表大會（對於

這種大會，黨是極力注意考察的，)並經過由黨特別派往鄉村去担任各項職務的覺悟工人，得以實現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作用，實現城市無產階級底專政，實行和資本主義的，剝削的，投機的富農作有統系的鬥爭等等。

『從上至下』看來，從實現專政的實際上看來，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總結，就是如此。我們相信讀者一定會懂得：俄國布爾塞維克既熟悉這種結構，又親眼看見這種結構怎樣在二十五年内從秘密的小組發展起來，他們聽了什麼『自上』或是『自下』領袖專政或是羣衆專政種種議論，自然要把這種議論當做幼稚可笑的爭論，好像在那裏爭論左腳對人更有益處或是右手對人更有益處一樣。

同樣，德國左派所發表的鄭重的，非常飽學的，非常革命的論調，在我們看起來，也是同樣幼稚可笑的笑話，他們說共產黨人不能並且不應在反動工會中工作，他們說可以拒絕那項工作，他們說必須退出職工會，必須另外創設一個嶄新的，清一色的，由很可愛的（大概大部分是很年青的）共產黨人臆想出來的「工人聯合會」等等。

資本主義必然遺留給社會主義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間舊有的，千百年內形成的，職業上和手藝上的分立，另一方面是職工會，這種職工會只是很緩慢地，經過許多年月才可以而且將更發展起來成爲規模較大，行會氣味較少的生產工會（包含整批生產，而不僅包含同行，同一手藝和同一職業，）然後經過這些生產工會，可以去消滅人與人中間的分工，可以去教育，訓練和培養各方面都有智識的，各方

面都有訓練的人，會做一切事情的人。共產主義正是向這個方向走的，牠必須向這個方向走，並且定能走到，不過須要經過長久的年月。目前就企圖具體設想那完全發展的，完全鞏固和形成的，完全開展和成熟的共產主義這一種將來的結果，這無異於教四歲小孩學高等數學。

我們能够（而且應該）不用玄想的，不用由我們專門造就的人材來着手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用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人材來建設社會主義。這當然是很『困難的』，不過除此以外，任何其他的處置辦法，都是開玩笑的，以至於是不值得提起的。

當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的時候，職工會乃是工人階級底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這是工人們由散漫無力過渡到初步的階級團結。當無產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無產階級底革命黨（要是這種政黨不學會把領袖與階級，領袖與羣衆聯合爲一，成爲一個彼此間沒有隔膜的東西，牠便不配這個名稱）開始發育的時候，職工會就必然暴露一些反動的色彩，暴露一些行會的狹隘的習氣，暴露多少不問政治的傾向，多少頑固等等。但是除了經過職工會，除了經過職工會與工人階級政黨底共同影響之外，無產階級在世界上，無論在什麼地方，從來沒有過別的發展道路，而且也不能有別的發展道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是無產階級底一大進步，黨在這個時候不得不更加努力，用新的方法和新的精神——不僅用舊的方法和舊的精神——去教育和領導職工會；但同時不要忘記職工會現在還是，並且將來在一個長久的時期內還會是一個必要的「共產主義學校」以及無產者實現其專政的預備學校，還會是工

人必要的結合，有了這種結合，纔能使全國經濟的管理逐漸轉到工人階級（而非個別職業）底手上，然後再轉到全體勞動者手上。

上述職工會底一些『反動色彩』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是免不掉的。誰不懂得這點，他便完全不懂得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根本條件。害怕這些『反動色彩』想避開牠，跳開牠，這是愚蠢不過的事情，因為這就是害怕無產階級先鋒隊應起的那種作用，就是訓練，啓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和羣衆並吸收他們來參加新生活的的作用。另一方面，倘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擱置到社會上再沒有一個抱職業狹隘心理的工人，再沒有一個抱行會和工會成見的工人的時候，那末，這更是大錯而特錯。政治家的藝術（而且共產黨人對於自己任務之正確了解）也就在於正確估計一種條件與時機，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勝利地奪取政權，使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時及奪取政權後，能夠得到工人階級及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充分廣大階層的充分贊助，使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能夠教育，訓練，吸引日益廣大的勞動羣衆，去保持，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的統治。

其次，在那些比俄國更進步的國家裏，職工會的一些反動色彩無疑義地，曾經表現而且會表現得比俄國厲害得多。我們這裏，孟塞維克從前在職工會裏之所以有依據（現在他們在很少數的工會內也還有一部分依據）正因為行會的狹隘心理，職業的自私自義和機會主義。西歐的孟塞維克在職工會內更是『根深蒂固』，那裏會形成職業主義的，狹隘的，自利的，不顧大局的，貪婪的，市儈式的，具有

帝國主義情緒的，爲帝國主義所收買的，爲帝國主義所敗壞的『工人貴族』這個階層比俄國過去所有的要強大得多。這是無容爭論的。在西歐同貢彼爾斯、如沃、亨得遜、美爾肯、連金之徒作鬥爭，比較我們這裏同孟塞維克作鬥爭要困難得多，我們的孟塞維克，在社會地位和政治觀點上講起來，與他們完全是一丘之貉。應該無情地進行這種鬥爭，定要像我們過去那樣把這種鬥爭貫徹到底，直到把機會主義的和社會沙文主義的一切不可救藥的領袖們的劣跡完全揭破並把他們趕出工會爲止。如果這場鬥爭，沒有進行到一定的程度，那就不能奪取政權（而且不應該試圖奪取政權）——而這種『一定的程度』在不同的國家裏和不同的條件下，是不一樣的；正確地計算這種程度，只有各個國家裏深謀遠慮，經驗豐富，熟悉情形的政治領導者，才能勝任。（例如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曆十月二十五日）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以後幾天所舉行的立憲會議選舉，可以作爲俄國這種鬥爭勝負的測量器。在這次選舉中，孟塞維克一敗塗地，他們僅獲得七十萬票——加上南高加索一帶的票數，共計有一百四十萬票；贊成布爾塞維克的却有九百萬票。請參看我的論文『立憲會議與無產階級專政』，見共產國際雜誌第七、八兩期）*

但是，與『工人貴族』作鬥爭，我們是用工人羣衆的名義進行的，並且爲的是要吸收工人羣衆到我們方面來；我們與機會主義的和社會沙文主義的領袖作鬥爭，爲的是要吸引工人階級到我們方面

* 請看俄文版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三一至六四九頁。——編輯部

來。如果忘記這個最明顯最初步的真理，那真是愚蠢。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正是做這種愚蠢的事。他們由於工會上層份子的反動和反革命，便主張退出工會，拒絕到工會中去工作。要建立新的應想的工人組織！這真是不可寬恕的愚蠢，這無異共產黨人竭力向資產階級効勞。因為我們的孟塞維克與職工會內一切機會主義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考茨基派的領袖一樣，統統是「資產階級派遺在工人運動中的走狗」（我們總是用這句話來反對孟塞維克），或者是「資產階級底工人僱員」（Labor henchme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這是美國丹尼耳、德、立昂派很好的，極確切的說法。）不在反動工會內工作，這是把不十分開明的或落後的工人羣衆，委棄在反動領袖底影響之下，委棄於資產階級底走狗，委棄於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請參看恩格斯一八五二年給馬克思的論英國工人的信）（註一二）底影響之下。

正是主張共產黨人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荒謬「理論」最清楚地說明這些「左派」共產黨人對於影響「羣衆」的問題採取了怎樣輕浮的態度，說明他們怎樣濫用「羣衆」這一個名詞。要想能够幫助「羣衆」並獲得「羣衆」底同情和贊助，便應該不怕困難，不怕「領袖們」（這些「領袖們」由於他們是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所以大多數是直接或間接與資產階級和警察局勾結的）底苛求，陷害，侮辱和追究，凡是有羣衆的地方，便一定要進去工作。應當善於忍受任何犧牲，善於克服最大的障礙，以便有系統地，不屈不撓地，堅強不拔地，忍耐地在一切機關、會社、團體內進行宣傳和鼓

動的工作，不管這些組織如何反動，只要那裏有無產階級羣衆或半無產階級羣衆，我們就應該在裏面進行工作。而職工會與工人協作社，正是（後者至少有時是）羣衆薈萃的組織。依瑞士「Folkets Dagblad politiken」*（註131）（一九二〇年*三月十日）底統計，英國職工會會員，從一九一七年末到一九一八年末，由五百五十萬人增至六百六十萬人，即增加百分之十九。至一九一九年末，會員人數已達七百五十萬人。我手頭沒有德法兩國這一類的材料，但一般確鑿的事實，證明這兩國的工會會員都大量增加。

這些事實最明白不過地說明一件事情，而且也爲其他千百個例證所證實了的事情，這就是正在無產階級羣衆中，在「下層」羣衆中，在落後羣衆中，覺悟程度和組織要求，日益增長。英法德有成百萬的工人初次離棄一般散沙的現象而採取初步的，低級的，最簡單的，最易實行的（對一般還受資產階級民主的成見所熏染的人們說）組織形式，即加入職工會，而革命的，但是沒有理智的左派共產黨人却袖手旁觀，空喊「羣衆」「羣衆」——拒絕在職工會內工作！以職工會「反動」爲藉口而拒絕這種工作！想出一種新的，清白的，沒有沾染資產階級民主成見的，沒有沾染行會主義和狹隘職業主義這種惡習的「工人聯合會」，說什麼這種聯合會將成爲（將成爲）廣大的工會，只要（只要）「承認

* 人民政治日刊——編輯部

** 在原稿及第一版上都誤印爲一九一九年——編輯部

蘇維埃制度與專政』就有入會資格（參看前面引文）

比「左派」革命家更沒有理智，比他們所做的危害革命更甚的東西，再想像不出來了！如果我們現時在俄國，在戰勝俄國資產階級以及協約國資產階級而得到空前的勝利已經過去了兩年半之後，就提出『承認專政』作為加入工會的條件，那我們就做了蠢事，破壞了自己對羣衆的影響，幫助了孟塞維克。因為共產黨人底全部任務，就是善於說服落後羣衆，善於在落後羣衆中間進行工作，而不是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來把自己與羣衆隔開。

無疑的，賈彼爾斯、亨得遜、如沃、連金那些先生們，很感謝這些『左的』革命家，因為他們像德國的「有原則的反對派」（上帝保佑我們避免這種『原則』吧）一樣，或像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會」（註一四）裏一些革命者一樣，高唱退出反動的工會並拒絕工會中的工作。無疑的，機會主義底「領袖」先生們將採用資產階級的任何外交手腕，依靠資產階級政府、牧師、警察、法庭底援助，以便阻擋共產黨人加入職工會，以便用各種方法把他們擠出工會，使他們在工會中的工作做得不痛快，侮辱、攻擊和取締他們。我們應當善於對付這一切，不怕任何犧牲，甚至（有必要時）不惜採取任何機變、機巧、秘密手段、默滅態度、隱瞞真情，以期打入工會，留在工會裏面，無論如何要在裏面進行共產黨的工作。在俄皇政府時代，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我們沒有錢毫『公開的可能』，但當偵探局長祖巴托夫召集反動的工人大會和組織反動的工人團體，企圖捕獲革命黨人並與他們作鬥爭時，我們確派遣了我們的

黨員到這種大會和團體中去（我自己還記得其中有巴布什金同志。他是彼得堡一個出色的工人。在一九〇六年被俄皇將軍槍斃了）他們在那裏聯絡羣衆，巧妙地進行鼓動，並使工人脫離了祖巴托夫派底影響。* * 在西歐，因公開的，立憲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成見，特別根深蒂固，上述工作，當然較難進行。但是這種工作，是能夠而且必須有系統進行的。

據我個人的意見，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一般地應當直接責斥，並應當向下屆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提議責斥不參加反動工會的政策（應當詳細說明這種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舉動是不合理的，牠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事業是有害的），同時也應當指斥荷蘭共產黨一些黨員底行動路線，因為他們——不管是直接的或間接的，明目的或暗中的，整個的或部分的——總是幫助了這種不正確的政策。第三國際應當與第二國際底策略斷絕關係，對於難解決的問題，不應該敷衍，不應該抹煞，而要直接提出來。我們已經向「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直接告訴了全部實情，我們向「左派」共產黨人也應當直接告訴全部實情。

* 請看俄文版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三九六至三九九頁上列寧所做的論文，題名伊凡、瓦西里葉維赤、巴布什金。——編輯部

* * 賈彼爾斯、亨得遜、如沃、連金之徒與祖巴托夫毫無二致，不同的地方，僅在他們穿着歐的服裝，表現歐洲的風彩，當他們實行自己的無恥的政策時，採用文明，細巧，民主的粉飾辦法而已。

第七章 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呢

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再草率不過——而且再輕浮不過地——對於這個問題作否定的答覆。他們有什麼論據呢？在上面的引證中我們已經看見過：

「……凡是回頭再去採用歷史上和政治上已經過時的國會主義這種鬥爭形式……我們都應予以十分堅決的排斥。」

這真是張大其辭，到了可笑的地步，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回頭再去採用」國會主義，難道德國竟已成了蘇維埃共和國嗎？似乎還沒有吧！怎麼說得上「回頭再去採用」呢？難道這不是講空話麼？

國會主義是「歷史上過時的」在宣傳上講起來，這是對的。但是誰都曉得，從宣傳到實際取消國會主義，還相隔很遠。在幾十年前，已很可理直氣壯地宣佈資本主義是「歷史上過時的」，可是這並不是說，因此就不需要在資本主義基礎上作很長期和很持久的鬥爭。就全世界歷史上講來，國會主義已經「歷史上過時的」，即是說資產階級國會主義底時代已告終結，無產階級專政底時代已經開始。

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全世界歷史的尺度，是以數十年來計算的。遲早十年或二十年，在全世界歷史上的尺度上看起來，是無足重輕的，從全世界歷史上看起來，這不過是滄海一粟。可是正因爲如此，所以講到實際政策問題的時候，援引全世界歷史尺度，這却是極大的理論錯誤。

國會主義已經『在政治上過時』了麼？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如果這是對的，那麼『左派』底立場是很穩固的。可是這一點應該用極認真的分析去證明，但是『左派』連試行分析的門徑都摸不着。在共產國際駐阿姆斯特丹臨時辦事處公報第一期上（“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February * 1920）（註一五）載有『關於國會主義的提綱』，這篇提綱顯然表現荷蘭式的左傾或左的荷蘭派底意見，他們的分析，在下面我們可以看出，也是十分不行的。

第一、大家都知道，還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德國『左派』就已認爲國會主義在『政治上過時』了，這種意見完全與盧森堡、李卜克內西這種卓絕的政治領導者底見解相反。大家都知道『左派』是錯了。只這點，就已立刻根本推翻國會主義『在政治上已經過時』的論調。『左派』應該證明，爲什麼他們當時所犯的毫無疑義的錯誤，現在已經不復成爲錯誤。他們絲毫不來加以證明，而且也不能加以證明。一個政黨對於本身的錯誤採取什麼態度，這是最重要的和最可靠的標準之一，用這種標準，就可

以看出這個政黨是否莊重，這個政黨是否在事實上執行牠對於本階級，對於勞動羣衆所負擔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揭開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細心討論糾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莊重政黨底標誌，這才是履行牠的義務，這才是牠對於階級，然後對於羣衆的教育和訓練。德國的（以及荷蘭的）『左派』不去履行這種義務，不用極端注意，細心和審慎的態度去研究自己彰明較著的錯誤，這樣就恰恰證明他們不是階級底政黨，而只是知識份子和少數犯知識界惡習的工人底小團體。

第二，在『左派』底弗蘭克福爾特地方小組所出版的小冊子上，除了上面已經詳細摘引的以外，我們還可以讀到：

「……依然跟隨着中央黨（天主教的「中央」黨）政策走的數百萬工人，是革命的，由鄉村無產者中間產生出大批反革命軍隊」（見原書第三頁）。

這幾句話顯然說得太豪爽，太誇大了。但這裏所敘述的基本事實，是確鑿的；『左派』既承認這個事實，便特別明顯地證明他們底錯誤。既然『數百萬』和『大批』無產者，不僅一般地還贊成國會主義，而且簡直是『反革命的』，怎麼還能夠說國會主義在『政治上已經過時』呢？可見在德國，國會主義在政治上還沒有過時。可見德國『左派』硬把自己的願望，自己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態度，當做客觀事實。這對於革命家是最危險的錯誤。在俄國，俄皇帝制底壓迫異常野蠻和殘暴，在這種壓迫之中，經過特別長久的時間並且在特別複雜的形式之中產生了各種派別的革命家，而且是非常忠實，熱烈，

英勇，堅強的革命家，在俄國，革命家的這類錯誤，我們特別親近觀察過，特別注意研究過，特別知道得清楚，所以別人犯了這種錯誤，我們也看得特別明白。國會議員，在德國共產黨人看起來，自然是『政治上過了時』的，可是問題正在於不要把我們所認為過時的，當作階級也認為過時，當作羣衆也認為過時。由此我們又看出『左派』不會判斷事理，不會以階級底政黨，以羣衆底政黨自處。你們決不應該把自己降低到羣衆底水平線上去，不應該降低到階級中落後階層底水平線上去。這是毫無疑義的。你們必須把逆耳的真理告訴他們。你們必須把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和國會議員的成見，叫做一種成見。但是同時你們也必須清醒地考察正是整個階級（不僅是牠的共產主義先鋒）正是全體勞動羣衆（不僅是他們的先進份子）之覺悟程度與造就程度底實在情形。

即令不是『數百萬』和『大批產業工人和農業工人』而只有人數還很多的少數產業工人跟隨着基督教神父，少數鄉村工人跟隨着地主富農，（Cossacks）那末，根據這一點，已經可以毫無疑義地做出結論，說在德國，國會議員政治上還沒有過時，說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必須參加國會議員，參加國會議員台上的鬥爭，牠參加這種選舉和鬥爭的目的，正在於教育本階級底落後階層，正在於喚醒和啓發鄉村中沒有智識的，畏縮的，愚昧的羣衆。你們一天不能解散資產階級的國會議員和別一類的其他任何反動機關，你們便一天必須在這些機關裏工作，正因為在那裏還有被神父及鄉村陋習所愚弄的工人；不然，你們就有成爲空談家的危險。

第三、『左派』共產黨人對於我們，對於布爾塞維克，說很多好話。有時禁不住要說：你們何不少恭維我們幾句，多研究多認識些布爾塞維克的策略！我們參加了俄國資產階級國會底選舉，參加了一九一七年九月到十一月的立憲會議底選舉。我們底策略是對的，這是錯的？如果是錯的，便該明白指出來，並證明我們底錯處，這是國際共產主義規定正確策略時所必須的。如果是對的，便應該從這裏做出一定的結論。自然，不能說俄國的狀況與西歐的狀況相等。但是『國會主義在政治上已經過時』這一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當專門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必須切實顧計到俄國的經驗，因為這一種話，如果不顧計到具體經驗，就很容易變成空話。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我們俄國布爾塞維克不是比西歐任何共產黨人更有權利來說國會主義在俄國政治上過時了麼？自然我們有了這種權利，因為問題不在於資產階級國會存在多久，而在於廣大勞苦羣衆，對於採用蘇維埃制度，對於解散（或允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國會的準備（思想上，政治上，實際上的準備）達到什麼程度。至於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之間，城市工人階級，兵士和農民因為種種特殊條件，已經有了歷史上罕見的準備，準備去採用蘇維埃制度，解散民主的資產階級國會，這是無可爭辯的確鑿的歷史事實。然而布爾塞維克不曾抵制立憲會議，而且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以及奪取政權以後都參加選舉。至於這次選舉曾經得到非常有價值的（而對於無產階級是極有益處的）政治成效，那末，我敢說，我在上文詳細分析俄國立憲會議選舉時結果，已經加以證明了。

由此，得出毫無爭辯的結論：我們已經證明，即令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之前幾星期，甚至在勝利之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不但無害於革命的無產階級，而且使無產階級容易向落後的羣衆證明，爲什麼此種國會必須解散，使得解散國會更加容易成功，使資產階級的國會主義更容易。『在政治上過時。』如果不管這種經驗，同時却要求隸屬於共產國際，隸屬於應當用國際的眼光來製定策略（不是狹隘的或單純民族的策略，而是國際的策略）的共產國際，這就是犯極大的錯誤，這正是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而事實上違背國際主義。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荷蘭左派」不參加國會底論據。上面說到的「荷蘭派的」提綱，其中最主要的提綱——第四條——的譯文（從英文譯出）如下：

『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已被破壞，社會處在革命狀態之中，這個時候國會方面的活動，與羣衆本身的行動相較，便漸漸失去意義。在這種情況之下，國會成爲反革命底中樞，成爲反革命的機關；而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建立蘇維埃，作爲牠的政權底武器，在這個時候，拒絕參加國會之任何活動，甚至成爲必要。』

第一句話顯然是錯的，因爲羣衆行動——例如大罷工——無論何時，都比國會活動更重要，不只在革命時候或革命的形勢中才是如此。這種沒有根據的在歷史上和政治上統統錯誤的論據，只是特別明顯地說明，作者全未顧到全部歐洲的經驗（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夜以及一八七〇年革命前

夜的經驗，德國一八七八到一八九〇年間的經驗等等）也未顧到俄國的經驗（參看上文）即證明配合公開鬥爭和秘密鬥爭之所以重要的經驗。這個問題，一般的講起來是非常重要的，專門的講起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一切文明先進的國家內，很快地就要到下列一種時候，那時，因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鬥爭日益成熟與逼近，百般破壞公開權利的共和政府（只要看美國的例子就夠了）及無產階級的政府對於共產黨人瘋狂取締等等，所以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一天比一天須把公開的鬥爭與秘密的鬥爭配合起來（而且有些地方已經有了配合的必要）。這樣異常重要的問題，荷蘭人和『左派』却絲毫不懂。

第二句話，就歷史上說來便是錯的。我們布爾塞維克參加過最反革命的國會，經驗告訴我們：這種參加，正是在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一九〇五年）之後，對於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準備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七年三月——俄舊歷二月）以及後來準備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舊歷十月），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此其一，第二，這句話非常違反邏輯。國會日益成為反革命底機關和中樞（附帶說明一句，事實上，過去任何時候，國會都沒有成為反革命底中樞而且也不能成為反革命底中樞），而工人正在建設蘇維埃的政權武器，由這兩句話當中就得到下面的結論：即工人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技術上訓練起來，以便用蘇維埃來反對國會，用蘇維埃來解散國會。但從這裏絕不能得到結論說：反革命的國會內部，有反對政府的蘇維埃派的存在，因此，解散國會，反而更

加困難或者並不比較容易。當我們同鄧尼金、高爾察克鬥爭的時候，我們每次都看得清楚，在他們裏面所存在的反對他們的，蘇維埃的，無產階級的派別，與我們的勝利很有關係。我們很曉得，當我們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俄舊歷十五日）解散立憲會議的時候，被解散的反革命的立憲會議中，站在蘇維埃方面的，有了一個澈底的布爾塞維克派和一個不澈底的社會革命黨左派，這並沒有使我們解散立憲會議的事情發生困難，反而使這件事情容易進行。這個提綱的作者，完全鬧糊塗了，縱然不說他們把一切革命的經驗忘記了，也要說他們忘記了許多革命的經驗；這些革命的經驗證明：在革命期間，反動國會以外的羣衆行動，與國會內同情於革命的（直接贊助革命的更好）反政府派聯合一致，是怎樣特別有益。據荷蘭人與「左派」在這裏的議論看起來，他們好像革命底教條主義者，從來不曾參加過真正的革命，或者從來不會深刻探究過革命史，或者一味表現幼稚態度，以爲主觀上『否認』某個反動機關，便算實際上用許多客觀因素底共同力量，把牠破壞了一般。糟蹋和陷害一種新的政治的（不僅是政治的）思想之最準確方法，便是爲着擁護這種思想而把這種思想弄成荒謬絕倫。因爲任何真理，如果說得『過火』（如老迪茨根所說的一樣）（註一六）大吹特吹，超出了牠實際應用的限度以外，便弄成荒謬絕倫，而且在上述情形之下，非弄到荒謬絕倫不可。荷蘭的及德國的『左派』對於蘇維埃政權優於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度這個新真理的効勞，正是這種弄巧反拙的蠢笨行爲。自然，誰要是照舊地籠統地說，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不應該拒絕參加資產階級國會，那也是不對的。在這裏我不

能說明，在那些條件下抵制國會是有益的，因為本文任務無他，只是由於國際共產主義策略中幾個迫切問題而估計到俄國的經驗。俄國經驗告訴我們，布爾塞維克應用抵制國會的策略，第一次是有效的，對的（一九〇五年），第二次是錯的（一九〇六年）。試一分析第一次情形，便看到那次抵制，使反動政府召集不成反動國會，當時的情形是：國會以外的羣衆革命行動（罷工運動也在內）發展異常之快，無產階級與農民中沒有一部份會贊助反動政府，革命的無產階級進行罷工鬥爭與土地革命運動，因此牠在廣大落後羣衆中的影響有了保證。十分明顯的，這個經驗不適用於目下歐洲的情形。同樣十分明顯的，——根據上述的理由，——荷蘭人及『左派』擁護不參加國會的主張（雖說這極擁護是有條件的），根本上是不正確的，對於革命無產階級底事業是有害處的。

在西歐與美國工人階級中先進份子——革命家已特別厭惡國會，這是無庸爭辯的。這是完全明白的，因為在戰爭期間和戰後，要比國會中社會黨及社會民主黨議員所形成的最大多數更卑污更無賴更變節的行爲，實難再想像得出。但是在解決怎樣去與公敵作鬥爭的問題時，倘屈服於深惡國會的這種情緒，那末，不唯愚蠢，而且罪過。在西歐許多國家裏，革命情緒，現時可以說是『新奇的東西』或者『罕有的東西』，因為人們期待這種情緒，簡直期待得太長久了，過於白費心機了，過於不耐煩了，或許因此就使他們這樣易爲情感所屈。自然，沒有羣衆革命的情緒，沒有促進這種情緒高漲的條件，那就不能實現革命的策略，但我們在俄國受了長期艱苦流血的經驗，確信一個真理，這就是革命策略不能僅

僅建築在革命情緒之上。策略底規定，須根據本國（以及鄰國和世界上一切其他國家）一切階級力量底清醒的，極客觀的估計以及革命運動經驗底估計。僅僅咒罵國會的機會主義，僅僅排斥參加國會，來標榜自己的『革命精神』，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正因為這是容易不過的事情，所以這不能解決困難的任務。更不能解決最困難的任務。在歐洲國會裏，建立真正的革命的國會黨團，比在俄國困難得多。這是當然的。但這祇是全部真理底一部分表現，而全部真理就是在一九一七年歷史上非常特異的具體形勢下，俄國開始社會主義革命較易，然繼續這種革命，完成這種革命，則較歐洲各國為難。一九一八年初，我已指明這種情形，接着兩年來的經驗已完全證明這種意見是正確的。俄國革命的特殊條件就是：（一）當時可以把蘇維埃革命與藉蘇維埃革命來結束那使工農受盡痛苦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事情，兩相配合起來；（二）當時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利用兩夥在全世界上強有力的帝國主義強盜間的拚命鬥爭，牠們不能聯合起來反對牠們的敵人——蘇維埃；（三）當時可以支持比較持久的內戰，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地域遼闊，交通不便的關係；（四）當時在農民中，有如此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運動，以至於無產階級的政黨採取了農民黨（即社會革命黨，該黨大多數是激烈反動布爾塞維主義的）底革命要求，並因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的原故，就立刻實現了這些要求——這些特殊條件目下在西歐是沒有的，這種條件或類似條件之重演，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就因為這個緣故（除開別的緣故不講外），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在西歐比俄國困難。要『繞過』這種困難，『跳過』為革命目

的而利用反動國會之難事，那真是十足的孩稚氣。你們要建設新社會嗎？但同時在反動國會內，由堅決忠實英勇的共產黨人建立一個好的國會黨團，你們却怕難！難道這不是孩稚氣麼？德國李卜克內西，瑞典赫格龍德，甚至沒有下層羣衆底贊助，尙能用真正革命的精神去利用反動的國會，而爲我們的模範。難道一個迅速發展的革命羣衆政黨，處在戰後羣衆失望憤激的情緒之下，反不能在最惡劣的國會內，鍛鍊出一個共產黨的黨團嗎？正是因爲西歐工人底落後羣衆，尤其是小農底落後羣衆，浸淫濡染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及國會主義的成見，較俄國爲甚，所以共產黨人，祇有從資產階級國會這種機關的內部，才能（並且應該）進行長期的，持久的，百折不回的鬥爭，去揭發，打消，和克服這種成見。

德國「左派」抱怨他們黨內的壞「領袖」因此悲觀失望，以至於「否認」「領袖」到了可笑的地步。在「領袖」們常須隱匿的條件下，要造就可靠的，老練的和有聲望的好「領袖」特別困難，而且要戰勝此種困難，沒有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配合起來，沒有考驗「領袖」（就中也要在國會內考驗「領袖」）是不可能的。批評——而且要最嚴厲，最無情的，最堅決的批評——不應該用來反對國會主義或國會的活動，而應該用法反對那些不善於革命精神，以共產主義精神來利用國會選舉，利用國會講台的領袖，更應該用法反對那些不願以革命精神，不願以共產主義精神來利用國會選舉，國會講台領袖。只有這種批評——同時當然要驅逐不適當的領袖，並用適當的領袖來代替他們——是有益處的，有成績的革命工作，這種工作，一方面教育「領袖」，使他們不愧爲工人階級與勞動羣衆的

領袖，他方面訓練羣衆，使他們學會正確地識別政治情形，並學會瞭解從這情形中產生出來的，往往是
非常複雜錯綜的任務。*

* 我沒有很多的機會去認識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派爾迪加同志及其「共產黨人抵制派」(Comunista astensionista)的小組織，祖護不參加國會的主張，無疑義地，這是不對的。可是據我所得到的材料——他所出版的兩期蘇維埃報(“Il Soviet”(註一七)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八日和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三期和第四期)四期謝拉梯同志底很好的共產主義雜誌(“Comunismo”(註一八)第一期至第四期)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二十日這個期間內出版)以及幾份不全的意大利資產階級的報紙——看來，我以為他有一點是對的。這一點就是派爾迪加同志及其小組對於徒拉梯及其同道者的攻擊：因為徒拉梯等留在一個承認蘇維埃政權和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裏，却依然做着國會議員，繼續他們最有名的機會主義的考政策。謝拉梯同志及其整個意大利社會黨坐視容忍，這自然是一個錯誤，由於這種錯誤，也會發生與匈牙利一樣深刻的禍害和危險，在匈牙利徒拉梯一流的先生們從內部來對黨和蘇維埃政權忘工，對機會主義的議員們所採取的這種錯誤的，不澈底的，再不堅決的態度，一方面可以產生共產黨「左派」，他方面在某種限度內，可以祖護共產黨「左派」的存在，謝拉梯同志顯然是不對的，他指斥議員徒拉梯之「不澈底」(共產主義雜誌第三期上)但真正「不澈底」的，正是意大利社會黨，因為它容忍徒拉梯這類機會主義的議員。

第八章 不作任何妥協麼

從出版於弗朗福爾特地方的那本小冊子底引證中，我們看到『左派』何等堅決地抬出這個不作任何妥協的口號。可憐，無疑義地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並願意成爲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怎樣忘記了馬克思主義底基本真理。試看一八七四年恩格斯（他同馬克思一樣，都是那一種稀有的和極稀有的著作家。這種著作家底每部大著作中的每句話，都含著極深遠的意思）反對那三十三個白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底宣言時，是怎樣寫的：

白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在自己的宣言中寫道：

『我們之所以成爲共產主義者，就由於我們求達我們的目的時，並不停頓於各種過渡階段，並不去妥協，因爲妥協只是延緩勝利之時日，延長奴隸制度之期間。……』

恩格斯接着寫道：

『德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成爲共產黨人，就因爲他們並不跳過而是經過一切爲歷史進程

所形成而不是由他們造成的各種過渡階段和妥協，清楚看到並且始終追逐他們的最後目的：即消滅階級，並建設沒有土地私有制，沒有生產工具私有制的社會。這三十三個白朗基主義者之所以成爲共產主義者，就因爲他們以爲：他們既然願意跳過各種過渡階段和妥協，那末，這件事情便算辦妥了，如果（這是他們確信的）日內『動手』政權到了手中，那末，後天『共產主義就會實現』。因此，如果這件事情不能立刻就辦到，那末，他們也就不成其爲共產主義者。』

『這是何等幼稚氣，把自己的急躁，當作理論的根據』（見恩格斯著白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底綱領，載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Volkstraat”*（註一九）上，——一八七四年出版，第七十三期。引自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五年文集，俄文版，一九一九年彼得堡出版，第五十二頁至五十三頁。）

恩格斯也在本文中對於瓦爾揚深致敬意，提到瓦爾揚『不可磨滅的功績』（瓦爾揚和格德從前都是國際社會主義底最偉大的領袖，到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後都把社會主義出賣了）。但是明顯的錯誤，恩格斯却不能予以詳盡的分析。自然，在年幼而無經驗的革命者看來，甚至在很有經驗很有歲數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看來，『容許妥協』好像是異常『危險』，難懂而且錯誤的勾當。並且許多

詭辯家（他們是十二分『有經驗』的政客）底議論正是同蘭斯盤雷同志所提到的英國機會主義的領袖底議論一樣：『如果布爾塞維克可以同人家進行某種妥協，那末爲什麼我們不可以同人家進行任何妥協呢？』但是經歷多次罷工（只拿階級鬥爭底這一種表現來說）教訓的無產階級，很能領會恩格斯所陳述的深遠的（哲學的，歷史的，政治的，心理的）真理。每個無產者都親身經歷過罷工，有時工人要求條件全未達到，或僅達到一部分，也不得不去上工，這個時候，他忍氣吞聲，同他恨入骨髓的壓迫者和剝削者『妥協』。每個無產者，處在羣衆鬥爭和階級衝突加劇的環境之下，很能認清兩種妥協之差別。一種妥協是爲客觀的條件所迫（罷工者儲金窮竭，沒有外方援助，飢寒交迫，困苦不堪），這種妥協，絲毫無傷於接受妥協的工人之革命忠心及他們準備將來鬥爭的決心；另一種妥協是叛賊底妥協，他們進行這種妥協，表面上也說是客觀原因，而實際上却是他們貪圖自身利益（破壞罷工的工賊也締結『妥協』）懼怯害怕，自願效勞於資本家，或屈服於資本家底威嚇，或屈服於勸說，或爲微利所誘，甘言所惑，這種叛賊底妥協，在英國工人運動史中，職工會領袖進行得最多，然而差不多所有其他各國工人，在各種不同的形式中，也看見了類似的現象。

當然，也有異常困難複雜的情形，使人們要費極大的力量，才能正確決定一個『妥協』底真實性質，——例如有些殺人條件，很難斷定這種殺人行爲究竟是完全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行爲（如必要的自衛），或者是不可饒赦的粗心或者甚至是精密佈置的謀害。當然在政治上，各國家內及國際上各

階級各政黨間之相互關係，錯綜混雜，所以有許多問題，較之辨別罷工時合理的『妥協』或者是工賊及出賣階級的領袖所進行的背叛階級的『妥協』等等問題，更要困難得多。要想寫定藥方，製好總規律（『不作任何妥協』）適用一切，療治百病，那就是荒謬的事情。我們要有自己的頭腦，來分別考察問題。黨的組織和名實相符的黨的領袖之作用，除其他不計外，也就在於要使本階級一切能够運用思想的代表，*在長期的，堅苦的，複雜的，多方面的工作中，培養出必要的知識，必要的經驗，必要的——除了知識及經驗之外——政治警覺，以便敏捷而正確地來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

幼稚的和毫無經驗的人們，以為祇要一般的承認可以妥協，就會抹煞機會主義（對於機會主義我們進行並且應該進行堅決的鬥爭）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中間的各種界限。這些人們假使他們還不曉得自然界以及社會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活動的，並且在相當限度內都是有條件的，那末，除了予以長期的教育，訓練，啓發以及閱歷政治的 and 生活的經驗外，再無他法可以糾正。在每一個個別的或特殊的歷史關頭底政治實際問題上，重要的，是善於特別提出那些不可容許的，叛賣的，機會主

*每個階級中，即令在最開通的國家條件下，即令在那個最先進的，因目前形勢而能把一切精神力
量發揚到最高度的階級中，總是有（而且只要階級存在，只要無階級的社會還沒有在本身的基
礎上完全鞏固，充分發展起來，將來也必然有）不去思想和沒有思想能力的代表。假如不是這樣，
那末，資本主義便不是壓迫羣衆的資本主義了。

義的（危害革命階級的機會主義）妥協中間最主要的一種妥協之種種表現，並用盡全力去說明這種表現，與這種表現作鬥爭。當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間，兩夥同樣掠奪和同樣殘暴的國家中間進行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機會主義底最主要的、最基本的一種，就是社會沙文主義，即主張『保護祖國』，在這樣一種戰爭中，主張『保護祖國』實際上便等於保護『本國』資產階級底強盜利益。大戰以後，保護那強盜式的「國際聯盟」；保護與本國資產階級所訂立的直接的或間接的聯盟以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和反對「蘇維埃」運動；保護資產階級的民主，資產階級的國會議員主義，以反對「蘇維埃政權」——凡此種種，都是不可容許的叛逆的妥協底最主要表現，而這種妥協，綜合起來，就成為危害革命無產階級及其事業的機會主義。

德國『左派』在弗朗克福爾特小冊子上寫道：

『……應當十分堅決地拒絕與其他政黨作任何妥協……應當拒絕一切迂迴和妥協的政策。』

真奇怪，這些『左派』既抱着這種見解，却沒有堅決地指斥布爾塞維主義！德國『左派』不會不曉得布爾塞維主義全部歷史中，無論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後，都充滿對其他政黨，其中也對資產階級政黨迂迴、通融和妥協的事實！

為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鬥爭，較之通常國家與國家間所進行的最持久的戰爭，要困難百

倍，複雜百倍，而且時間也要延長百倍；要進行這種戰爭，而事先就拒絕迂迴，拒絕利用敵人中間的利害衝突（即令是暫時的衝突），拒絕與可能的（即令是暫時的，不可靠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難道這不是大笑話麼？崎嶇峻峭，未通人跡的高山，如果我們不避艱險，要攀登這座高山，但事先却就拒絕有時候要迂迴前進，有時候要退轉回來，有時候要放棄已選定的方向而試走各種方向，『左派』底意見，同這件事情比較起來，難道不相像嗎？沒有經驗，缺乏覺悟到了這種地步的人（如果真是因為他們年青，那還好：「上帝」本來就讓青年人在相當歲月內說這一類愚蠢的話），居然能够得到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底擁護（不管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公開的或隱蔽的，完全的或部分的擁護！）

在無產階級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在一個國家內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很長時期內，依然比較資產階級要軟弱些，第一，很簡單的，就因為資產階級有很廣泛的國際聯繫，其次又因為在這個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國家裏，小的商品生產者使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發地不斷地重新恢復和重新產生出來。要想戰勝更強大的敵人，只有用最大的努力，同時必須最精細地，最留心地，最謹慎地，最巧妙地，一面利用敵人中間的各種嫌隙（即令是最小的嫌隙也要利用），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中間以及每一個國家內各種資產階級中間的各種利害衝突，他方面利用各種可能（即令是極小的可能也好）以獲得人數衆多的同盟者，儘管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

同盟者。誰不懂得這一層，誰就對於馬克思主義，對於一般的現代科學的社會主義，絲毫也不懂。誰要是在比較長久的時期中，在比較複雜的各種政治情況中，不會在實際上證明他會實際應用這個真理，那末，他就還沒有學會怎樣在革命階級的鬥爭中幫助革命階級，去把全體勞動的人類從剝削者手中解放出來。以上所說的，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及以後的時期，都一樣適用。

馬克思、恩格斯說，我們底理論並非信條，而是行動底指南；（註二〇）考茨基、奧托·鮑威爾等等這一類的『專利』馬克思主義者底最大錯誤，最大罪惡，便在於他們不懂這個真理，不會在無產階級革命最重要的關頭上應用這個真理。馬克思主義時代以前俄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車爾內舍夫斯基（註二一）就已說過：『政治的活動，並不是聶瓦街的康莊大道』（這是彼得堡一條寬廣、清潔、平坦、逼直的大街）。自車爾內舍夫斯基以來，俄國革命家因輕視或忘記這個真理之故，受了無數的犧牲。無論如何我們要辦到使西歐和美國的『左派』共產黨人以及獻身於工人階級的革命家，不至如落後的俄國人一樣，費了這麼高貴的代價，來領會這個真理。

俄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在俄皇制度未倒台以前，屢次利用了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效勞，就是說我們同他們締結了許多實際的妥協；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二年的時候，布爾塞維主義還沒有發生的時候，老火星報編輯部（參加這個編輯部的有普列哈諾夫、阿克謝爾洛德、陶蘇里赤、馬爾托夫、坡特列索夫和我）就同資產階級自由派政治領袖斯特魯威（註二二）訂了一個正式的政治聯盟（不錯，

爲時並不長)同時我們却善於不斷地進行思想上和政治上最無情的鬥爭,去反對資產階級內主義,去防止從工人運動內部發生出來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影響底極小表現。布爾塞維克總是繼續採用這種政策。自一九〇五年以來,他們總是堅持工農聯盟,以反對自由資產階級與沙皇政府,但同時並不拒絕贊助資產階級去反對沙皇政府(例如在複選時)也不停止與資產階級革命的農民政黨即「社會革命黨人」作最堅決的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鬥爭,揭破「社會革命黨人」是冒充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九〇七年,布爾塞維克在國會的選舉上,曾與「社會革命黨人」正式訂立短期的政治聯盟。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二年,有好幾年內,我們在表面上與孟塞維克處在統一的社會民主黨裏,但始終沒有停止與他們作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把他們看作是無產階級內部傳播資產階級影響的人和機會主義者。在大戰時,我們同「考茨基派」孟塞維克左派,(馬爾托夫)及一部分「社會革命黨人」(如車爾諾夫,那唐松)締結過某些妥協,我們同他們在齊美瓦特和京塔爾坐在一起開會,發表共同的宣言,但無論何時,我們都沒有停止或鬆懈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去反對「考茨基派」反對馬爾托夫及車爾諾夫(那唐松死於一九一九年,他那時是一個完全接近我們的,幾乎與我們意見一致的「革命共產主義者」——民粹派。(註二三))正在十月革命的時候,我們會同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締結了政治同盟,這個同盟雖然不是正式的,但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很收效的),我們那時完全接受了社會革命黨的土地政綱,未加絲毫修改;這就是說我們無疑地締結妥協,用以徵

信農民，使農民相信我們並不願挾制他們，而是想同他們協定。同時我們會向「社會革命黨左派」建議，訂立正式的政治同盟（不久以後便實現了這種同盟），請他們參加政府；但到布勒斯特條約成立後，他們破壞了這個同盟，到一九一八年七月，甚至實行武裝暴動，後來更進行武裝鬥爭來反對我們。

因此，德國『左派』因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想和「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即考茨基派）訂立同盟，便攻擊中央，我們認為這是『左派』底輕舉妄動，這是表現『左派』錯誤的明證。我們俄國也有過孟塞維克右派（參加克倫斯基政府的），他們與德國的謝德曼派類似，也有過孟塞維克左派（馬爾托夫），他們會反對孟塞維克右派，他們與德國的考茨基派相等，工人羣衆之逐漸離開孟塞維克而趨向布爾塞維克，我們在一九一七年間，可以顯然看到：一九一七年六月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我們的票數，祇佔百分之十三。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佔大多數。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舊曆十月二十五日））我們有百分之五十一的票數。爲什麼德國這一種與俄國完全相同的，工人由右而左的轉移，不立刻增強共產黨人底勢力，而先增強了居中的「獨立黨」，雖然這個「獨立黨」不會有過任何獨立的政見，不會有過任何獨立的政策，而祇搖擺於謝德曼派和共產黨人之間？

很明顯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德國共產黨人底錯誤策略，德國共產黨人必須公開承認這個錯誤並學會糾正這個錯誤。錯誤會在於拒絕參加反動的資產階級國會和反動的工會，錯誤會在於『左派』

幼稚病底無數表現，這種毛病現在明顯暴露出來了，因此可以更好地、更快地，對於機體更有利益地加以療治。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部，顯然是不一致的：在該黨中，除却這些不能了解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底意義，不能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機會主義老領袖（如考茨基、希法庭。其他如克里斯平·列迭布爾之流，在一定程度內似乎也是如此）以外，還形成了一個左派，無產階級的派別，這個派別發展得很迅速。該黨數十萬黨員（該黨大概一共有七十五萬黨員），是唾棄謝德曼而迅速走向共產主義的無產者。這個無產階級左派，在萊布齊地方舉行的獨立黨人代表大會（一九一九年）已經建議無條件地即刻加入第三國際。如果害怕「獨立社會民主黨」底這個左派『妥協』，那真是可笑。相反的，共產黨人必須尋找而且找得同他們妥協的適當形式，這種妥協，一方面，可以贊助並加速與此派完全融合起來，而這種融合是必要的，他方面絲毫不拘束共產黨人進行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鬥爭，去反對「獨立黨人」中間的機會主義右派。要定出這樣一個適當的妥協形式，大概是容易的然而祇有騙子，才能對德國工人和德國共產黨人，說有『容易』的致勝的道路。

如果『純潔的』無產階級，不為形形色色的，由無產者到半無產者（就是那些一半依靠出賣勞動力謀生的人），由半無產者到小農（及小手工業者，小家庭工業者以及一般的小業主），由小農到中農等等的過渡階層所包圍；如果無產階級本身的內部，沒有智識程度不等的差別，沒有鄉誼，職業有

時是宗教等等的區分，那末，資本主義便不成其為資本主義了。因此，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底覺悟部分，共產黨方面，就絕對地無條件地必須向其他各種無產者團體，向各種工人及小業主的政黨，採取迂迴、通融和妥協的辦法。問題是在於我們應當善於應用這個策略，來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革命精神鬥爭能力和致勝能力底一般水平，而不是降低這種水平。我們應當順便指出：布爾塞維克戰勝了孟塞維克，這不僅要求我們在一九一七革命以前，採取迂迴、通融、妥協底策略，即在十月革命以後，也是如此，自然，我們所採取的迂迴、通融和妥協的辦法，都是足以幫助，促進，鞏固和增強布爾塞維克而削弱孟塞維克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孟塞維克也在內）必然搖擺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搖擺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與蘇維埃制度之間，搖擺於改良主義與革命手段之間，搖擺於愛惜工人與畏懼無產階級專政之間以及其他等等。共產黨人底正確策略，應該是利用這種動搖，而不是輕視這種動搖，既欲利用，便應當對於那些傾向於無產階級的一部分人讓步，以他們傾向於無產階級的時間和程度為轉移，來決定我們對他們讓步的時間和程度，同時却要與那些傾向於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人作鬥爭。由於我們應用正確策略的結果，遂使孟塞維主義在我們俄國過去和現在都日益瓦解，使崛強的機會主義的領袖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使最好的工人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最好的份子，都轉入我們的營壘。這是長期的過程，那十萬火急的『決議』例如『不作任何妥協，不作任何迂迴』這只能妨害革命無產階級影響底增加與力量底擴大。

末了，德國「左派」固執已見，不承認凡爾賽和約，這也是他們無疑義的錯誤之一。像何爾茲爾這一種見解，表現得愈加「有根據」，愈加「鄭重」，愈加「堅決」和愈加武斷，結果就愈加笨拙。在目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情況下，僅僅與荒謬絕倫的「國家布爾塞維主義」（拉烏芬柏爾格等，這個「國家布爾塞維主義」甚至主張與德國資產階級訂立同盟，以便和協約國作戰）分崩界限，是不夠的，要曉得，不許蘇維埃德意志（如果德意志蘇維埃共和國不久可以成立的話）暫時承認和服從凡爾賽和約，這是根本錯誤的策路。但是當謝德曼鞏固政府的時候，當匈牙利蘇維埃政權還沒有被推倒的時候，當維也納蘇維埃革命還不是絕對沒有可能去援助蘇維埃匈牙利的時候，在當時這種種條件之下，不能由於上述的緣故就說「獨立黨人」要求簽字於凡爾賽和約，是正確的。那時獨立黨人底迂迴和機變，都做得很不好，因為他們多少替出賣階級的謝德曼派負擔了責任，他們多少離開了與謝德曼派作無情的（而且是極沉着的）階級鬥爭的觀點，而走到「無階級的」或「超階級的」觀點。

然而現在的局勢却顯然不同，現在德國共產黨人不應當束縛自己的手足，不應當信誓旦旦，聲言共產主義一旦取得勝利，就一定要否認凡爾賽和約。如果這樣幹，那就是愚蠢。應該說：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屢次叛賣了階級，他們這種叛賣階級的行動障礙了（而且局部的簡直是破壞了）與蘇維埃俄羅斯及蘇維埃匈牙利聯合起來的事業。我們共產黨人，將採用一切辦法，去促成和準備這個聯合，至於凡爾賽和約，我們並不一定而且並不立刻就否認牠。順利取消凡爾賽和約的可能，不僅有賴於德國蘇

維埃運動底勝利，而且有賴於國際蘇維埃運動底勝利。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障礙了這種運動，我們却贊助這種運動。問題底本質在此，根本的差別也在此。如果我們的階級敵人，剝削者及其走狗，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把加強德國及國際的蘇維埃運動，加強德國及國際的蘇維埃革命的許多機會，空空放過，那末，罪過就落在他們身上。德國的蘇維埃革命加強國際的蘇維埃運動，而國際的蘇維埃運動，却是反對凡爾賽和約，反對一般國際帝國主義的最強大的堡壘（而且是唯一可靠的，牢不可破的，全世界上都有威力的堡壘）。要把解脫凡爾賽和約的問題，一定地並立刻地放在第一位，放在解放其他被帝國主義所壓迫的國家使之脫離帝國主義壓迫的問題之前，這是市儈小資產階級的國家主義（只配考茨基、希法亭、烏托、鮑威爾這一流人信奉），而不是革命的國家主義。在歐洲無論那一個大國家裏——德國也在內——推翻資產階級，這對於國際間的革命是極大的勝利，爲了這種勝利，如果有必要的话，讓凡爾賽和約比較長期存在，也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如果俄羅斯一個國家能够忍受布勒斯特和約至數月之久，而對於革命有了益處，那末，蘇維埃德意志，與蘇維埃俄羅斯聯絡，亦何嘗不可以忍受凡爾賽和約爲時更久而對於革命有益呢。

英法帝國主義者設法陷害德國共產黨人，替他們做好圈套：『請你們說，你們不簽字於凡爾賽和約吧。』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果然像小孩子一樣，走上圈套，他們不去巧妙地運用機變以反對狡猾的而且此刻是強於我們的敵人，不去向敵人說：『現在我們要簽字於凡爾賽和約。』事先束縛自己

的手足，公開地告訴目前武裝比我們完備的敵人，說我們是否要同他作戰而且何時同他作戰，這是愚蠢，這不是革命精神。我們事先分明看到這場戰鬥有利於敵人而不利於自己，但是我們還要前去應戰，這是罪惡：如果革命階級底政治家，不會從事『迂迴，通融，妥協，』以避免分明不利於己的戰鬥，那麼，這種政治家，是毫無用處的。

第九章 英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 (註二四)

英國還沒有共產黨，但在工人中間却有新起的，廣大的，強有力的，迅速增長的，前途有極大希望的共產主義運動。有幾個政黨和政治組織（如不列顛社會黨，社會工黨，南威爾斯社會主義協會，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已在彼此協商，想建立共產黨。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出版之「工人無畏艦週刊」第六冊，四十八期（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註二五）由西爾維亞·潘克赫爾斯同志主編，內載牠的走向共產黨去一文。這篇論文述敘上列四個組織談判的經過，而談判的內容，就是加入第三國際，承認以蘇維埃制度來代替國會制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根據這幾個原則，來建立統一的共產黨，不意對於立刻成立統一的共產黨的主要障礙之一，就是參加國會問題及新共產黨加入舊「工黨」問題上的爭執，這個「工黨」却是機會主義的和社會沙文主義的，工會式的，大半由工聯組成的政黨。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與社會工黨一樣*——反對參加國會選舉，反對參加國會，反對加入「工黨」

* 似乎社會工黨反對加入「工黨」，但不是全體都反對參加國會。

因此和不列顛社會黨全國（或者多數）黨員的意見相左；在他們看來，不列顛社會黨是英國「各種共產主義政黨間的右派」（見潘克赫爾斯特底論文第五頁）。

總之，根本的爭執，和德國相同——雖然爭論所表現的形式（在德國所表現的形式，比在英國所表現的形式，更加接近於「俄國式」）以及其他許多情形有很大的區別。我們且看「左派」的論據。

關於參加國會問題，潘克赫爾斯特同志引證登載於該期週刊上的加拉克爾同志底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是加拉克爾同志以格拉茲郭地方「蘇格蘭工人委員會」底名義寫的，（註二六）他寫道：

「這個委員會，是堅決反對國會主義的，他以各種政治組織底左派為後盾。我們代表蘇格蘭的革命運動，我們力圖在生產中（在生產各部門內）建立革命的組織，並在全國各處，建立社會委員會為基礎的共產黨。我們同國會的議員們反目好久了。公開向他們宣戰，我們以為大可不必，而他們也害怕開始攻擊我們。」

「然而這種狀況不能長久繼續下去。我們在全線上正在節節勝利。」

「蘇格蘭獨立工黨底黨員羣衆，想起國會二字，一天比一天更要作嘔；一切地方國體，幾乎完全贊成蘇維埃」（蘇維埃這個名詞，是根據俄文發音用英文拼成的）「或工人蘇維埃」。當然，借政治糊口的（或以政治為職業的）先生們，受到重大的影響，因此他們用盡方法，想使他們的黨員回到國會主義方面去。革命的同志不應當擁護這夥匪徒。我們在這一方面

鬥爭將是很困難的。這場鬥爭中，最壞的一點，便是那些只顧私人利益不顧革命利益的人底叛賣行爲。對於國會主義之任何擁護，這簡直是幫助我們不列顛的謝德曼和諾斯克一流人物，使政權落到他們手裏去。亨得遜、克略英斯之徒，反動已極。正式的獨立工黨，日甚一日地受資產階級自由派勢力的支配，這些自由黨人精神上託命於麥克唐諾爾、斯諾烏登這一夥人底營壘。正式的獨立工黨極端仇視第三國際，而羣衆則贊成第三國際。無論用什麼方法，來擁護機會主義的議員們，這祇是幫助麥克唐諾爾、斯諾烏登這班先生們。不列顛社會黨，在此地毫無作用……此地需要一個健全的、革命的、生產的（工業的）組織以及根據明白確切的科學原則去行動的共產黨；如果同志們能够幫助我們，建立這種組織與共產黨，我們不勝歡迎；如果同志們不能幫助，而又不願意擁護反動份子以叛賣革命，那麼，敬請千萬不要過問這種反動份子久已竭盡心力希圖攫取議員的「尊號」——問號是作者加上的，）他們非常熱心，願意證明他們和「主人翁」一樣，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一樣，能够統治國家而得到成績。」

這一封致編輯部的信，據我看來，把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或剛剛走向共產主義的做羣衆工作的工人底情緒和觀點，表現得非常好。這種情緒最值得歡迎，最有價值；應當會器重和贊助這種情緒，因為沒有這種情緒，則英國的——而且是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是沒有希望的。善於表現羣

衆這種情緒的人，善於在羣衆中喚起這種（往往是矇矓的，未覺悟的，未驚醒的）情緒的人，應該加以愛護，應該予以種種幫助。但同時必須直接公開地告訴他們說：在大革命鬥爭中領導羣衆，僅靠情緒，是不够的，必須告訴他們說：最忠實於革命的人們要犯的或所犯的某些錯誤，乃是可以妨害革命事業的錯誤。加拉克爾同志致編輯部的這封信，毫無疑義地包含着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所犯的和俄國『左的』布爾塞維克在一九〇八年和一九一八年所犯過的一切錯誤底萌芽。

這封信的作者義憤填胸，表現出最可寶貴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家』的仇恨（然而不僅是無產者，而且是一切勞動者，即德國人所說的一切『小百姓』都瞭解和接近這種仇恨。）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底代表所表現的這種仇恨，實在是『一切智慧之母』實在是各種社會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運動及其成功之基礎。但是這封信的作者大概沒有顧計到，政治是一種科學，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他大概沒有顧計到：無產階級如果想要戰勝資產階級，就須造就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政治家』而且所造就出來的，要不弱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家。

這封信底作者很明瞭：並不是國會，而只有工人蘇維埃才是達到無產階級的目的的工具，凡是到現在還不了解這點的人，不論他是個最有學問的人，是個最老練的政治家，是個最誠懇的社會主義者，是個最淵博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個最篤實的公民，是個最篤實的有身家的人，他總是一個最壞的反動

者。然而不讓『蘇維埃的』政治家加入國會，不從國會內部來破壞國會制度，不由國會內部去準備蘇維埃將來解散國會這一個任務上的勝利，這樣是否能使蘇維埃戰勝國會呢？這封信的作者連這個問題都沒有提出，甚至不會想到提出這個問題之必要。但同時這封信作者却說出完全正確的意見，他說英國共產黨必須根據科學的原則來行動。第一，科學要求顧計到其他國家的經驗，尤其是，如果其他那些（也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正在經歷或不久以前已經經歷過十分類似我們底經驗；第二，科學要求顧計到一切活動於該國內部的力量，團體，政黨，階級，羣衆，科學絕不要求僅僅根據一個團體或一個政黨底願望與見解，絕不要求僅僅根據一個團體或一個政黨底覺悟程度與鬥爭決心，來決定政策。

至於說亨得遜、克略英斯、麥克唐諾爾、斯諾烏登這一流人物反動已極，這是對的。他們想把政權拿到自己手裏（不如說他們寧可同資產階級組織聯合政權），他們想依照資產階級的老方案來『統治』他們，一旦攫得政權，一定和謝德曼、諾斯克之徒如出一轍，這也是對的。這些全都不錯。但由此所得出的結論，絕不是說幫助他們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說工人階級底革命家，爲着革命利益，應該給這班先生們以相當的國會方面的幫助。爲說明這段意思起見，我引用英國目前兩種政治文件：（一）內閣總理魯易·喬治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八日的演說（根據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曼徹斯特導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註二七）上面的記載）（二）「左派」共產主義者西爾維亞·潘克赫爾斯同志在他的論文中（該論文我在上面已經提到）所發表的議論。

魯易·喬治在他底演講中，駁斥阿斯克維特（當時特請阿斯克維特到會，但阿氏拒絕了）及其他不願意與保守黨聯合，而想接近工黨的自由黨人。（在加拉克爾同志致編輯部的信中，我們也看到了自由黨人轉入獨立工黨的事實。）魯易·喬治證明自由黨與保守黨有聯合之必要，而且要聯合得密切，不然，則圖謀實行生產工具「公有制」的工黨，魯易·喬治「寧可把牠叫做」社會黨的工黨，就能够得到勝利。這個英國資產階級底領袖用通俗的語言，向着他底聽衆，向着自由黨底國會議員（這些人以前大概絲毫不懂）解釋道：「這在法國，叫做共產主義，在德國，叫做社會主義，在俄國，叫做布爾塞維主義。」魯易·喬治說明道，這是自由黨人所根本不能接受的，因為自由黨人根本贊成私有制度。他說：『文明到了危險的境界了，』因此自由黨員與保守黨員必須聯合起來。……

魯易·喬治說：

「……如果你們去到農業區域，那麼，不錯，你們在那裏所看到的，依然是舊時的黨派，沒有什麼變動，那裏離危險還遠。那裏還沒有危險。但是運動一旦到了農業區域，那裏的危險，也要和現在幾個工業區域一樣的大。吾國五分之四的居民，經營工商業，而從事農業的，未必有五分之一的居民。這是我想到將來危險時，始終憂慮的一件事情。法國居民大多業農，那裏有確定觀念底鞏固基礎，這種基礎變動得不很快，也不很容易受革命運動底激盪。在我們國家裏就不同了。我們國家比世界任何其他國家都容易顛覆；如果牠開始動搖起來，那麼，因為上面

所講過的緣故，他將比其他國家崩壞得更厲害。」

讀者由這裏以可看出魯易·喬治不僅是一個聰明的人，而且從馬克思主義者那裏學得了不少的東西。我們也不妨從魯易·喬治那裏，學些東西。

魯易·喬治演講以後，進行討論，我們由他們的討論中引出下面一段問答，倒是有興趣的事情：

『沃萊斯(Wallace)先生問道：『現時產業工人中間有很多是自由黨黨員，我們由他們那裏得到許多幫助，內閣總理在工業區域裏對於產業工人既然採取這一種政策，請問總理實行這種政策會有什麼結果呢。目下忠實擁護我們的工人，將來不會轉過去大大加強工黨底勢力嗎，將來不會發生這種可能的結果嗎？』

內閣總理回答說：『我對於加強工黨的問題有完全不同的意見。自由黨人互相傾軋，這件事實，無疑義地，使得很多自由黨人失望而轉入工黨，在工黨內已經有很多自由黨人，他們都是很能幹的人，現在他們以破壞政府底威信爲能事。結果無疑義的，對工黨有益的輿論大大增加着勢力。一般輿論，並不歸附工黨以外的自由派，而歸附工黨，補選運動，就證明這一點。』

附帶說一句，這一段話，證明資產階級中最聰明的人物們，怎樣糊塗而不能不幹無可救藥的蠢事。資產階級就要因此滅亡。我們的人，或許也要做些蠢事（自然要有一個條件，就是這些蠢事不很大，而

且要及時改正才行）但結果我們的人終於成爲勝利者。

另外一個政治文件，就是『左派』共產主義者西爾維亞·潘克赫爾斯同志的以下一番議論：

『……應克平同志（不列顛社會黨書記）把工黨叫做「工人階級運動底主要組織」。

不列顛社會黨中另一個同志，在第三國際代表會議上，把不列顛社會黨底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他說：「我們把工黨看做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

『我們不贊同這一種對於工黨的意見。就黨員底數量而言，工黨是很龐大的，雖然工黨裏有很大一部分黨員是不活動和不振作的。工黨就是加入工聯的男女工人，這些男女工人因爲廠中的同伴是工聯底會員，同時又因爲他們要想領取津貼，所以也就加入了工聯。

『但是我們承認工黨之所以有這樣多的黨員，也因爲不列顛工黨是一派思想底產物，英國工人階級底大多數現時還沒有跳出這派思想底圈子，雖然民衆底腦子裏已醞釀着極大的變化，而快要改變這種情形。……』

『……不列顛工黨和其他國家的社會愛國組織一樣，在社會底自然發展底過程中，必然要當權執政。共產黨人底任務在於聚集力量以推翻社會愛國派，我們在英國，不應當拖延這種活動，不應當遊移。

『我們不應當分散我們底力量去增加工黨的力量；工黨底上台執政，是不可避免的。我們

須集中我們的力量，去建立共產主義運動，以便戰勝工黨。工黨快要組織政府了；革命的反抗派，必須有準備和決心，以便進攻工黨政府。……」（註二八）

總之，資產階級自由派，放棄他們歷史上百年來經驗所視為神聖的——而且對於剝削者異常有利的——「兩黨」（剝削者的兩個政黨）制，認為必需聯合兩黨的力量，來與工黨鬥爭。一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自知末日將至，跑到工黨方面來。左派共產主義者認為工黨必然得到政權，並且承認現在大多數工人，都贊成工黨。根據這種情形，他們作出一個奇怪的結論，西爾維亞·潘克赫爾斯同志用以下的話說出這個結論：

『共產黨不應當締結妥協……他必須保全他學說底純潔，保全他的獨立，使他不染改良主義的毒害；他底使命是勇往直前，不要中途逗留和轉折，筆直地向共產主義革命走去。』

恰恰相反，因為英國多數工人還跟着英國的克倫斯基或謝德曼這一班人走，因為他們還沒有在這班人底政府下面嘗過滋味，而俄國和德國，正因嘗過這種滋味，工人才大批地轉向共產主義，因為如此，所以毫無義疑地，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參加國會，必須由國會內部幫助工人羣衆在事實上去認識亨得遜和斯諾烏登政府成立後所得的結果，必須幫助亨得遜和斯諾烏登去戰勝聯合起來的魯易·喬治與徹爾赤里。如果不這樣幹，便使革命事業更加困難，因為工人階級中多數人底見解不改變，革命是不可能的，要發生這種改變，就要靠羣衆的政治經驗，無論何時，僅僅靠宣傳，是不行的。如果現在分明

無力的少數工人，知道（或者無論如何應當知道）多數工人經過一個短時期以後，在亨得遜和斯諾、烏登、戰勝魯易、喬治和徹爾赤里的條件之下，便會對於他們自己的領袖失望，並轉而擁護共產主義（或者無論如何，要對共產黨人守中立，而且多半是守善意的中立），然而這少數人却說『不妥協，不中途轉折，勇往直前』這種口號，分明是錯誤的。這好像一萬人與五萬敵人作戰一樣，他們本來應當『停留』、『轉折』，甚至於締結『妥協』，以待不能即刻出發的十萬援兵，然而他們不這樣幹，却前去與敵人拚命。這只是知識份子的孩稚氣，而不是革命階級底鄭重策略。

一切革命以及二十世紀以來俄國三次革命所證實的革命基本規律，就在於：要革命得到勝利，僅僅被剝削和被壓迫羣衆覺着不能照舊生活並要求改革，這還是不夠的；要革命得到勝利，還須要剝削者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只有『下層』不願照舊生活，『上層』不能照舊統治，只有這個時候，革命才能勝利。這個真理，換句話說出來，就是：沒有全國的危機（既牽動被剝削者，又牽動剝削者的危機），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要革命，第一，就須要多數工人（至少也須要覺悟的，有思想能力的，在政治上積極的多數工人）完全明瞭革命底必要，並爲了革命有赴湯蹈火的決心；第二，須要統治階級遭受政府的危機，這種危機甚至將最落後的羣衆都牽入政治運動（任何真正革命底標誌，就是從前很有消沉的勞動者和被壓迫的羣衆中，迅速產生很多的能幹政治鬥爭的代表，其數量驟增至十倍或甚至百倍），這種危機減弱政府底勢力，使革命者能够很快地推翻政府。

在英國，可以得到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兩種條件，很明顯地日益具備，就在魯易·喬治底演說辭中，這一點，也看得出來。因此，『左派』共產主義者的錯誤現時之所以加倍危險，正因為我們看到有些革命者，採取不充分思索的，不充分注意的，不充分自覺的，不充分周到的態度，去對付這兩種條件底每一種。如果我們不是一個革命的小團體，而是革命階級底政黨，如果我們要吸引羣衆（倘不如此，我們便會成爲大言不慚的空談家），那末，第一，我們就必須幫助亨得遜或斯諾烏登去打倒魯易·喬治和徹爾赤里（更確切一點說：我們必須逼迫前者，去打倒後者，因為前者害怕自己的勝利）第二，我們必須幫助工人階級底多數，使他們在自己的經驗上，相信我們的主張是正確的，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幫助他們去認清亨得遜和斯諾烏登這一流人物之完全無用，認清這一流人物的小資產階級的和叛賣階級的天性，認清這班人的必然破產；第三，我們必須使革命的時機逼近，在那個時候多數工人對亨得遜之徒失望，因此可以一舉推翻亨得遜這班人的政府，而且有極大的勝利機會。如果那個極精明強幹的，不是小資產階級的，而是大資產階級的魯易·喬治，甚至於表現張皇失措，並由於昨天和徹爾赤里『衝突』，今天和阿斯克維脫『衝突』，而且益削弱自己的力量（及削弱全體資產階級的力量），那麼，到了將來那個時候，亨得遜這一班人底政府更加要張皇失措，進退維谷了。

我要更加具體地來說一說。在我看起來，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把他們的四個黨派（四個黨派都很弱，其中有一兩個更弱得不堪），在第三國際的原則上，在必須參加國會的條件下，合併起來，成爲一

個共產黨。共產黨向亨得遜和斯諾烏登這一班人提議『妥協』提議選舉上的協作，向他們說：我們共同前去反對魯易·喬治和保守黨底聯盟，按照工人投給工黨或投給共產黨的票數，來分國會中的議席（不在選舉時，而是用特別表決手續）同時我們各有宣傳鼓動及政治活動之完全自由。沒有最後這個條件，當然就不能和他們聯盟，因為否則便是叛賣階級。英國共產主義者絕對必須和俄國布爾塞維克（從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共十五年之久）對於俄國的亨得遜和斯諾烏登（即孟塞維克）所取的態度一樣，應堅持和爭得揭發亨得遜和斯諾烏登這一班人的完全自由權。

如果亨得遜和斯諾烏登這一班人贊同在這種條件下訂立聯盟，那我們便贏了，因為議席的多少，對於我們並不重要，我們不去爭奪議席，這件事情上儘可通融（但亨得遜之流，尤其是他們底新朋友——也可以說是他們底新主人——那些轉到獨立工黨方面來的自由派，主要的正是爲攬取議席。）我們贏了，因爲正是魯易·喬治自己『激動』羣衆的時候，我們把我們的鼓動，傳達到羣衆中去，同時我們不僅幫助工黨加速組織政府，而且幫助衆羣加速了解我們共產主義的，反亨得遜的全部宣傳，我們將毫無避諱，毫不緘默地進行這種宣傳去反對亨得遜。

如果亨得遜和斯諾烏登這一班人拒絕在這種條件下訂立聯盟，那我們更加贏了。因爲我們立刻便使羣衆看見（要注意，就在純粹是孟塞維克的，十足機會主義的獨立工黨內部，羣衆也贊成蘇維埃）亨得遜這一班人寧願接近資本案，而不願使一切工人聯合起來。我們馬上便在羣衆面前佔了贏

面，這些羣衆聽了魯易·喬治那一段很正確的，很有益的（對於共產主義有益）漂亮演說之後，將特別同情於全體工人的聯合，以反對魯易·喬治與保守黨的聯盟。我們立刻佔了贏面，因為我們在羣衆面前證明了亨得遜和斯諾烏登這一班人害怕戰勝魯易·喬治，害怕單獨取得政權，他們偷偷摸摸企圖獲得魯易·喬治底幫助，而魯易·喬治却公然要與保守黨攜手來反對工黨。應當指出，俄國布爾塞維克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俄舊歷二月二十七日）革命之後，所有反對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這就是反對俄國的亨得遜和斯諾烏登）宣傳，正因為上述的緣故，才獲得勝利。我們那時告訴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說：你們拋開資產階級，取得整個政權吧，因為你們在蘇維埃中佔多數（一九一七年六月在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布爾塞維克只有百分之十三的票數）。但是俄國的亨得遜和斯諾烏登，害怕拋開資產階級，取得政權，而資產階級明明曉得在立憲會議選舉中，社會革命黨與孟塞維克（這兩個政黨結成極親密的政治聯盟，實際上他們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一定獲得多數，*於是把這個選舉再三延擱下去，而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却沒有能力來毅然決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立憲會議選舉，根據當時所得到的消息，其結果如下：參加選舉者有三千六百

萬人以上，布爾塞維克獲得百分之二十五的票數，地主及資產階級底各種政黨獲得百分之十三的票數，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即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以及與他們一類的小團體獲得百分之六十二的票數。

然澈底反對這種延期。

如果亨得遜和斯諾烏登之徒拒絕同共產主義者聯盟，共產主義者立刻就佔贏面而獲得羣衆底同情，並使亨得遜和斯諾烏登之輩喪失信用，即令我們因此失去幾個議席，這對於我們也無足輕重。那時我們只在極少數的極端可靠的區域內，才提出我們底候選人，即是說，我們候選人的提出，不至於使該地自由黨人戰勝工黨黨員。那是我們進行選舉的宣傳，散發傳單以利於共產主義並在我們沒有候選人的一切區域內，請選民投票贊成工黨黨員而反對資本家。潘克赫爾斯特和加拉克爾兩個同志，以為這樣便是背叛共產主義，或是對於社會主義的叛徒放棄鬥爭，那就錯了。恰恰相反，共產主義革命的事業，無疑地可以因此得到好處。

英國共產主義者，現在甚至於接近羣衆，甚至於要羣衆聽他們的話，都時常感覺爲難。如果我以共產主義者的資格出來說話，請大家投票贊成亨得遜而反對魯易·喬治，便保管羣衆會聽我的話。那時我不僅可以淺顯地說明爲什麼蘇維埃比國會好，無產階級專政比徹爾赤里專政好（徹爾赤里這種專政是用資產階級「民主」的招牌來掩飾的），而且也可以說明我要投票贊成亨得遜，我提攜亨得遜，這無異絞索提攜絞犯一樣；此外我又可以說明亨得遜這一班人組織自己政府的時候快到了，他們行將執政，這也要證明我的意見是正確的，也要使羣衆轉到我這方面來，也要促進亨得遜和斯諾烏登這班人在政治上的死亡，好像俄德兩國裏他們的同道所遭遇的命運一樣。

如果有人出來反對我，說這種策略太『狡猾』，太複雜，羣衆不會了解牠，牠要分散割裂我們的力量，妨礙集中我們的力量去進行蘇維埃革命等等，如果有人出來說這種話，那末，我便要對這般『左的』反對者說：不要把你們底教條主義的高論，推諉在羣衆身上！俄國羣衆底文化程度，顯然不較英國爲高，而較英國爲低。但羣衆瞭解了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在蘇維埃革命前夜，在一九一七年九月，曾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名單以備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立憲會議），而在蘇維埃革命後的第二天，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舊曆十月），布爾塞維克又舉行了到明年一月十八日（俄舊曆五日）被他們所解散了的立憲會議底選舉，這種策略並沒有妨礙布爾塞維克，而且還幫助了布爾塞維克。

英國共產主義者中間第二種爭執就是是否要加入工黨，關於這個問題，我在此不能多說。我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太少了，而這個問題又特別複雜，因爲英國「工黨」異常特別，在本身結構上，過於不像歐洲大陸的普通政黨。不過毫無疑義地可以說，第一、有人認爲「共產黨必須保全牠學說底純潔，保全牠的獨立，使牠絲毫不染改良主義的毒害；他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不要中途逗留和轉折，筆直地向共產主義革命走去；如果有人根據這一類原則，而想出革命無產階級的策略，那麼，他在應否聯合「工黨」的問題上也要犯錯誤。因爲這一類原則，只是重演法國布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底錯誤，這些公社社員在一八七四年宣稱『否認』各種妥協和各種過渡階段。第二、毫無疑義的，這個問題上的任務，也和任何時候一樣，就是要善於把共產主義總的和根本的原則，應用到各階級和各政黨相互關係底特殊

情形上去，應用到向着共產主義走的客觀發展中的特殊情形上去，而這些特殊情形，爲各個國家所固有，我們應該善於研究，探索和揣摩這種特殊情形。

然而我們不僅講到英國共產主義運動時，須要講到這一點，而且對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做一般的結論時，也要講到這一點。現在我們就來講這個問題。

第十章 結 論

一九〇五年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形成世界歷史上一個異常特殊的轉變：在一個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罷工運動底範圍和力量爲世界歷來所僅見。只在一九〇五年正月一個月內，罷工的人數比過去十年內（一八九五到一九〇四年）平均起來每年罷工的人數，增加了十倍，自一九〇五年正月到十月，罷工不斷增多，而且日形擴大。在許多十分特殊的歷史條件的影響之下，落後的俄國，不僅首先向全世界昭示被壓迫羣衆在革命時所表現的獨立精神驟然增長（這點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昭示出無產階級底作用比較無產階級在全國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數不知要大多少倍，昭示經濟罷工與政治罷工底配合，由政治罷工進入武裝起義的轉變，以及受資本主義壓迫的階級中羣衆鬥爭及羣衆組織底新形式底產生——蘇維埃底產生。

一九一七年底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使蘇維埃在全國各地盡量發展起來，後來就使蘇維埃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當中得到勝利。不到兩年功夫，就表現出蘇維埃具有國際性質，就表現出這

種鬥爭形式與組織形式普及於全世界工人運動，就表現出蘇維埃底歷史使命是要做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及一般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底掘墓人與繼承者。

不僅如此。工人運動底歷史，現時證明：在一切國家中工人運動都要（而且已經開始）經過日益生長的，日益強健的，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底鬥爭，首先而且主要的是與本國的（每個國家的）「孟塞維主義」就是與機會主義及社會沙文主義作鬥爭；第二，是與共產主義「左派」作鬥爭（這可以說是補充的一種鬥爭）。第一種鬥爭，在一切國家內，似乎毫無例外，都已經開展起來，這種鬥爭乃是第二國際（第二國際目前事實上已經被打死了）與第三國際間的鬥爭。第二種鬥爭，在德國，在英國，在意大利，在美國（至少，世界產業工人會及無政府工團派底一部分，固執共產主義「左派」底錯誤，雖然這些組織差不多全體，差不多一律承認蘇維埃制度），以及在法國（前工團派底一部分，對於政黨及國會主義，採取不正確的態度，同時他們也是承認蘇維埃制度）都可以看到，就是說，毫無疑義地，但在幾個國家的範圍內，而且在全世界的範圍內，都可以看到。

但是，每個國家底工人運動，雖然到處都進行實質上相同的準備以便戰勝資產階級，但各國工人運動在這件事情上的發展，却各個不同。並且大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走這一條道路，比布爾塞維主義快得多，布爾塞維主義成爲有組織的政治派別以後，在歷史上有了十五年時間的準備，才獲得勝利。第三國際在一年短的時期中，已獲得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那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第二國際，在幾個

月前，還好似龐然大物，不知比第三國際強大多少倍，享受世界資產階級各方面的——直接的，間接的，物質的（開員高位，護照，報章）和思想的——贊助，而今却被第三國際擊破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各國共產黨人，要十分自覺地認清機會主義及『左派』教條主義作鬥爭的根本的，原則上的任務，同時要十分覺悟地估計到由於各個國家經濟，政治，文化，民族成份（如愛爾蘭等）殖民地，宗教派別種種特點的關係這場鬥爭所採取的而且必然應當採取的具體特點。現在到處感覺到對於第二國際之不滿，而且這種不滿，繼續擴大和增加，這是由於第二國際犯機會主義，也由於牠不會或者不能創立真正集權的，真正起領導作用的，能够在革命無產階級爲建立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而鬥爭中運用革命無產階級國際策略的中央機關。必須認識清楚，這樣的中央領導機關無論如何，都不能建立在使鬥爭策略上的規律千篇一律，死板劃一，彼此雷同這種基礎上面。各民族間各國家間的民族的和國家的差別一日存在（這些差別，甚至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以後，還要很長時期存在。）則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底國際策略之統一，不在於消除特異之點，不在於取消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癡人說夢），而是要去正確應用共產主義底根本原則（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使這些原則，得到正確的枝葉的形式上的變更，使這些原則正確地適應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特殊情形。當每個國家採取具體的辦法，以便解決統一的國際任務，以便戰勝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與『左派』教條主義，以便推翻資產階級，以便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應當考察，研

究，探索，揣摩和捕捉民族的特點，這是一切先進國家（而且不僅是先進國家）在目前歷史階級上的主要任務，吸引工人階級底先鋒隊，使這個先鋒隊贊助蘇維埃政權而反對國會主義，贊助無產階級專政而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在這個問題上，主要的事情（自然全部的事情還差得很遠，然而主要的事情）是做到了。現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精神集中在下述一個步驟上面，這個步驟，看來好像比較次要——在某種觀點上看去，也的確比較次要——但在實際上，却更加接近於任務底實際解決。這個步驟就是要找得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或接近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

我們在思想上，已經取得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是主要的事情。如果沒有辦到這件事情，那就連走向勝利底第一步也做不到。但是這件事情離開勝利還很遠。僅靠先鋒隊，不能獲得勝利。如果整個階級，如果廣大羣衆，並不站在直接援助先鋒隊的立場，或不站在至少對先鋒隊嚴守善意中立，並對於敵人絕對不能加以贊助的立場，這個時候僅把先鋒隊派去決戰，這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可是想要真正整個階級，想要真正廣大的被資本所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上這種立場，僅靠宣傳，僅靠煽動，是不够的。還要有羣衆自己的政治經驗。這乃是一切大革命底根本規律，這條規律現在不僅由俄國，而且也由德國彰明較著地證實了。不僅文化低落，往往目不識丁的俄國羣衆，即文化程度很高，個個都識字的德國羣衆，也須親身閱歷一番，目睹那第二國際英雄們所組織的政府完全軟弱無能，完全沒有氣節，完全沒有辦法，專門獻媚於資產階級，十分卑鄙齷齪，目睹那極端反動派（俄國底柯爾尼洛夫、德國底卡普之

徒)底專政是完全不能避免的(就是說: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是極端反動派專政,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然後才會決心走向共產主義。

國際工人運動中覺悟的先鋒隊,即共產黨,共產主義的團體,共產主義的派別,牠們目前的任務,是要善於牽領廣大羣衆(而現在廣大羣衆往往還是酣睡,消沉,守舊,暮氣沉沉,而沒有醒悟)走上這種新立場,確切一點說,是要不僅善於領導自己的黨,而且也要善於領導這些羣衆,以便他們轉上,接近新立場。如果當時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戰勝機會主義與社會沙文主義,那末,第一個歷史任務(即吸引無產階級底覺悟的先鋒隊到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方面的任務),就不能解決;如果不能取消左的教條主義,如果不能完全克服和糾正左的教條主義底錯誤,那末,目前第二個任務,即善於牽領羣衆走上新立場(這種新立場能够保障先鋒隊在革命中得到勝利)的任務也不能完成。

既然在過去的時候,我們應該吸引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到共產主義方面來,所以宣傳便佔第一位(現時在相當的程度內亦復如是);在這一方面講起來,甚至那些政治研究組雖然帶着研究組的一切弱點,也是有益處的,也可收得成效的。但是到了羣衆實際行動的時候,要安排百萬大軍(假使可以用這個名詞的話),要佈置目前社會內一切階級的力量,以便作最後的決戰,到了這個時候,僅靠宣傳的老辦法,僅僅重複『純粹』共產主義底真理,是絲毫沒有用處的。此時,不能只計算到幾千人,像不會領導過羣衆的小組宣傳員本來所計算的一樣;此時應當計算到幾百萬人和幾千萬人。此時我們不僅

要問自己，我們是否已使革命階級底先鋒隊信服，而且還要問：現社會中一切階級（一定要一切階級毫無例外）在歷史上發生作用的力量是否已經這樣佈置，以至於決戰時機已經完全成熟起來，以至於下列條件已經具備：（一）仇視我們的一切階級力量，已充分錯亂，他們彼此之間已搏戰到充分程度，已因力不勝任的鬥爭，弄得精疲力盡；（二）一切動搖的，不穩定的中間份子，即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同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在民衆面前，充分揭破了自己，已因實際上的破產而丟醜；（三）在無產階級中，羣衆熱情，已經開始並且日益高漲，去贊助極堅決極勇敢的革命行動，去反對資產階級。只有在這個時候，革命時機才算成熟，只有在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正確估計到上面簡括敘述出來的條件並正確選擇時機的話，我們的勝利，才有保障。

一方面徹爾赤里派和魯易·喬治派（這種政治人物，各國都有，只帶些少的民族特點）中間的差別，另一方面亨得遜派和魯易·喬治派中間的差別，從純粹的共產主義，即抽象的共產主義，亦即還沒有成熟到實際的羣衆的政治行動上的共產主義底觀點上來看，固然無足輕重。但從羣衆實際行動底觀點上來看，這種差別是極端重要的。一個共產黨人如果不僅要做一個覺悟的，篤信的思想上的宣傳家，而且要做一個革命中羣衆底實際領導者，那末，他的整個任務，他的全部事業，便在於估量和確定這些『朋友們』中間不可避免的，便得所有這些『朋友們』一齊削弱的衝突，究竟在什麼時候會完全成熟。要把極端忠於共產主義理想的誠心，與善於從事一切必要的，實際的妥協，迂迴，通融，轉折，退却等等

的才具，二者融匯起來，以便促進亨得遜這一班人（如果不舉出名人的話，那麼，就可以說是第二國際底英雄們；就可以說是自命爲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政權之實現與倒台；促進他們實際上必然的破產（而這種破產正是用我們底精神，正是向着共產主義這個方向去教導羣衆）；促進亨得遜派——魯易·喬治派——徹爾赤里派中間（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立憲民主派——君主專制派中間；謝德曼派——資產階級——卡普派中間等等）必然的衝突，爭執，糾紛和完全決裂；並且要正確地選擇這些『神聖私有制底柱石』中間決裂得最利害的時機，以便進行無產階級底堅決進攻去擊破所有這一班人並奪取政權。

一般的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比最先進階級底最好政黨，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像的內容總是要豐富得多，複雜得多，生動得多，「狡猾」得多。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爲最好的先鋒隊也只是表現幾萬入底意識，意志，情感和想像；而實現革命的（在人們的一切能力特別興奮和緊張的時候）却是最激烈的階級鬥爭所鞭策的數千萬人的意識，意志，情感和想像。由此便得出兩個很重要的實際結論：第一革命階級，爲實現自己的任務起見，必須善於領會和使用一切（絲毫不能除外）社會活動底形式或方面（在奪取政權以後，要去完成牠在奪取政權以前所未完成的事情，然而有時候却要冒很大的危險）；第二，革命階級，須時時準備，以便極迅速地，突然間地用一種形式去代替別一種形式。

一個軍隊，倘不準備學會使用敵人所有的或者能夠有的各種武器，各種鬥爭手段和方法，那麼誰

也要承認這個軍隊底態度，是愚蠢的，或者甚至於是罪惡的。這在政治上比在軍事上更甚。在政治上，在將來種種不同的條件之下，究竟那一種鬥爭手段對於我們適用和有利，我們事先愈加難以知道。倘若我們不能使用一切鬥爭手段，那麼，當別些階級的狀況發生不以我們意旨為轉移的變動，而提出我們所特別見拙的活動形式時，我們就會遭受極大的失敗（有時甚至是致命的失敗）。如果我們善於使用一切鬥爭手段，那怕當時情形不容許我們採取最厲害的，最快不過地給敵人以致命打擊的那種武器，我們也一定能夠得到勝利，因為我們代表真正先進的眞正革命的階級底利益。沒有經驗的革命者，時常以為公開的鬥爭手段，是機會主義的，因為資產階級特別是在這一方面常常（尤其是在非革命時期，在『和平』時期）欺騙了和愚弄了工人；他們時常以為秘密的鬥爭手段才是革命的，然而這是不對的。是的，當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時，最自由民主的國家裏，資產階級極無恥地和極厲害地欺騙了工人，禁止人們談論眞理——談論大戰的強盜性質，在這一種條件之下，那些不能和不願（請你不要說『我不能』而說『我不願』罷）採用秘密鬥爭手段的政黨和領袖，的確是機會主義者和出賣工人階級的叛徒。但是革命者，如果不會把秘密的鬥爭手段和一切公開的鬥爭手段配合起來，那麼他們便是極不好的革命者。在革命已經爆發並擴大了的時候，誰都參加革命，有的只是由於狂熱，有的是由於趕時髦，有的甚至由於鑽營個人利益，這時做一個革命者，並不為難。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要經過多少困難，費盡千辛萬苦，才能『解脫』這一種可憐的革命家。當直接的，公開的，眞

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鬥爭條件，還沒有來到時，而善於做一個革命者，善於在非革命的，有時簡直是反動的機關中，在非革命的環境裏，在不能立刻看清革命行動方法之必要的那些羣衆中，捍衛革命底利益（用宣傳，鼓動，組織的方法），這就困難得多了——也有價值得多了。善於尋找，探索，正確斷定使得羣衆接近真正的，決勝負的，最後的，偉大的，革命鬥爭的具體道路或事變的特別轉變關頭，——這便是西歐和美國目前共產主義運動底主要任務。

例如英國。我們不能曉得——任何人事先都不能斷定——英國什麼時候會爆發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什麼緣由最足以喚醒和掀起極廣大的，目前還未驚醒的羣衆去進行鬥爭。所以我們必須進行我們的一切準備工作，以便四隻足都裝上鐵蹄（像已故的普列哈諾夫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時候所愛說的一樣。）或許國會危機可以引起『山崩海裂』，或許由極紛亂的，日益險惡和劇烈的，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中所產生出來的危機，或許第三種以及其他的事變，都可以引起『山崩海裂』。我們所說的，並不是將來那一種鬥爭會決定英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命運（這個問題絕對不會引起任何共產黨人底疑慮，這個問題，我們大家已經解決了，並且已經切實解決了，）我們所說的，是那一種緣由，將來會喚起目前還是沉睡的無產階級羣衆，去動作起來，並使得他們緊緊迫近革命。我們不要忘記德列伊福斯案底陳例，當時在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裏，無論國際方面或國內方面，革命條件都要比現時少一百倍，但是只要有這一種『意外的』和『微末的』緣由，只要發生反動軍閥千百椿

無恥行爲中之一樁（德列伊福斯案）就足以使人民緊緊迫近國內戰爭！

在英國共產主義者既須經常不斷地，不屈不撓和不偏不倚地去利用國會選舉，又須利用不列顛政府對愛爾蘭政策，殖民地政策，全世界帝國主義政策上底一切變故，利用社會生活底其他各部分和各方面，在各部分和各方面都按照新方法，按照共產主義的方法，不是用第二國際底精神，而是用第三國際底精神來努力工作。我在此地沒有時間，沒有篇幅，來描寫『俄國的』、『布爾塞維克的』參加國會選舉和參加國會鬥爭底方法，但是我可以切實告訴國外的共產主義者說，俄國的國會選舉運動，與通常西歐的國會選舉運動，完全不同。人們往往由此得出結論說『是呵，在你們俄國，是這樣的，但在我們這裏，國會主義却是另一個樣子。』這是很錯誤的結論。全世界共產主義者——各國站在第三國際方面的人，正是要在各方面，在生活的各部分上，把那舊的，社會黨的，工聯派的，工團主義的國會工作，改變爲新的，共產主義的國會工作，共產主義者之所以生存在世，正是爲着這件事情。在俄國的選舉裏，也始終有過很不少的機會主義的行爲，純粹資產階級的，不顧大局的，僞詐騙人的資本主義的弊端。西歐和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必須學會創造一種新的，不尋常的，不是機會主義的，不是貪圖祿位的國會主義：以便共產主義者的政黨提出自己的口號，以便真正無產者得到沒有組織的，備受壓迫的貧民底幫助而散發傳單，走遍工人底宿舍，走遍鄉村無產者和僻野（幸而在歐洲，窮鄉僻野，要比俄國少許多倍，在英國尤少）農民所住的茅舍，去到最平民式的茶樓酒肆，參加最平民式的會社和不時的集會，同民衆

說話時，不要用學者的口吻（也不要過於用國會的語氣），絲毫不要爭逐國會的『議席』，而要到處啓發思想，吸引羣衆，揭破資產階級底食言，利用資產階級所設立的機關，所舉行的選舉，所發表的告全體民衆的宣言，在選舉時，利用平素（在資產階級底統治下）得不到的機會（自然要除去大罷工底機會以外，因為在俄國大罷工的時候，這一種鼓動全民的機關，工作得更加緊張），來使羣衆盡量認識布爾塞維主義。在西歐和美國要進行這些事情，是很困難的，是十分困難的，但是這些事情是可以進行而且應該進行的，因為不費力，共產主義底任務，就根本不能解決，要解決一天比一天愈加複雜的，一天比一天愈加和社會生活各部分聯繫起來的，一天比一天愈加要由資產階級手中節節奪取社會生活各部門和各方面的實際的任務，就應當費力。

就在英國裏，在軍隊中，在『自己』國家底被壓迫的和不平等的民族中間（如愛爾蘭，各殖民地），宣傳，鼓動和組織底工作，也應當按照新方法和新精神（不是按照社會黨的方法，而是按照共產黨的方法，不是用改良主義的精神，而是用革命的精神）來進行。因為在社會生活底這些方面，一般的在帝國主義時代，而現時是在大戰之後，當各民族受到戰爭的痛苦，急速張開眼睛去認識眞情實況的時候（而這種眞情實況，就是幾千萬人陣亡和變爲殘廢，只是爲的解決一個問題：英國強盜，或德國強盜，究竟那一個將掠奪更多的國家），引火的燃料，特別充足，釀成衝突引起危機，使階級鬥爭變本加厲的緣由，特別豐富。現時在全世界經濟和政治危機底影響下，在一切國家內，無數火星到處橫飛，我們不曉得，

而且不能曉得，到底那顆火星將燃起大火，把羣衆特別從酣睡中喚醒起來，因此我們必須用我們新的共產主義的原則，去到各方面，甚至去到那最陳舊的，最腐敗的，看來沒有希望的方面，進行工作，不然，我們將來便不能勝任裕如，便不會知道各方面的情形，便不會使用各種武器，我們既沒有準備就緒以便戰勝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用資產階級的方法將社會生活底各方面建設了，——而現在也把他們破壞了），又沒有準備就緒以便在得到這種勝利之後，用共產主義的方法去改組全盤社會生活。

當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以後，當這個革命在國際範圍內獲得出乎資產階級及庸俗份子意外的勝利之後，全世界換了一個樣子，資產階級也到處換了一個樣子。資產階級爲「布爾塞維主義」所嚇倒，痛恨「布爾塞維主義」深入骨髓，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牠一方面使事變急轉直下，而另一方面，却聚精會神，用暴力來鎮壓布爾塞維主義，因此他在其他許多方面，削弱自己的陣地。一切先進國家的共產主義者在決定策略時，應當估計到這兩種情形。

當俄國立憲民主黨及克倫斯基大舉攻擊布爾塞維克的時候（特別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起，一九一七年六月和七月間攻擊得愈加兇猛），他們做得『太過火了』。唱起各種腔調，大罵布爾塞維克的資產階級幾百萬份報紙，却幫助了喚起羣衆去估計布爾塞維主義；除了報章以外，整個社會，正由于資產階級的『熱心』，都議論紛紛，講到布爾塞維主義。現在各國的百萬富豪在國際上的行動，我們不得不對他們心感。他們盡心竭力攻擊布爾塞維主義，與從前克倫斯基一班人無異；他們做這件事情，也和

克倫斯基一樣，做得『太過火了』也一樣幫助我們。法國資產階級誣蔑比較溫和的或動搖的社會黨人，說他們信仰布爾塞維主義，牠把布爾塞維主義做成選舉運動的中心；美國資產階級張皇失措，把成千成萬的人，認為有布爾塞維主義的嫌疑，大肆逮捕，到處捏造謠言，說布爾塞維克陰謀不軌，這樣就造成一種人人自危的空氣；英國資產階級，這個世界上『資格最老的』資產階級，不管牠怎樣聰明，不管牠怎樣富於閱歷，却做出人們想像不到的蠢事，牠建立經費極充足的「反布爾塞維主義協會」，出版專門評論布爾塞維主義的書報，添雇很多的學者，鼓動家，牧師，去和布爾塞維主義奮鬥；我們對於這些資本家先生們，應該鞠躬鳴謝。他們替我們效勞。他們幫助我們，使羣衆來注意布爾塞維主義底實質和意義究竟是什麼。本來他們也就不能有別種作為，因為要想默不作聲，剷除布爾塞維主義，他們已經辦不成功了。

然而，同時資產階級差不多只看見布爾塞維主義底一方面：只看見武裝起義，強力，恐怖；因此資產階級特別準備在這一方面，設法抵抗。在個別情形之下，在個別的國家裏，在某種短促的時期內，資產階級或者能够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顧計到這一種可能，然而資產階級能够達到這種目的，這對於我們，是絕對沒有什麼可怕的。共產主義真正從社會生活底各方面『發育起來』，牠的萌芽真正到處都有，『共禍』（這是資產階級及其警察很喜歡用的最『快意』的名詞）已經深深侵入機體並侵蝕全部機體。如果特別小心謹慎，『堵住』一個出口，『共禍』却從另一個出口，有時是完全意想不到的

出口迸發出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資產階級儘管東奔西走，兇惡狂暴，做出過火的行動和愚蠢的事情，預先報復布爾塞維克；設法再屠殺（在印度、匈牙利、德意志等國）幾百個，幾千個，幾十萬個明天的或昨天的布爾塞維克；資產階級底這種行動，和以前被歷史判決死刑的一切階級底行動一樣。共產主義者應當知道，無論如何，將來的世界總是屬於我們的，因此我們不僅僅在大革命的鬥爭中表現極大的熱情，而且要用最冷靜和最清醒的頭腦，去計算資產階級底瘋狂奔走，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把這種熱情和計算兩者融合起來。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殘酷地被撲滅了；一九一七年七月，俄國布爾塞維克被擊敗了；一萬五千名以上的德國共產黨人，因為謝德曼和諾斯克協同資產階級和保皇黨的將軍用極巧妙的詭計和欺詐的手腕，以至於被屠殺了；在芬蘭，在匈牙利，白色恐怖異常猖獗。然而在各種情形之下，在一切國家之內，共產主義都日益鞏固，日益發展；牠居然這樣根深蒂固，以至於取縮並沒有削弱，共產主義，反而加強共產主義。要使我們更加有把握和更加切實地走向勝利，我們所缺少的，只有一點，這一點就是：一切國家底一切共產黨人，都要澈底覺悟到必須使我們的策略盡量靈活，蓬勃發展的共產主義，特別是在各先進國家內，目前缺乏這種覺悟，缺乏在實際中實現這種覺悟底能力。

那飽學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從前忠於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如考茨基、奧托、鮑威爾等底破產，可以（而且應當）做很有益的教訓。從前他們完全覺悟到必須採取靈活的策略，他們自己學習了馬克思底辯證法，而且轉授別人（從前他們在這一方面的供獻，其中有許多，永遠是社會主義文

獻上有價值的東西，但是他們在應用辯證法的時候，却犯了這樣大的錯誤，或者說，他們在實際上成爲這樣一種非辯證論者，成爲這樣一種不會估計形式底迅速改變，不會估計新內容迅速充實了舊形式的人，以至於他們的命運與甘特曼、格得和普列哈諾夫相差無幾。他們破產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祇『呆呆注視』一個固定的形式，忘記了這個形式是片面不全的，他們害怕看見那些因客觀條件之故而必然發生的急遽轉變，却依然口口聲聲，說那種簡單的，背熟的，第一眼看去是很明顯的真理：三大於二。然而政治雖然也像算術，却更加像代數，雖然也像初等數學，却更加像高等數學。實際上，一切社會主義運動底舊形式，已充實了新內容，因此數字前面，出現了一個新符號：出現了一個『負號』，可是我們的學究却固執成見，他們過去和現在依然在那裏勸說自己並說服別人，硬說『負三』大於『負二』。

我們要設法使共產主義者，不要從另一方面弄出同樣的錯誤，更確切一點說，『左的』共產主義從另一方面弄出來的同樣的錯誤，要趕快加以糾正，要迅速地，使機體不至於大受損害地加以消除。不僅右的教條主義是一種錯誤，左的教條主義也是一種錯誤。目前共產主義運動中『左的』教條主義的錯誤，比較『右的』教條主義（即社會沙文主義與考茨基主義）的錯誤，其危險性與嚴重程度，當然要小一千倍，然而，此中緣故，只是由於『左的』共產主義運動，還是很年幼的，剛剛發生的一種思潮。只是因爲這個緣故，這種病症，在一定條件之下，才容易醫治，因此，必須用極大的努力，來着手醫治這種

病症。

舊形式破裂了，因為舊形式裏面的新內容——反無產階級的，反動的內容——發展到無法包容的地步。從國際共產主義發展的觀點上看來，我們現在有這樣堅固的，這樣強大的，這樣有力的工作內容（爭取蘇維埃政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以至於這種內容能夠而且應該表現在任何形式上，既表現在新的形式上，又表現在舊的形式上，牠能夠而且應該改造，戰勝，征服一切形式，不僅是新的形式，而且是舊的形式——其目的並不是要與舊的形式調和，而是要善於把一切舊的和新的形式變為共產主義獲得完全的和最後的，堅決的和反覆的勝利所使用的武器。

共產主義者要用全副力量，去使工人運動以及一般社會的發展，走上最直接的，最輕便的道路，以便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上得到勝利。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然而只要向前多走一小步——似乎這一步依然是照原來的方向的——真理便變成錯誤。只要像德國和英國的左的共產主義者一樣，說：我們只承認一條道路，一條筆直的路，我們不准迂迴、通融和妥協，這便是錯誤，這種錯誤，足使共產主義受到極嚴重的害處，而且局部地已經使得共產主義，現在也使得共產主義受到極嚴重的害處。右的教條主義固執成見，僅僅承認舊形式，而沒有看見新內容，因此完全破產了。左的教條主義固執成見，無條件地否認一定的舊形式，牠看不見新內容經過一切和各種形式而離開自己的道路，牠不知道我們共產主義者底責任，就是要善於學會使用一切形式，學會以最快的速度，用一個形式去補

充別個形式，用一個形式去代替別個形式，使我們的策略適應各種不是我們的階級，或者不是我們的努力所引起的變化。

全世界的革命，已因帝國主義全世界大戰中的慘酷狀況與下流行爲，已因大戰所形成的沒有出路的情形，而受到如此強有力的推動和加速，——這個革命，在範圍和深度上講起來，發展得這樣迅速，具有這樣豐富的變化形式，供獻這樣有教訓意義的，這樣實際的，駁倒各種教條主義的論證，以至於我們有十足的根據，來希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犯的『左派』共產主義幼稚病，可以很快地完全醫治好。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完稿。

第一章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已成事實。「左派」或「原則上的反對派」已經另外組織「共產工黨」以示別於「共產黨」。在意大利，也好像要弄到分裂的地步——我說「好像」因為我僅僅有左派的報紙蘇維埃（“Il Soviet”）新到的兩期（第七期和第八期）在這兩期報上公開討論分裂底可能與必要，同時也講到「懷疑派」（註二九）（或抵制派即反對參加國會的一派）底代表大會，而這一派直到現在是屬於意大利社會黨的。

與「左派」即與「反國會派」（其中有一部分人也反對政治，反對政黨，反對職工會內的工作）實行分裂，好像我們過去與「中派」（或考茨基派，龍格派，「獨立工黨」等等）實行分裂一樣，也許要成爲國際的現象。就讓牠這樣罷。分裂總要比觀念不清好些，因爲觀念不清阻礙黨思想上，理論上，革命精神上的發展和成熟，阻礙黨的和衷共濟的，真正有組織的，真正準備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工作。

讓「左派」在國內和國際的舞台上，在事實上親身去閱歷一番罷，讓他們沒有嚴格集中的和遵

守鐵的紀律的黨，沒有駕御各方面，各部門，各項政治工作與文化工作的能力，就企圖去準備（並且接着就去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罷。實際的經驗會很快地教訓他們。

工人運動中一切誠懇主張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份子，在最近的將來，一定會而且必須要匯合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政黨；現在我們就應當竭盡全力，使我們與『左派』的分裂，不至妨礙或很少妨礙將來這種匯合。俄國布爾塞維克底特別幸福，就是他們還遠在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羣衆直接鬥爭以前，有了十五年的工夫，來進行有系統的，貫徹到底的鬥爭，既去反對孟塞維克（即反對機會主義者與『中派』）又去反對『左派』而在歐洲和美國，同是這種工作，現時不得不用『急行軍』的辦法來進行。個別的人，特別是那些企圖充當領袖而沒有成功的人，會在長期之內固執成見，知過不改（如果他們不以無產階級紀律自繩，不會『光明正大自處』的話），但工人羣衆，一旦時機成熟，便會迅速地，容易地自己聯合起來，並把一切誠實的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黨，有實現蘇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能力的黨。*

*關於將來『左派』共產黨人，反國會派與一般共產黨人聯合的問題，我還要指出下列一點。據我所讀到的德國『左派』共產黨人以及一般德國共產黨人底報紙判斷起來，『左派』有一悻長處，就是他們在羣衆中比較一般共產黨人善於鼓動。我在布爾塞維克黨底歷史上，也屢次看到過這一類的事情（不過範圍較小並在個別的地方組織裏，而不是在全國的範圍內）例如在一九〇七至一

九〇八年間，『左派』布爾塞維克，有的時候，在有些地方，鼓勵羣衆，比我們更加有效。其中一部分緣故，是因為在革命時機或者關於革命的回憶歷歷在目時，採用『簡單』否認一切的策略，更容易接近羣衆。然而這不能證明這種策略是正確的。可是無論如何，毫無疑義的，一個共產黨，要想在事實上做革命階級，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先頭部隊，而且要想學會領導廣大羣衆，不僅領導無產階級的羣衆，而且領導非無產階級的羣衆，勞動者和被壓迫者底羣衆，那麼，牠必須善於採用無論對於城市的、工廠的『街道』或對於鄉村都是最淺近，最通俗，最明瞭，最清楚，最生動的說話與方法去進行宣傳組織和鼓勵的工作。

第二章 德國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

我在這本小冊子裏，曾發表過意見，說共產黨人和獨立黨左派之間的妥協，對於共產主義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我曾經說過，要實現這種妥協，却是不容易的。接着我收到的報紙，把這兩種意見都證實了。德國共產黨機關報紅旗第三十二期上（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Die rote Fahne, Zentral orga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partakusbund* *）載德共中央委員會關於卡普和留特維茨軍事「盲動」（軍事陰謀，軍事冒險）及「社會主義政府」的「聲明」，無論從基本的前提上看來，或從實際的結論上看來，這篇聲明都完全是正確的。基本的前提就是，目前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底「客觀基礎」，因為「城市工人底多數」擁護獨立黨人。結論是：聲明對於「撇開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政黨而組成的社會主義政府」採取「善意的反政府派」底態度（就是不準備用「強力來推翻」政府）。

* 斯巴達團——編輯部

這個策略，無疑地，基本上是正確的。可是，我們固然不應當在字句上吹毛求疵，但是有些地方却不能緘默過去，例如社會主義叛徒們底政府，決不能（在共產黨底正式聲明上）稱爲「社會主義的」政府，謝德曼這一流人以及考茨基——克里斯平道班先生們的政黨既然是小資產階級民主的政黨，那就不能說什麼撇開『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政黨』這一種話，此外決不能像『聲明』底第四條一樣，寫出以下的話：

『……一旦政治自由，可以加以無限制地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不能成爲資本底專政。這種情形，由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的觀點上看來，由共產主義繼續奪取無產階級羣衆這一點上說來，是極重要的……』

這種情形是不可能的，小資產階級的領袖，德國的亨得遜派（謝德曼派）斯諾烏登派（克里斯平派）不會跳出，也不能跳出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範圍，而這種民主制却不是資本底專政。從獲得實際效果的觀點上看來（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設法尋求實際的效果，這是完全正確的），完全用不着寫這些原則上不正确和政治上有害處的東西。爲獲得實際效果起見，祇須說（如果你要做一個國會式的講客氣的人）：城市多數工人，既然擁護獨立黨人，那末，我們共產黨人，便不能不讓這些工人，去嘗試『他們的』政府底經驗，以便消滅他們最後的市井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也就是『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幻想。這種說法已足以做妥協的根據，這種妥協是真正必要的，而妥

協底內容應當是：我們在一定的時期以內並不企圖用強力去推翻多數城市工人所信仰的政府。至於在日常的羣衆的鼓動中，並不受官場的國會的客套所拘束，自然可以往下發揮。說讓謝德曼這班下流東西，考茨基——克里斯平這班庸人俗子在事實上揭穿自己，揭穿他們自己多麼受人欺騙，他們多麼欺騙工人；他們的『清潔』政府，將『最清潔不過地』做一番『清洗』工作，把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其他各種叛賣階級的社會主義所有的污垢，『清洗』得乾乾淨淨。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目前領袖們（有人說這些領袖們已經喪失了各種影響，那是不對的，在實際上，他們對於無產階級，要比那些自命爲共產主義者而且答應『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危險得多）底本來面目，在德國的考爾尼洛夫式的事變時，就是在卡普和留特維底政變時，*又暴露了一次。一個簡短而明瞭的證據，便是加爾·考茨基所做的小小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決勝的關頭 *Entscheidende Stunden*（註三〇），這篇文章登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

*這次政變，也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八和三十日奧國共產黨出色的機關報紅旗上，異常明瞭簡單，切實地，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列過（『Die rote Fahne』 wien 1920 Nr.——266 u.267; L.

L.: "Ein neuer Abschnitt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見一九二〇年維也納紅旗報第二百六十六和二百六十七期，署名 L.L. 的作者所做的一篇文章，題名爲德國革命底新

階段——編輯部

Erarbeit 自由報、獨立黨人底機關報上面，同時又有阿爾托、克里斯平底文章論政局（註三一）（見一九〇二年，四月，十四日自由報）這些先生們絕對不會像革命家那樣去思索和論斷，這些多愁善泣的市井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如果他們宣稱自己為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底信徒，那麼，他們對於無產階級的危險更要增加千百倍，因為在事實上，在每個困難和危險的關頭，必然要做出叛賣的行動……同時他們却有一種『極誠懇的』信念，自以為幫助無產階級！你們難道還沒有看見冒充共產主義者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由於他們膽小如鼠，毫無氣節的緣故，誤認匈牙利蘇維埃政府底情形沒有希望，就在協約國資本家和協約國劊子手底走狗前面痛哭流涕，這個時候，他們也是要『幫助』無產階級呵！

第三章 意大利的徒拉梯及其同道

上面所提到的那幾份意大利的蘇維埃報，完全證實了我在這本小冊子內所說的話，我曾經在這本小冊子內指出：意大利社會黨，容忍這一類黨員，甚至這一班議員在自己的隊伍內，乃是一種錯誤。旁觀的一個證人，更證實了這點，這個人就是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The Manchester Guardian」羅馬的通訊員，他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在該報發表徒拉梯對他的談話（註三三）。

這個通訊員寫道：「……徒拉梯君認為革命的危險，並不很大，並不至於在意大利引起無謂的顧慮。極端派玩弄蘇維埃理論底烈火，祇是為的要使羣衆底情緒經常處在興奮與緊張狀態之中。然而這種理論純粹是海外奇談，是不成熟的綱領，實際上毫不中用。這種理論的用途，只是使勞動階級殷殷期待，不致絕望。用這種學說來做香餌去眩惑無產者的人們，不得不進行日常的鬥爭，去獲得一些往往是微末的經濟上的改良，以便遷延時日，好教工人階級不

「曼徹斯特導報」——譯者

至即時失掉自己底幻想，不至即時失掉對於自己的得意神話的信仰。由此就在一個長時期內發生大大小小，各色各樣的罷工，直到最近郵政鐵路的罷工，——這些罷工使得國內的情況，難上加難。因亞得利亞海問題而發生的困難，使國民不安，積欠外債和濫發紙幣使國內情緒不振，但是我們的國家却還不覺得有採用勞動紀律之必要，須知只有這種勞動紀律，才能恢復秩序，重定民生……

很明顯的，徒拉梯自己及意大利資產階級的辯護士，幫手，軍師等所蒙蔽和粉飾的實際情形，却被英國的記者說了出來。這種實際情形就是徒拉梯、特列威斯、莫迪梁尼、杜郭尼這班先生們底理想及政治工作，和英國記者所描寫的，真正一樣，恰恰一樣。這是澈頭澈尾的叛賣社會主義的行爲。他們主張那些在僱傭勞動的奴役下替資本家生利潤的工人，遵守秩序與紀律，僅僅就這一點講來，他們的主張已經是多麼可惡呵！我們俄國人，何等耳熟地聽慣這種孟塞維克的說話！他們承認說，羣衆擁護蘇維埃政權，這是何等有價值的承認！他們對於自然發展起來的罷工運動底革命作用，却絲毫不懂，這是何等鈍拙，何等與資產階級一樣的庸俗！真的，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的記者替徒拉梯這一班先生們效了一番蠢勞，他最好不過地證實了保爾迪加同志及其在蘇維埃報上的友人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確的，他們要求意大利社會黨，如果婁事實上擁護第三國際，他就要聲罪致討，把徒拉梯這班先生們趕出自己隊伍，那就要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事實上成爲共產黨。

第四章 由正確的前提做出錯誤的結論

但是保爾迪加同志和他「左的」友人，却從正確的對於德拉梯這班先生們所下的批評中，做出錯誤的結論，以為只要參加國會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並不能拿出絲毫鄭重的論據，以便自圓其說。他們簡直不知道（或故意忘記）國際間利用資產階級國會的模範例子，而這種利用是真正革命的，真正共產主義的，對於準備無產階級革命毫無疑意是有益處的。他們簡直不懂得「新的」利用國會主義的方法，而只是高聲大嚷，口口聲聲，講到「舊的」非布爾塞維克的，利用國會主義的方法。

這正是他們根本錯誤所在。共產主義不僅在國會方面，而且在社會活動各方面都應該加入（如果不進行長期的，沉着的，百折不回的工作，牠就不會加入）原則上新穎的，根本上與第二國際底傳統沒有關係的東西（同時要保留和發展第二國際所貢獻的好東西）。

就拿編輯的工作來說吧。報章，雜誌，傳單，都執行必要的宣傳，鼓動，組織底工作。在一個稍微文明的國家內，羣衆運動不能沒有編輯的機關。儘管你責罵「領袖」，儘管你發誓要使羣衆不受領袖的影響

而保全純潔，但終不能使我們不利用那些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出身的人物來進行這個工作，終不能使我們脫離資本主義下進行這個工作時所處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私有制度的』空氣和環境。甚至在俄國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已經有了兩年半，但我們在自己的週圍還看見羣衆的（農民的，手工業者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私有制的關係所形成的這種空氣，這種環境。

國會主義是工作的一種形式，編輯是另一種形式。如果在這兩方面工作的人員，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無產階級羣衆政策的真正黨員，那末，這兩種工作的內容，都可以成爲共產主義的，而且應當成爲共產主義的。但是，在這一方面也吧，在那一方面也吧——在資本主義下，以及在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過渡時期內，無論在工作的那一方面——都不應當躲避那些困難，那些特殊的任務，這些困難和任務，無產階級應當加以克服和解決，以便利用那些從資產階級中出身的智識份子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以便戰勝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成見和影響，以便削弱小資產階級環境的阻力（以後還要完全改造小資產階級的環境。）

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以前，在一切國家內，我們難道沒有看到非常多的下面一種例子麼？當時很『左的』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及其他等等，痛罵國會主義，嘲笑被資產階級所腐化的社會黨的議員，抨擊鑽營祿位的行動等等，可是他們自己却借着編輯工作，借着工會工作，去做同樣的資產階級的鑽營祿位的勾當。如果只就法國來說，如沃和美爾格莫夫這些先生們底例子，難道還不

是標本式的例子麼？

『拒絕』參加國會之所以幼稚，就因為他們用這樣『簡單的』、『輕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想『解決』與工人運動內部的資產階級民主影響作鬥爭這一種困難任務，而事實上他們只是掩耳盜鈴，只是閉起眼睛不看困難，只是用空話來迴避這種困難。極無恥的鑽營祿位，資產階級式的使用議席肥缺，改良派曲解國會工作到了驚人的地步，卑鄙的市井小資產階級的陋習——凡此種種毫無變義地，都是資本主義到處所產生的通常的而且是最流行的特徵，這些特徵不僅產生於工人運動以外，而且還產生於工人運動以內。然而資本主義及其所形成的資產階級環境（這種環境就在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也消滅得很慢，因為農民不斷地重新產生出資產階級）在工作和生活底各方面，都產生形式上稍有差別，而實際上完全相同的資產階級式的鑽營祿位，民族沙文主義，市井小資產階級的卑劣行為等等。

親愛的抵制國會派和反國會主義的人們呵，你們自己覺着『異常革命』，但事實上，你們却被那反對由工人運動內部發生出來的資產階級影響的鬥爭中比較不大的困難所嚇到，殊不知你們的勝利（就是推翻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將產生同樣的困難，而且困難的程度要大得多，不知要大多少倍。你們同小孩子一樣，被目前的小困難所嚇倒了，你們不曉得到了明天和後天你們不得不學習，不得不補習，以便打破同是那一種，而程度却不知大多少倍的困難。

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會有更多的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出身的人鑽入你們的和我們的無產階級的政黨裏來。他們將鑽進蘇維埃，鑽進法庭，鑽進行政管理機關，因為我們不用資本主義所培養出來的人材，就不能建設和無從建設共產主義，因為我們不能趕走和消滅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我們應當戰勝，改造，重新陶養，重新教育他們，——好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在長期的鬥爭中，來重新教育無產者本身一樣，無產者解脫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成見，並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並不是用什麼神通法術，聖母意旨，也不是用口號，決議，法令所辦得到的，只有靠長期艱苦的羣衆鬥爭去反對很普遍的小資產階級的影響才能辦到。現在反國會議派這樣趾高氣揚，這樣輕舉妄動，這樣幼稚無知，一舉手就拋開這些任務，殊不知在蘇維埃政權之下，也就是這些任務，要在蘇維埃底內部，在蘇維埃管理機關內部，在蘇維埃的「法律辯護員」中間重新產生出來（我們在俄國打破了資產階級的律師制，打破這種制度是正確的，但是這種制度在「蘇維埃的」「法律辯護員」底名義之下又重新產生出來。）在蘇維埃的工程師中間，在蘇維埃的教員中間，在蘇維埃工廠中享受特權的，就是熟練程度最高，條件最好的工人中間，我們可以看到資產階級國會議派所固有的一切壞處不斷復生，我們用無產階級的有組織和有紀律的精神，作再接再厲的，長期的，百折不回的鬥爭，我們只有用這種鬥爭，才日益戰勝——逐漸戰勝這種禍害。

自然，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面，在我們自己的黨內，即在工人的黨內，要戰勝資產階級的陋習，這是

很『困難的』要把那被資產階級的成見所完全腐化了的，習以為常的，做國會議員的領袖趕出黨去，這是『困難的』要使資產階級出身的份子中間絕對必要的一部分人（即令人數很少）服從無產階級的紀律，這是『困難的』要在資產階級的國會裏建立真正配得上工人階級的共產黨黨團，這是『困難的』要使共產黨議員不從事資產階級國會的玩意兒，而從事於羣衆中的宣傳，鼓動，組織底迫切工作，這是『困難的』。凡此種種都是『困難的』，這是不着說的；從前在俄國是困難的，現時在西歐和美國更不知要困難多少倍，因為在西歐和美國，資產階級強大得多，資產階級民主傳統的勢力等等，也強大得多。

但是所有這些『困難』，如果與無產階級準備得到勝利的時候，在無產階級革命期間內以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無產階級所不得不解決的完全同類的任務比較起來，簡直易如兒戲。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我們要改造千百萬農民，小業主，數十萬職員，官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使他們統統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要戰勝他們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同這些真正偉大的任務比較起來，那末，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在資產階級國會裏，建立真正無產階級政黨底真正共產黨團，乃是一樁易如兒戲的事情。

如果『左的』以及反國會議員的同志們，連現在克服這種小困難的事情，都不能學會，那末，我們就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將來或者是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大規模地去克服和改造資產階級的

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的機關，或者將來必須倉卒補習，但因為倉卒的緣故，他們一定要使無產階級的事業受到很大的害處，做出比平常更多的錯誤，表現出比平常更大的弱點和無能等等。

只要資產階級一天沒有被推翻，只要小經濟和小商品生產一天沒有完全消失，資產階級的環境，私有制度底習慣，市井小資產階級的傳統，就一定由工人運動底內部和外部，來損害無產階級的工作，而且所損害的範圍，不僅在活動底一方面，不僅僅在國會方面，而且必然在社會活動底各方面，在一切文化和政治的舞台上，毫無例外。在某種工作上，遇着一樁『不愉快的』任務或困難，便想畏難偷安，抽身迴避，這是絕大的錯誤，由於這種錯誤，後來一定要償付代價。應該學習並學會怎樣去駕御工作和活動底各方面（毫無遺漏），怎樣去到處克服一切困難以及一切資產階級的風尚，傳統和習慣。別種處置問題的辦法簡直是不鄭重的，簡直是兒戲。

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第五章

在這本書的俄文版上，關於整個荷蘭共產黨在國際革命政策方面的行動，我有一點兒說得不正確。因此我利用這個機會，來公佈我們的荷蘭同志關於下列這個問題所寫的信，並改正我在俄文版上所用的「荷蘭論壇派」這個名詞，用「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這句話去替代牠。*

列寧

*我們已在原文上加以更正了。——編輯部

瓦英庫普底信

一九二〇年六月三十日寫於莫斯科

親愛的列寧同志：

我們，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荷蘭代表，由於你的關照，能够在你所著的《左派幼稚病》一書譯成西歐文字而未公佈之前，讀到你這一本著作。在你這本書裏，你好幾次特別提到你不贊同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在國際政治上所起的那種作用。

我們應當提出抗議，反對你把這幾個人行爲底責任，加在共產黨身上。這是極端不確切的，而且這是不公允的，因爲荷蘭共產黨中這些黨員很少參加，或者完全不參加我們黨底日常工作；他們也企圖直接地或間接地在共產黨內部實行反對派的口號；荷蘭共產黨及其所有的機關曾經進行並且直到現在都不斷進行極努力的鬥爭，去反對這些口號。

致兄弟的敬禮！

瓦英庫普代表荷蘭共產黨代表團謹啓

附 註

〔註一〕全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這本小冊子，是奧托·魏威爾著的。

〔註二〕費邊派，這就是所謂費邊社的社員，該社以羅馬的名將費邊·克塔托爾（昆塔托爾是拉丁話，意義就是做事遲慢的人）底名字命名，於一八八四年在英國成立，該社成立的用意，就是要用和平的辦法來宣傳社會主義，而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聯合會相抗衡。該社正式宣佈的宗旨，就是要用民主的精神來修改英國的憲法並宣傳用社會主義的方法去組織生產。該社不放棄政治鬥爭，不拒絕參加國會選舉，同時，却否認階級鬥爭，宣傳階級合作，不承認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註三〕列寧所指，是普列哈諾夫著的白色恐怖一文，該論文登載於一九〇三年第四十八期火星報上。普列哈諾夫在這篇論文中關於法國大革命底恐怖寫道：「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更加厲害的恐怖在歷史上是沒有的，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把真正的金剛力士給出歷史舞台，嚇好像「天上的雷」風暴一樣」光臨法國，嚇無情地破壞了「舊制度」底一切殘餘。然而這種恐怖是什麼呢？牠是什麼時候開始的？牠的巨大力量是由什麼地方得來的呢？主張恐怖的人們底策略究竟是什麼呢？據馬魯額正確的意見，恐怖開始於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打破巴士底里。

獄的時候。牠的力量乃是人民革命運動底力量，主張恐怖的人們底策略上主要特點，就是無論如何總要設法維持和加強羣衆底革命自動精神。這種恐怖，並不是由於對羣衆運動底力量發生「失望心理」所引起的，而是相反的，是由毫不動搖的，相信這種力量的信念所引起的。」

「……恐怖底代表，乃是法國人民反對歐洲反革命聯合力量而進行的英勇夾鬥中的領導者。這種恐怖的歷史，對於俄國的革命者，是異常值得學習的。然而牠之所以值得學習，正因為牠不斷向我們說：必須準備俄國的民衆去打破我們全俄各處的巴士底里獄。」（見普列哈諾夫文集第十二卷第四四九至四五〇頁。）

〔註四〕列寧所指的是普列哈諾夫著的，登載在一九〇一年十二月第二期——三期早霞雜誌上的Can't反對康德，或者是伯恩斯坦先生底精神遺囑（Can't的發音與康德同，字義却是口是心非。譯者註。）這篇論文上的下列一段話。「伯恩斯坦先生底見解中，現在只剩下社會主義底很少的痕跡。實際上他接近於主張「社會改良」的小資產階級份子，比接近於革命的社會民主黨，要多得多。然而他依然做一個「同志」，人們並沒有把他清洗出黨。」（見普列哈諾夫文集第十一卷第六十三頁。）

〔註五〕斯巴達團，是秘密的組織，帝國主義戰爭開始時，以李卜克納西等爲首的德國左派建立這個組織，其目的在於進行反帝國主義戰爭的革命鼓動。該團體曾開展真正革命的反抗鼓動，然而牠却不能解脫中派底影響，牠看不見與各種機會主義者有分裂之必要，牠依然留在社會民主黨底範圍以內。一九一六年「獨立黨人」加阿捷、列迭布爾（與社會沙文主義的，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分裂以後，斯巴達團曾加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同時却保留自己的組織，依然爲一個特別的團體。在德國十一月革命（一九一八年）以及社會民主黨人——謝德曼派和獨

立黨人組織了政府以後，斯巴達團與獨立黨人斷絕關係，到了那年十二月該團宣佈取消，而組織德國共產黨。

〔註六〕工黨黨人乃是英國工黨底黨員，該黨成立於一九〇六年，雖在自己的隊伍中包括工聯底會員以及其
他工人組織底會員，他的目的，主要的是國會鬥爭和進行選舉運動。在第二國際中工黨是極右派。

〔註七〕馬依諾河畔弗朗克福爾特地方出版的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團）之分裂（“Die Spaltung der

K. P. D. (Spartakusbund)” Frankfurt a. M.) 這本小冊子是「左派」共產黨人底團體所出版的，其中所述
的要點，後來就成爲德國共產黨政綱底基礎。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工人底義舉很厲害地被鎮壓下去，這就使
得一部分德國共產黨人主張審查黨底策略原則和組織原則；不久以後，選在一九一九年春季德國共產黨底裂痕
就已表現出來了。新派底人（什列迭爾、永格、威德列爾）認爲無產階級失敗底主要原因，第一就是工人階級分散
在好些政黨之內，第二，就是過於重視公開的鬥爭方法，他們以爲實際上這種方法使羣衆底革命自動精神降低。
「左派」共產黨人，反對黨底策略路線和組織路線，而主張組織全國工人聯合會（Allgemeine Arbeiterunion）
來統一所有主張直接爭取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制度的革命工人；「左派」共產黨人堅持「直接行動」，要求共
產黨人拒絕參加反動工會中的工作。一九一九年十月在甘迭里別爾格的黨代表大會上，「左派」舉手反對德共中
央底甘迭里別爾格的提綱，他們被剝奪了繼續參加黨代表大會工作的權利，並被開除出黨。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四
日反對派底柏林代表大會上（該大會代表了幾個反對派份子），「左派」組織了新黨，叫做德國共產黨，開始
與德國統一的共產黨進行持久的鬥爭，使革命無產階級底隊伍大形渙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致德國共產黨
黨員一封公開的信（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四日第十一期共產國際雜誌）上指出德國共產黨底綱領式的宣言，

策略上和組織上的原則，「顯然離開共產主義……」而走到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的政策方面去。」德國共產黨與羣衆的工人運動沒有聯繫，牠的綱領上和策略上的原則乃是馬克思主義觀點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觀點底混淆，所以不明確和不固定，因為這個緣故，就在共產黨裏，有了產生新的，顯然表示「民族主義的」右傾反對派之餘地。在該黨內部，形成了而且發育了右的派別，即所謂「漢堡派」(“Hamburger Richtung”)。

〔註八〕本書與俄文版同時出版的，有英德法文版。列寧在他專門寫給英文版的增補中，指出必須把他在俄文版上所用的「荷蘭論壇派」這一個名詞，改爲「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我們在原文上已經遵照列寧的指示加以改正了。

「論壇派」於一九二〇年加入共產國際以後，就建立了荷蘭共產黨，後來由荷蘭共產黨中產生了一「左派共產黨員」。不久之後，「左派」底領袖——洛朗德、郭里斯特與郭爾鐵爾離開了政治活動。

〔註九〕“Kommunistische Arbeiter-Zeitung”(共產主義工人報)乃是德國共產黨底機關報。該報自一九一九年起開始出版至一九二七年停版，開始時是日刊，後來改爲每星期出版兩次。該報擁護「直接行動」底方法，激烈反對利用公開的鬥爭，起如反對共產黨員參加國會及加入工會。

〔註一〇〕最後這一段話，由列寧建議，曾完全採入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關於組織問題的提綱，該提綱是肯能和顧四寧起草的。

〔註一一〕根據聯共(布)歷來代表大會底統計，由一九一七年四月會議起至俄國共產黨(布)第九次代表大會止，黨員人數底變更如下：一九一七年俄國社會民主黨(布)底全俄四月會議，計八萬人；一九一七年七月俄

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代表大會，計十七萬七千人；一九一九年四月俄國共產黨（布）底第八次代表大會，計三十一萬四千人；一九二〇年四月俄國共產黨（布）第九次代表大會，計六十一萬一千人。

〔註一二〕列寧所指的是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在這封信裏，恩格斯寫道：「工人們在過去所發生的一切事變之後，由於暫時的經濟繁盛，由於他們期待『帝國底榮譽』，似乎已經完全『資產階級化了』（請看馬恩書札一書，該書是由阿·多拉特斯基翻譯，校訂和註釋的。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處印行的第四版第七〇頁）。

〔註一三〕“Folkets Dagblad Politiken”人民政治日刊是瑞典共產黨底日報。一九一六年為赫格龍特所創辦。一九二〇年該報主張必須進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並實行了努力的鼓動，以反對參加瑞典政府的正式社會主義者（以布則格為首）所實行的讓步政策。

〔註一四〕世界產業工人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 W. W.)是美國工人底革命組織。一九〇四年，當四部續工聯合會底鬥爭正激烈的時候，產生了這個組織，以便與妥協的美國勞動聯合會對立起來。這個組織到了一九〇五年才在組織上完全形成，它具有革命的工團主義的性質。世界產業工人會底主要活動，就是多半在無產階級最落後和無組織的階級層中組織罷工。在罷工的時候，這個組織用革命鬥爭底方法來行動，與警察衝突的時候，就組織工人來自衛。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間，世界產業工人會底會員實行了幾十次大罷工而得到大勝利。在大戰的時候，世界產業工人會並沒有中止羣衆的罷工鬥爭，因此牠的會員備受政府壓迫。十月革命以後，在美國成立共產黨以後，世界產業工人會敵視美國共產黨員和蘇維埃政權。只是在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世界產

樂工人會發表宣言以後，這個組織對共產黨所採取的態度才改變了性質，而且在一九二〇年甚至進行了談判，討論世界產業工人會執行委員會代表與統一共產黨底代表是否可以召集共同會議的問題。

〔註一五〕此地所指的，是荷蘭「左派」共產黨人關於國會主義的提綱，該提綱登載在一九二〇年二月第一期共產國際駐阿姆斯特丹臨時辦事處公報上（“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o.1, February 1920）

〔註一六〕列寧此地所指的是迪茨根所著的哲學底成績和關於邏輯的信（“Das Acquisit der philosophie und Briefe uber Logik”）書中下列一段話：「同時只須慎重其事，不要誇大區別，不要使這種區別過度，以便不至於荒謬。」

〔註一七〕“Il Soviet”即蘇維埃日報，一九一八年左派社會主義者——擁護第三國際的人，在森阿坡里地方創辦該報。主筆是波爾迪加。列寧所指的是下列三篇論文：（一）意大利社會黨中共產主義的懷疑派（“Franzi one Comunista Astensionistadel partitoSocialista Italiano”見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第三期蘇維埃日報上）；（二）列寧與懷疑派“Lenin e l' astensionismo”見一九二〇年二月一日第四期蘇維埃日報上）；（三）錯誤（“Il Fallo”見一九二〇年二月一日第四期蘇維埃日報上）。

〔註一八〕“Comunismo”（共產主義雜誌）每兩星期出版一次，由謝拉梯主編。一九一九年創辦。列寧此地所指的，是下列兩篇論文：（一）社會黨在波尼亞洛所召集的大會（“I Congresso Social ista di Bologna”）見於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五日至三十日的第二期共產主義雜誌；（二）拉梯與最高限度派（“Filippo Turatie il

massimalino”見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三期共產主義雜誌上。

〔註一九〕Der Volkstaat（民國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當時中央機關報，在萊布齊地方出版，由威廉·李卜克納西主編。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六年間，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參加了這個報紙的工作。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五年間，恩格斯在民國報上做了許多論文，後來把這些論文搜集起來，出了一本小冊子。一九〇六年求知社把這本小冊子譯成俄文出版，名為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五年的論文（斯米爾諾夫翻譯，薩文校訂）。一九一九年由北方書社出版。列寧所引證的是最近出版的本子。

〔註二〇〕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維什羅威茨的信中寫道：「我們的理論並不是教條，而是革命進程底解釋，這種進程是引起許多彼此追隨，絡繹不斷的現象的。」（請看馬恩書札一書。這本書由阿多拉特基斯翻譯，校訂和註釋。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處印行的第四版第三五七頁。）

〔註二一〕列寧顯然只憑自己的記憶來引證這一段文字。車爾內舍夫斯基對於克里所著的致北美合衆國總統的關於政治經濟問題的信一書之俄文譯本，做了評論，他在評論上說：「歷史的道路，並不是森瓦大街。這整條道路，有時經過塵土飛揚的田野，有時經過渾泥卑濕的田野，有時經過渾地，有時經過叢密的森林。誰要害怕塵土飛揚，害怕弄髒鞋子，誰就不要從事社會的活動。」（請看車爾內舍夫斯基全集，一九一八年版，第八卷，第三七至三八頁。）

〔註二二〕此地所講的，是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火星報編輯部在苗漢地方與斯特魯威所代表的「民主反對派」底談判。談判內容，就是薩爾斯特魯威及其團體與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合作的條件。談判結果，根據斯特魯威所提出並為火星派大多數違反列寧的意見所通過的條件者擬好協定，但在實際上，這種協定，卻沒有實行（詳細

情形請看俄文版列寧全集第四卷第六十八至六十九頁，以及第五百六十七頁上的第三十六個註釋。）

〔註二〕革命共產主義者，乃是米爾巴黑（米爾巴黑是德國的外交家。一九一八年締結布列斯特條約以後，曾被任爲駐蘇俄大使。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企圖破壞與德國所締結的和約，在莫斯科作亂，殺死了米爾巴黑——譯者註。）被殺以及社會革命黨左派暴動（一九一八年七月）以後，脫離左派社會革命黨的份子。一九一八年七月末，在薩科托瓦地方脫離左派社會革命黨的組織和團體舉行了會議，在這會議上，決定召集代表大會並組織新的民粹黨。根據會議底決定，在莫斯科出版勞動意志報，這個報紙開始時是由亞歷山大洛夫、巴捷里、比爾科、多布洛蜜托夫、科列加葉夫、烏斯亭衣夫主編（後來這個報紙改爲雜誌。）

九月二十五日在勞動意志派底代表大會上曾奠定左派民粹黨底基礎，該黨自稱爲革命共產主義黨。在代表大會底決議上特別指出該黨底策略立場如下：「新政黨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政綱說來，依然是民粹黨，同時牠採取切實的和誠意的與布爾塞維克合作的策略，採取真正蘇維埃政黨底立場。」……牠放棄祕密的活動，也不去破壞共產黨員底內外政策，牠承認共產黨員是革命主要的領導力量。」……黨承認蘇維埃政權是勞動者底階級勝利必要的條件，承認蘇維埃政權創造客觀的先決條件去建立社會主義的制度。」……黨認爲只有蘇維埃政權是第一國際理想和社會主義底唯一的和真正代表，所以牠在國際政策底問題上，認爲只有不削弱和不破壞蘇維埃政權而是鞏固這種政權的種種辦法，才是適當的。」

當時納唐松在他致勞動意志報編輯部的信中，也完全同意於代表大會底決議。（見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勞動意志報第十四期。）

一九一九年十月在該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該黨底政綱。這個政綱雖然企圖放棄社會革命黨的傳統見解（例如這個政綱提出必須實行農業集體化），然而牠依然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要求，牠是民粹派折衷主義底表現。但同時這個政綱特別明顯指出這個政黨底策略基礎是擁護布爾塞維克的蘇維埃政黨底策略基礎。

革命共產主義黨是一個不大的團體，牠主要的是想依靠農民，但是牠在農民中間沒有什麼大影響。該黨底上層領導份子力圖與布爾塞維克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在地方的組織中又有富農份子企圖利用該黨來反對布爾塞維克，因此在黨內已成不斷的危險。從一九一九年春季起，該黨發生分裂，分出若干團體，其中有一部分轉入俄國共產黨（布），其他一部分投到社會革命黨左派方面去。

一九二〇年四月，該黨由於對蘇維埃政權底設施——對組織勞動軍以及勞動軍事化——究應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而召集該黨底第五次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該黨底右傾份子佔多數，他們企圖使黨走上積極反對布爾塞維克的道路。然而該黨在中央委員會底逼迫之下（中央委員會甚至不惜把大會解散了），依然能夠保持原有的策略立場。自從那個時候起革命共產主義者開始準備轉入俄國共產黨（布）。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在該大會上許可革命共產主義者派兩個有發言權的代表出席）通過關於一個國家內只能有一個共產黨的決議之後，革命共產黨就在一九二〇年八月間的代表會議上，通過了加入俄國共產黨（布）的決議。

〔註二四〕還在大不列顛共產黨未成立好久以前，就產生「左的共產主義運動」而儼然成爲一派。這個運動底基本特點，就是劇烈反對國會議活動和反對英國工黨。左派中最大的組織——社會工黨（Socialist Labour Party）——在這個問題上曾採取最不調和的態度。這個政黨底基本核心就是一九〇三年脫離社會民主黨聯

盟（該聯盟在甘特曼領導之下，降到右的社會愛國主義組織水平）左的份子以及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加入社會黨的革命工人（因為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社會黨底革命的，反軍國主義的鼓勵和宣傳曾在英國工人羣衆中起了極大的影響）。社會黨參加了關於統一問題談判，要把凡是贊成革命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種立場的左派組織合併起來成爲統一的共產黨，然而牠却提出不加入工黨，作爲統一的不易條件，但是沒有得到不列顛社會黨方面的贊助，因此拒絕繼續談判，同時該黨的要人坡烏里、馬克、曼努斯和別里在這個問題上表示讓步，並繼續參加統一會議，因此被開除出黨。附和左派的第二個組織——南威爾斯社會主義協會（South Wales Social List Society）——乃是威爾斯地方極極的煤礦工人比較不大的一個團體，牠帶了工團主義的性質。這個團體極端不主張革命的政黨參加國會，這就使牠與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接近起來，而這個聯合會裏面，多半是婦女，她們在西爾維亞·潘克赫爾斯脫底領導之下採取了極左的反國會的立場，這種立場在實質上只是該聯合會一般不主張政治活動的局部表現。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後來改名爲共產黨）宣佈自己加入共產國際之後，依然堅持自己政綱上和策略上的觀點，在共產國際裏保持「左」反對派底地位。在蘇格蘭工人中間，影響比較大的，是工廠工人委員會（Shop Stewards Committee），這些委員會是在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組織起來的，牠們組織起來的目的，就是要反對那些宣傳階級和平並放棄罷工鬥爭的妥協派的工團。工人委員會不僅領導了這一時期的罷工鬥爭，而且也進行了公開的反戰宣傳。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尤其是在武裝干涉和封鎖的時期，工廠工人委員會曾努力進行了鼓動工作，來擁護蘇俄，要求英國政府承認蘇維埃政權並與牠恢復商業關係。在對內閣上，工廠工人委員會堅持必須進行羣衆的革命鬥爭去反對資本主義的國家，以便建立依靠工人代表蘇維埃的

無產階級專政。工廠工人委員會不主張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牠們同時進行了激烈鬥爭去反對工黨在國會內和國會外的活動。

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工廠工人委員會代表曾發言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工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八月六日最後一次會議上，列寧在自己的關於加入英國工黨問題的演講中，曾批評工廠工人委員會反對加入工黨的態度。大不列顛共產黨成立的時候（一九二〇年八月二日至三日），把參加國會選舉和加入工黨這兩項列入自己的政綱，而上面所指出的那些左的團體，却依然沒有加入共產黨。牠們依然獨立存在，直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在里德斯地方舉行共產主義組織和團體代表大會的時候為止。在這一次代表大會上，大不列顛共產黨、共產黨（以前的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蘇格蘭共產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格拉茲地方成立）、工廠工人委員會以及其他幾個共產主義團體合併起來，成爲大不列顛統一的共產黨，牠們完全站上共產國際的立場。社會工黨這一次也不同意合併，在該黨的上層份子中間，對於加入工黨的問題，保持激烈反對的態度。該黨地方組織中有很多黨員曾主張與共產黨員合併。

〔註二五〕“Workers Dreadnought”（工人無畏艦），乃是一九一四年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W.S.F.）在倫敦所創辦的機關雜誌。主筆是西爾維亞·潘克赫爾斯特。該雜誌進行了反國會的鼓勵並發言反對英國無產階級底革命組織加入英國工黨。

〔註二六〕加拉克爾所著的論文底完全題名是“A letter to the editor from W. Gallacher in the name of the Scottish Workers Committee of Glasgow.”（Workers Dreadnought No. 48, 21

February 1970) (加拉克爾用格拉茲那地方的蘇格蘭工人委員會底名義致主筆的一封信見於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工人無畏艦雜誌第四十八期上)

〔註二七〕曼徹斯特導報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是英國最有勢力的地方報紙之一，在曼徹斯特地方出版，反映自由黨左派底利益。一八二二年創辦。現時主筆是斯科特。

列寧在此地所講到的魯易·喬治底演說，是魯易·喬治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八日在下議院底自由黨黨團底會議上作的，並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第二二九六五期的曼徹斯特導報上发表，標題為：“Mr. Lloyd George's speech to The Liberal Mps.” (魯易·喬治對國會底自由黨黨團所作的演說)

〔註二八〕引自西爾維亞潘克赫爾斯的論文“Towards the communist Party” (走向共產黨去)，該論文登載在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工人無畏艦雜誌第六卷第四十八期上。

〔註二九〕疑派乃是意大利社會黨底左派小組，牠在保爾迪加底領導之下，努力與改良派作鬥爭，牠不主張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後來到一九二一年，在里沃爾地方舉行的黨的代表大會上，懷疑派由社會黨中分裂出來，成爲組織意大利共產黨的基本核心。

〔註三〇〕考茨基所著的論文“Entscheidende stunden” (決勝負的關頭) 講到魯爾區域中鎮壓工人武裝起義的事情。考茨基寫道：“魯爾區域中目前的波動，只是卡普和留持維茨底國家政變所引起來的反動。如果沒有這一次政變，魯爾區底工人就不致於實行武裝起義，那裏直到現在都會極其平靜。政府避開參加政變的人而逃到什徒特加爾特去，以避免流血慘劇，政府並不以此事爲丟醜。政府自從得到勝利以後直到現在，也沒有懲罰參加

政變的任何人。政府是否能夠用自己的仁慈態度（雖然稍微有一點仁慈態度也好）去對待更加勤勞的工人（整個德國底生命有賴於這些工人們底手所做的工作）呢？如果政府在這一方面不採取任何辦法，那時德國人民就要受苦，那時德國人民就要過黑暗的日子了。（見“Freiheit”報第九十七期，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出版。）

（註三）克里斯平底論文“Zur politischen Situation”（論政局）登載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四日第一二三期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底自由報上（“Freiheit”）

（註三）列寧此地所引證的，是 E. C. 著的論文“An interview with Turati”（E. C. 著與徒梯拉的談話），該論文登載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第二二九五九期的曼徹斯特導報上（“The Manchester Guardian”）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两个策略

序

第一章 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

第二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第三章 何谓革命对沙皇制度之彻底胜利

第四章 肃清君主制度与共和政体

第五章 应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第六章 无产阶级与不彻底的资产阶级奋斗时将自己制肘的危险从何而来

第七章 排斥政府保守党的策略

第八章 解放派与新火星派

第九章 何谓在革命的时候持极端反对政府党的态度

第十章 革命的公社与民主革命的工农专政

第十一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与临时大会几个决议案的概略比较

第十二章 若资产阶级离开民主革命则这个革命力量的摆动是否因之减少

第十三章 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书后

左派幼稚病

第一章 我们可以在那一点上来讲俄国革命有国际

意义呢

第二章 布尔塞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第三章 布尔塞维主义历史的主要阶段

第四章 布尔塞维主义是与工人运动内部那些敌人作斗争而发育、巩固和锻炼出来的

第五章 德国共产党「左派」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

第六章 革命家应否在反动工会内进行工作呢

第七章 应否参加资产阶级的国会呢

第八章 不作任何妥协么

第九章 英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

第十章 结论

增补

第一章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第二章 德国共产党人与独立党人

第三章 意大利的徒拉梯及其同道

第四章 由正确的前提做出错误的结论

第五章

瓦英库普的信

附注

附录页